

「紀念五四運動八十周年、八九民運十周年 -- 展望民主中國」國際研討會

日期：1999 年 5 月 1-2 日 地點：香港大學

- 陳明鈺：五四與現代中國群眾運動
- 陸鏗：從「五四」到「六四」 / From May Fourth to June Fourth
- 金鐘：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論政傳統
- 徐邦泰：「六四」十年後的中國 - - 法輪功風靡北京城・中南海疑懼義和團
- 辛灝年：五四、六四與中國民主過渡的艱難反復歷程
- 蔣培坤 / 丁子霖：十年觀察・十年思索 / 10 Years' Observation, 10 Years' Quest
- 蔡文輝：兩岸關係與中國統一問題 / Convergence and the Future of Reunification
- 丁偉：中國的國際地位與民主前景(摘要)
- 王丹：八九民運的意義
- 于浩成：二十一世紀中國將是民主和統一的中華聯邦
- 項小吉：對八九民運的幾點思考 / 論文附件
- 汪岷：論公民抗命權
- 劉青：艱難的起步 - - 中國的人權狀況 / A Difficult Start - the Situation of Human Rights in China
- 王超華：錯誤時機的一個錯誤行動 - - 八九民運中的絕食及其與八十年代中國知識分子的關係 / A Wrong Choice at the Wrong Moment -- The 1989 Hunger Strike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s of the 1980s
- Chee Soon Juan (徐順全)：Fear, Faith and Freedom: Asia's Struggle for Democracy
- Eugene Soh：Kwangju, in the process of Korean Democratic Movement
- 程翔：中國民主化前景樂觀
- 伍凡：中國民主運動的路線問題 / The Question of the Line of the Chinese Democracy Movement
- 張倫：民主化的陷阱 - - 從歷史和現實中得到的幾點啟示 / The Pitfalls of Democratization -- Some Enlightenment from History and Practice
- 劉賓雁：中國改革的新境界(提綱)
- 嚴家其：儒家政治傳統和中國民主前景 / Order - Disruption of Order - New Order: Political Change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 張炳良：幹部體制改革對中國未來政治發展的影響
 - 雷競璇：中國農村選舉對未來民主政治發展的影響 / China's Rural Elections and Their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Democratic Politics
 - 陸德泉：經濟改革對民主的影響
 - 陳一諮：二十世紀的世紀與中國 / China and the 20th Century World
 - 楊健利：秩序 - 秩序瓦解 - 新秩序——中國的政治變革與憲政民主的確立
 - 魏京生：中國走向民主社會的道路
-

陳明鈺：五四與現代中國群眾運動

在五四運動八十周年的前夕，從一個歷史學者的角度來回顧探討五四與現代中國群眾運動，當然應該注意到香港近代歷史發展是中英鴉片戰爭的產品。所以現在特把本文的歷史背景範疇放前一點，回溯至十九世紀中第一、二次鴉片戰爭。當年中國戰敗，被逼簽訂一八四二年的《南京條約》和一八六零年的《北京條約》，割讓香港島和九龍半島予英國，並付出巨額賠款，開放沿海城市為外國通商港口，這開始了中國受西方帝國主義侵略的「不平等條約」一世紀（一八四二至一九四二），又引起自晚清以末中國朝野有識之士的憂患意識和不斷追求變革圖強救國的各種奮爭和嘗試。

五四運動在中國近代、現代歷史的演化過程來看，可說是自晚清以來求變改革，抗禦外患侵略和加強國力的第三階段和波浪潮。簡而言之，第一階段就是一八六零至一八八零年代清廷官方倡導的「自強運動」或「洋務運動」，當時主要的目標和口號是「堅兵利甲」、「富國強兵」。那時清朝中央和地方當局咸以為兩次鴉片戰爭失利均由於中國軍事落後，所以改革重點在採購西洋新式軍械武器如槍炮兵艦等，後來更進展為仿效西洋武器製造，引入西洋軍事訓練來現代化國防裝備，提高軍事實力來抗拒外敵侵略。如用今天的術語，就是「硬件」的採用和軍事科技的轉移。但這些工夫都是用於外在器具的裝配，以較新式的武力來維護傳統皇朝的道統、法制、典章文物，正如晚清名臣張之洞的所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可惜這種膚淺，流於表面化的軍事「硬件」不能取得「富國強兵」的真正成果，一八九四至九五年中日甲午戰爭，清軍慘敗，等於宣布這第一階段的現代化改革失敗。

近代中國改革的第二階段就是由一八九八年康有為、梁啟超主導的「百日維新」及二十

世紀初年，一九零零年庚子事變以後的清室新政改革，當局者似乎開始著意整頓管理組織系統和教育人才制度，希望可藉此提升發揮「堅兵利甲」的效用，來加強皇朝對內對外的控制應付能力，所以有一九零五年的廢除科舉，開辦新式學堂，訓練新軍，倡辦實業等措施。當然一九一一至一二年的辛亥革命，廢帝制建共和，可說是基本的國體和政權系統制度的大翻修。可惜晚清最後十年的新政變革，弊多利少，而民國初期的政局混亂，帝制雖被棄，復辟亦難維持，但因政客軍閥圖私謀權，亦無法應付國家危機，更談不上富強之道。及至一九一五年日本趁袁世凱稱帝企圖之機，提出「二十一條款」實行東洋帝國主義大規模侵略，而袁死後軍閥混戰連年和派系政爭不止，由一八九八至一九一八年制度變法和國體革命亦無助國計民生，第二階段亦以「硬件」操控失靈而破產收場。

及至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的爆發，也就是中國近現代變革圖強救國第三階段浪潮的開始。五四運動是一個非常重大，影響深遠，多元化，極為複雜的歷史事件和現象。在此簡單地提出一個回顧探討的重點，就是五四與過往兩個階段變革圖強最核心的不同之處，也可算是五四刻劃時代開創新猷的特徵，這就是五四帶來了民間較廣泛的憂患與危機感和普羅百姓的愛國救亡意識，而五四所追尋的最終變革目標，不再是維護帝制皇朝或共和總統的政權體制的權威管治或保存儒家禮教倫理道統的價值觀系統，亦非簡單的藉著「堅兵利甲」軍事武裝來「富國強兵」在「硬件」方面來謀求國家權益。五四所追求的理想，如淺白來說，可算「富國強民」，不在乎保障某一特殊的皇朝、政權，和當權派系，而是要通過全面的改造與革新來拯救中華民族的整體民族國家。在進程序而言，五四是希望從下而上，由中華民族每一個成員和中國的每位公民的解放和改造，完善和提升，從而擴廣至民眾群體、社會各階層以達全民族國家的整體深切革新改進，最終可成功建設一個主權獨立、統一、現代化、富裕強大與自由民主公義的民族國家。這與前兩階段由晚清至民初，依靠政治精英、官僚統治層，由上而下，以官方政權身份力量來推行的變法改革新政完全不同。

五四是一種民間主導、自發性的全面思想、文化改進，同時亦是一個多階層的社會民眾愛國動員、由思想、文化、語言、教育的更新改造為入手點，來促進社會各方面（例如性別、階級、年序等）的解放，以被解放出來的新社會成員、新國民，懷新思想，受新文化薰陶，從而發揮積極的活力，集個人而形成新的群體動力，形成民族國家整體的更新改造，如以現在的術語來說，五四之社會解放，民族國家的興革提升，是從思想文化的「軟件」著手，甚至是以每一位社會分子、國民成員的「個人電腦」的「軟件」為基礎單位到進行思想解放，文化改造，通過新文化、新教育的功能，從個人推及至各階層，地域的民眾，由群體而至社會民族整體，藉此新興的社會活力和價值觀來建設自由、進步、開放、公平、民主、現代化、統一、獨立、富強的中國，這絕對是由內而外、由下而上、由小而眾的思想文化「軟件」革

新再造過程，由民間主動自發，絕非由過往第一、二階段官方政權精英主辦倡導的軍事「硬件」採購和武器「科技轉移」方式的外在裝備由上而下的「舊酒新瓶」、「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局部、片面無長遠實效的所謂現代化。

五四運動的愛國抗議行為可謂由民間的醒悟自覺而爆發民眾主動的集體動員，以志願自發性的民間組織社團（如學生會、工會）為骨幹，爭取國家民族的權益，以圖抗拒、制衡政權當局者之錯失和補救修理政府管治機器的不足無能。與過往士大夫論朝政，讀書人以救國為己任的比較狹窄，上層精英式的國事政策評議的最大分別，是五四時期的集體式，普羅性，幾乎全民動員的多階層群眾愛國運動，由學界知識分子同學們推廣至各大城市的工人、店員、商界的響應積極行動來向政權施壓力，以拯回國家權益。作為社會成員國民一分子的他們，不論教育水平、身份地位、財富收入、工作崗位，都變成愛國多階層性動員參與者，熱誠投入，打破傳統士大夫參與國事的「專利權」，以具體的民間抗議行為主導輿論，實施經濟和社會制裁力量來抗衡政權決策的失敗，五四著實開創了現代中國群眾愛國救亡運動的先河。

回顧八十年前春夏之際，先有北京學生五月四日的愛國遊行示威，抗議北洋政府在巴黎和會的山東問題上退讓，喪權辱國，然後消息傳播至國內各大城市，演發至六月初上海「三罷」——學生罷課、工人罷工、商戶店員罷市，把愛國動員浪潮規模聲勢擴張，連操制北京財經、運輸、物資供應的天津也要「三罷」，由言論宣傳抗議，升級至經濟封鎖、交通運輸制裁，不單全國受影響，也吸引國際注意，終於迫使北洋政權當局拒簽《凡爾賽和約》，不予日軍侵略青島任何「合法化或合理化」的藉口，後來在一九二零年華盛頓會議上，中國終於可以收回山東的主權。所以，五四不單是抽象層面的社會文化個人思想解放和改造，而同時也是現代中國社會民眾愛國動員，爭取民族國家權益的一個成功的大突破，也開啟了以後中國近代歷史上新的社會與政權，民間與官方、普羅百姓與黨政權貴間的有機性互動關係。

從較廣闊的角度來看，過往八十年來中國歷史的演化，可說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在依隨著五四所樹立的大目標方向，「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科學民主」這三大口號和理想邁進。直至今時今日，這三大目標仍有其高度的切合性和時代感，而過往四分之三世紀中國國內的重大社會變革和群眾運動，仍深受五四的模式典範和精神風采所策勵。

五四時期知識分子學界同人一方面既是追求自我思想文化改造，但更重要的是他們熱心實踐全面社會解放的理想，要打破傳統儒家士大夫的框限，走出象牙塔，投入社會，融入普羅百姓中，從而推動社會各階層的改造，結合新的、已解放的民眾，匯聚團結成新的社會集體力量來建設新的民族國家。五四時期「三罷」的成功已正面表現學界聯合各階層，尤其草

根小市民、白領藍領勞動者，由輿論鼓吹而變成具體的社會制裁和經濟和服務功能封鎖的實力，可在前線直接抗衡外來帝國主義的侵擾和補救國內官府腐敗無能，為政治、軍事的國家政權力量，再增添了不容忽視的社會群眾民間實力。

如略為檢討過往數十年中國的重大歷史里程，就可明顯看到多階層性的群眾運動對近代民族國家命運直接貢獻。例如：

一、二十年代中期國民黨與共產黨合作的「國民革命」統一戰線，其中一九二五年由上海爆發而波及全國的「五卅運動」，與香港有直接關係的一九二五至二六年「省港大罷工」和一九二六至二七年的「北伐」，都是黨政當局有效配合群眾的「外抗強權，內除國賊」運動，利用工、商、學界的結合力量，藉社會動員來支援成功的革命外交、政治和軍事行動。

二、一九三一至三七年，東三省「九一八事變」以後全國各地的抗日示威、遊行、罷買日貨愛國運動，以社會愛國力量來抗衡和反對國民黨南京政權的向日本侵略者妥協退讓政策，終於促成西安事變後的第二回國共和抗日。

三、一九三七至四五年的八年對日抗戰實在有兩條戰線，第一線是以軍事力量抵抗日軍侵略的前線，而另一線就是大後方的社會群眾全民動員以支援長久抗日的奮鬥，這八年同時可算是國共兩黨間的爭取民心 and 社會力量的競賽，國民黨在軍事前線正面作戰損傷慘重，而在後方社會戰線上必輸給共產黨的愛國群眾動員的「延安」路線。

四、一九四六至四九年國共內戰時期，國民黨雖有龐大的武裝軍事「硬件」的優勢，但無法在漫天高通脹、嚴重官僚貪污、經濟停滯的惡劣環境，作出正面積極有效的群眾動員來爭取社會支援力量和民心歸向，以維持其南京政權的權威合法性和有效管治能力，終於被共產黨的軍事攻擊，配合民眾動員（例如四八年的全國性「反內戰、反飢餓、反逼害」大遊行）由農村回到城市的策略所敗。可見民國時期的群眾運動已形成政治舞台的強大新興勢力，也是顯示漸趨開放，略有社會空間的民間集體力量可影響政權取向的新現象。

一九四九年後的中國大陸，在列寧史太林式的一黨專政下，由共黨掌控所有一切國家資源和政權機器，從而全面管制和領導社會，似乎不容易有充分空間機會予主動自發性的民間群眾運動來監察抗衡黨政當局，尤其中國共產黨自二零年代以來，頗為積極參與和盡量利用群眾運動，作為其革命動員的社會基礎和反帝國主義、反軍閥、反國民黨的民間支援力量，所以共黨十分明白群眾運動的重要性的了解掌握組織動員鬥爭的技巧。但四九年以來國內的

現象是往往由黨政當局由上而下策劃，領導發起的各種運動，吸納甚至指令全國民眾參加，可算「運動群眾」而非真正民間主動自發性，獨立於官方的群眾運動，例如五零至五三年，韓戰時的「抗美援朝」運動，農村反地主反土豪劣紳和封建勢力的「三反五反」運動，五八至五九年的「大躍進」及至今談及猶有餘悸的六六至六九年「文化大革命」。

這都是一幕接一幕的黨政當局編導操控，民眾受策動而參與的官方動員社會的「運動群眾」來支援黨政當局的政策措施，實踐各種對外對內的政治經濟目標，有時甚至淪為派系人事權力鬥爭的工具。正因中共為群眾動員／動員群眾的歷史老牌高手，所以亦有相當經驗和能力來進行各種「反動員」（counter-mobilization）或非動員（de-mobilization），來禁制遏止大規模的自發性民間群眾運動來抗衡督策官方權力。

在另一角度來看，一九四九至一九八九年的四十年間，中國大陸沒有一種真正的開明進步國家政權與開放自由民間社會之間的健康良性的平衡與互動關係。隨著一九七九年以來經濟改革開放，新式科技引進，海外留學教育，國際資訊交流等所引來的種種衝擊，也促使中國社會產生的新意識醒覺和民間群體的活力，同時因經濟成果利益分配享用之不公平與官僚貪污濫權嚴重惡化的現象，亦刺激社會民意的深切不滿。所以十年前春夏之際的天安門事件，可是一種新形成的社會力量與公眾意欲的轉化，藉民間自發性群眾動員的突破來帶動引發追求一種新的有機性社會利益與黨政權新平衡的嘗試。

如果以傳統馬列主義「唯物史觀」的理論來看，以經濟結構和生產關係作為的「下層基礎」（sub-structure），可直接影響政治秩序與意識形態的「上層架構」（super-structure）。所以先有自一九七九以來改革開放帶來種種的轉化與機遇，由新興與外來的經濟科技開展引發的新社會意識和民間活力，然後才發生一九八九年的群眾動員，這絕對不是無風生浪，而是頗正常自然，甚至無可迴避的經濟影響社會，社會再影響政治的循環運作。

再回顧八十年前五四運動期間的客觀經濟環境，當時因一九一四至一八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戰，西方列強為歐戰所累，無暇操控佔霸遠東市場，中國華資民族資本和新式企業有空前的黃金機會全力擴展、經濟蓬勃非常，及至一九一八年停火休戰，西歐戰後復元，對亞洲的產品需求增升和國際經貿、金融、運輸交通的復興，更促進東亞的經濟活力，在中國沿岸通商港埠，造成繁榮景象。當時中國各大城市的中產階級，學界知識分子，專業人士和勞動階層的經濟實力，和社會意識醒覺，組織動員能力則達至空前盛況，可見經濟的發展，產業的興旺，教育與科技的普及會一定推進甚至解放個人和社會整體的資源及提升民間對公共事務的關注和參與，更積極有效維護個人、群體、民族國家權益。就近來看，過往二十多年來香港

經濟起飛，教育普及，除製造富裕的生計外，也促進社會開放，思想多元化，意識自由化，各種民間組織和自發性的群眾運動蓬起，為英殖民地政權撤出，主權回歸的政治民主化和治理權本地化帶來有利的堅實客觀基礎。再隔海峽觀察，台灣省以七十、八十年代的經濟繁榮，民生豐足作基礎，進而社會更因科技和教育普及而趨向自由化，民間活力藉群眾動員產生大量熱能，最後也帶來政治民主化，可知中國人近年由經濟發展推動社會自由，再帶引政治民主的「三步曲」已在香港和台灣兩地區有正面的經驗，取得可觀的成果，並且證明科技進步與經濟發達的「硬件」自然應當配合社會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的「軟件」，達致「硬件」「軟件」相互良性結合，有效發揮。一方面科技經濟發展為自由民主提供客觀基礎，而自由民主為法治人權和產權提供保障。另一方面，這種自由民主法治人權的「軟件」架構也為經濟與科技再提升和突破伸展作出有利的支持和維護，絕對不是相互排斥，而是互作支援。由中產階層背景的學界和專業人士結合勞動界的普羅市民群眾，過往二十多年在港台兩地華人社會的集體動員帶來自由開放進步，但無損經濟發展，反而更帶來公義與安定，為繁華富強開創理想的環境。

現時的中國大陸，已經歷了二十年的改革開放，普遍取得可觀的物質成果，全民平均的入息和生計水平逐漸豐裕。日而久之，改革開放帶來的新生產力，新生產關係，市場運作機制，法律制度，企業人事管理文化，國際經貿投資，科技資訊交流等實有相當廣泛而全面、深入的影響，這些客觀的下層結構的變革轉化，就算以馬列主義的邏輯來推演，最終也會自然地影響改造上層的政治秩序和意識形態，所以社會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是真正改革開放最後不可迴避的正面產品。如果八十年前五四運動為中國社會群眾動力啟創一個「偉大的開端」，則今天經濟改革有成，日趨發達的中國也會逐漸出現一種新匯聚的社會力量和民間多元化意識，藉群眾運動來推展促進一種新的社會利益與政權體制的有機良性平衡互動，來建設一個獨立、統一、富強、現代化、公義、自由、民主的中國，我們對這雖然長遠且多波折，但一定可實現的目標，正如五四時代的愛國群眾一樣，應可抱著樂觀的信心。

陸鏗：從「五四」到「六四」

講者簡介：陸鏗，號大聲，一九一九年生，現年八十歲。為中國最早的廣播記者。二次大戰後期任中國駐歐洲戰地記者，戰後任南京《中央日報》副總編輯兼採訪主任，廬山版主任、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教授；為維護新聞自由，先後遭國共兩黨下獄三次，坐牢廿二年。出獄後在港任教中文大學新聞傳播系，並任《百姓》半月刊社長，後被台海兩岸政府先後列入黑

名單。現為專欄作家，專欄發表於港、台、美、新四地。

我生於一九一九年，是五四運動的產物。今年欣逢五四運動八十周年，能夠參加在香港舉行的「紀念五四運動八十周年及八九民運十周年展望民主中國國際研討會」，可以說是姻緣巧合，也可以說是命中註定。至於「六四」，我是在天安門學生愛國運動初起時就在中國大陸親身感受運動的激蕩。遺憾的是，八九民運以後，未能再到大陸。一九九七年十月，應邀到大陸參加一個詩詞研討會，在美國舊金山正式向中國駐舊金山總領事館申請得到簽證。不料，在文錦渡入關時，我的護照經過電腦忽然響了起來，一位身著軍服的女上尉關員情不自禁地：「咦！怎麼會叫？」我說：「小姐，這就是黑名單了！」她說：「呵！您請一旁休息，我去請示。」一直折騰了三個鐘頭，中間經過邊防少校的招呼換了一個沙發坐，中尉奉茶，最後上校告知：上面答覆，陸先生不能進去。從而我證明自己確已上了中共的黑名單。我告訴那位上校叫他向上反映：強大的無產階級專政，為甚麼怕一個年近八十的老頭子？何況我的目的不過是回雲南老家探親。如果不放心，儘管派一兩個特務跟蹤。剛剛在聯合國人權公約上簽字，就做出這樣的笨事，難怪李鵬有「弱智兒童」的雅號。

我的人生經歷驗證了，我不僅是「五四」的產物，也因「六四」受到了「特別待遇」。因此，今天的講題就是：從「五四」到「六四」。

「五四」和「六四」，是中國本世紀最具有標誌性的歷史事件，而建設一個民主的新中國，則是「五四」和「六四」這兩場愛國民主運動所追求的相同目標，用時新的話語來講，就是要推動中國完成從傳統向現代化的轉型。但是，從「五四」到現在已經八十年了，從「六四」到今天，也已經十年了。不管是經過十年，還是八十年，令人十分遺憾的是，非但這個目標在中國還沒有實現，甚至於「五四」和「六四」所反對的東西，卻又由於各種原因在中國大陸開始死灰復燃。

過去的八十年中國歷史，雖然是一部「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動蕩變遷史，但中國社會專制傳統的本質始終沒有改變。中國人追求民主何以始終不能實現，我認為，其根本的癥結在於中國的封建專制傳統根深蒂固。孫中山領導辛亥革命、建立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提出了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建國方略、建國大綱，對中國的現代民主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但是由於他照搬了列寧主義的建黨理論，所實行的民主就被集中所代替。其後遺症至今仍然對中國政治產生著深刻的影響。

袁世凱和北洋政府時期，傳統的專制獨裁勢力一度借用西方的議會模式和政府結構，企

圖苟延殘喘，結果，「畫虎不成反類犬」。此後的蔣介石國民黨政府剽竊了德、意法西斯的一套，加上「攘外必先安內」，被史家批評為「民主無量，獨裁無膽」。共產黨雖然以「翻身解放」、「當家作主」的口號號召人民，並以現代民主政治為武器，同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進行了堅決的鬥爭。但是一旦當它奪取政權以後便開始「異化」，中國大陸就更無民主可言了。在共產黨的辭典裏，民主的定義就是「人民當家，我（中共最大的當權者）來作主」。半個世紀來，在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簡直就是在開民主的歷史倒車。

毛澤東自稱領導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但卻以「人民」的名義推行了一種「全能政治」，使得傳統的封建專制演變成現代法西斯個人獨裁的全面專政，他甚至不諱言自己是「比秦始皇更高明」的暴君。「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黨同伐異，及其「繼續革命」的「鬥爭哲學」，把整個民族推向史無前例的大浩劫之中，國家瀕臨崩潰的邊緣。到了鄧小平時代，雖然改革開放經濟發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由於他的氣度與眼光所限，忠黨勝於愛國，拒絕政治體制改革，先後把有開明作風的胡耀邦，和要求在民主與法治軌道上解決問題的趙紫陽趕下了台，並動用軍隊坦克，在光天化日下血腥鎮壓了天安門民主運動。這雖然導致了結束冷戰和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全面失敗，也使中國背離了世界文明的民主潮流，迫使中國至今仍在為此付出沉重的代價。

環視當今中國大陸，雖然有人號稱中國已開始了一個新的「江澤民時代」，他也自稱是「跨世紀的領導核心」，要率領中國人民邁入下一個世紀，但是嚴峻的事實是江澤民的格局限制，他只能「鄧規江隨」；江澤民除了繼承鄧小平衣鉢，熱中於在權力鬥爭中玩弄平衡策略，看不出他在政治民主方面進行實質性改革的誠意，甚至在某些方面還在胡耀邦、趙紫陽的已經作出的改革方面有所倒退。我們看到的是，中共作為一個傳統的由農民革命起家的政黨，依然等級森嚴，如大陸的新聞媒體，不是按照領導人活動和講話的內容重要性來自行決定報導的篇幅和先後順序，而是必須嚴格按照他們在中共黨內的地位等級來決定，這在最近江澤民、李鵬、朱鎔基外出訪問和送迎禮賓活動報導中，可以得到證明。朱鎔基訪美、加的重要性與轟動性，遠遠超過李鵬的訪土耳其等國，但在《人民日報》的版面上，李總是先於朱、大於朱，貽笑大方。

香港，對於中國大陸來講簡直是一個「世外桃源」。當香港還是一個殖民地的時候，儘管民主並不充分，但它的自由環境及其法治曾經對中國現代歷史上的辛亥革命、抗日戰爭、共產黨反抗和顛覆國民黨政府、中共的改革開放，以及十年前「六四」血腥鎮壓後接納了大批的逃亡者，都作出了舉世矚目的貢獻。同時，世界上每年紀念「六四」周年活動中，香港還一直是參與人數最多的一個中心地區。尤其是九十年代開始以來，以政黨政治發展為核心

的民主政治，在香港有了長足的進展。但是在九七年七月一日「主權」回歸中國以後，情況雖然比預期的要好，香港人民的基本生活方式並沒有改變，但是在政治選舉、新聞自由等許多方面開始打折扣了。特別是特區政府這次拒絕民運人士入境，使得王丹、嚴家祺、劉賓雁這些學者型又負民望的人無法到會，真正受損害的不光是王丹他們，而對「一國兩制」造成的傷害，其實更大。

在過去二十年中，台灣在快速發展經濟的同時，已經完成了民主轉型，政治民主化有了相當的發展，這已經獲得了國際社會的肯定，它與香港一起，為中國大陸人民爭取政治民主和經濟自由的改革樹立了榜樣，以致大陸過去有這樣的說法：「經濟學香港，政治學台灣」。台灣的反對黨制衡、新聞自由都已經相當成熟，不過台灣中華民國總統李登輝雖然是民選產生的，但他實行的基本上還是一種傳統威權統治，老百姓可以公開地天天罵他，並不影響他的實際權威；相反的黑金橫行，肆無忌憚，也許這就是「中國特色」的民主。足見民主政治並不是一蹴而就的，台灣的民主發展也還有待改進和完善，特別要避免民粹主義的傾向。

在放鬆搞活經濟的同時死死控制住政治，這種跛腳式的改革經歷了二十年以後，中共在大陸統治的合法性危機暴露得日益明顯了。因為江澤民、李鵬對自己掌握的權力，絕不如毛澤東、鄧小平那麼有信心，所以就一味採用傳統的方法——增加鎮壓異議人士和民主運動的力度，所謂要堅決地「把不穩定因素消除在萌芽狀態」，並冒天下之大不韙把王有才、秦永敏、徐文立等民運人士判處十年以上的長期徒刑。在這種情況下，大陸的中國人民在追求「五四」和「六四」提出的目標時，甚至要比以前付出更加艱苦的代價。

中國沒有完成民主建設的目標，當政者是有責任的，我們知識分子也是有責任的。以我自己為例，一輩子獻身新聞事業，也算是個緊跟時代開放步伐的新聞記者，但是也還殘留著濃厚的傳統意識，加上在毛澤東統治下生活了近三十年，共產文化在我身上有一定的烙印。要真正把民主當作自己的一種思維方式、生活方式、行為方式，也還有一個艱難而漫長的過程。儘管如此，我對中國的民主前途還是樂觀的。從「五四」到「六四」，證明中國人民追求民主的努力從來沒有停止過。證明世界的民主大潮不可阻擋。最近發生的法輪功信徒在中南海展示的萬人示威，反映了公民社會終要在大陸出現；當政者要以犧牲人民的自由來換取安定，適得其反。

今天在香港還能舉行「六四」紀念活動，體現了香港所具有自由民主的生命力；香港人能享受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正是對大陸人民的鼓舞。台灣民主的不斷進步，對中國大陸也是一種促進和推動；加上海外中國人的共同努力，我對整個中國的民主前途是樂觀的。我今

年足八十歲，活到一百歲還有二十年，我深信，在我有生之年，可以看到中國實現民主，而且是比美國還要健康的民主。在座的絕大多數都比我年輕，各位當然可以看到中國實現民主。君不見，「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

From May 4th to June 4th (Summary)

By Lu Keng

May 4th and June 4th were two prominent landmarks in the History of China in this century. To build a democratic new China was the common aim pursued by these two patriotic pro-democracy movements. The crux that democracy is still unsuccessful in China lies in the inveterate feudal autocratic traditio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hile struggling with Chiang Kai-shek and his KMT Government, used modernization and Democracy as their weapons. However as soon as they won the political power and established their regime, they became alienated and dispensed with democracy. Mao Zedong launched an "all-round politics" in the name of "the people", changing the traditional feudal autocracy into a full modern fascist personal autocratic dictatorship. In the Deng Xiaoping era, through glasnost, great economic success was achieved. However Deng denied political reform. He pulled down Hu Yaobang and Zhao Ziyang one after the other, and he cracked down brutally on the Tiananmen Pro-democracy Movement, resulting in that China still pays a heavy cost for this even today. Now China has begun a new "Jiang Zemin Era. However Jiang Zemin can only follow Deng's established rules. He is keen on power struggle. There is no sign he has the sincerity to make any substantial political reform in democracy.

When Hong Kong was a colony, although democracy was inadequate, its free environment and its rule of law had embraced massive escapees in history who fled the country in the 1911 Revolution, in the Sino-Japanese War, in the civil war between the Communists and the KMT Government, and after the June 4th crackdown, and it also had its contribution to the Glasnost in China. However after the return of sovereignty in 1997, it has retrograded in political election and freedom of the press. The refusal of entry of the pro-democracy activists to take part in an international

forum by the SAR Government has greatly undermined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Taiwan, in the past 20 year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at the same time achieved its democracy transformation. However democracy is not built in a day. There is still room for improvem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democracy in Taiwan.

From May 4th to June 4th, it has been proven the effort of the Chinese people pursuing democracy has never discontinued. Today the fact that Hong Kong can hold activities commemorating June 4th embodies the vitality of democracy and liberty. Democracy in Taiwan is advancing, which is a propelling and precipitating force to China, and coupled with the common efforts of overseas Chinese, the future of democracy in China is optimistic.

金鐘 / 《開放》雜誌總編輯：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論政傳統

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整整過去八十年了，在這二十世紀即將結束的時候，每個中國人都會問，八十年前那批熱血青年追求的目標達到了沒有？中國讀書人——知識分子有「在朝執政、在野論政」的傳統，回顧這個論政傳統可以看到五四運動的理想迄今還是任重而道遠。

從二千年前儒家提出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到明末東林黨不怕殺頭議論朝政，都體現著中國士子「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志向。近代以來，康有為、梁啟超鼓吹變法維新，為改變封建帝制使中國進入現代社會，揭開士人論政新的一頁。但是，知識分子只有透過媒體才能把自己不同於官方的政見深入、集中和持久地表達出來，因此，出版政論刊物便成為知識分子論政的必由之路。梁啟超（1873 - 1929）主編的《時務報》是近代第一份中文論政刊物，他辦刊物的熱情一直持續到辛亥革命前夕，長達十餘年，梁啟超平易暢達「筆端常帶情感」的政論風格，至今仍為行家們津津樂道。

《新青年》：五四運動後逐漸被中共控制

五四運動是中國現代史上一場偉大的啟蒙運動，這場運動和一本著名的刊物《新青年》聯結在一起。中國大陸知識界對《新青年》的懷舊之情至今未減，河南一家出版社不久前還將《新青年》二百三十萬字的文章分類出版，北京學者雷頤在最近的書評中，熱烈推崇陳獨秀的觀點：中國要脫離蒙昧時代，急迫先進民族，「當以科學與人權並重」，指出民主政治的根本在於個人人格的獨立，必須破除使封建專制制度長期穩定的那種依附性的社會倫理關係。

《新青年》創刊於一九一五年九月，先由陳獨秀主編，後加胡適、魯迅、周作人、錢玄同等人輪流編輯，到一九二二年休刊，共出版五十四期（以後完全成為中共刊物還出過九期）。《新青年》提倡民主、科學、新文學、新道德，反對專制、迷信、舊文學、舊禮教，已是眾所周知的貢獻。《新青年》辦了七年，最光榮的是五四前四年，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及魯迅的《狂人日記》都發表在此期間。五四運動後，《新青年》就逐步左轉，到一九二零年已成為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的機關刊物。一年後中共才成立，由此可見，中共對宣傳陣地的重視是由來已久。

據胡適說，《新青年》當時交商務發行，大約有超過二千份的銷路，因筆陣出名，觀點激進，在青年知識分子中影響大，可謂新時代的弄潮兒，但過份誇大《新青年》的地位是沒有根據的，因此刊後來斷斷續續出了幾年，都在共產黨人控制下，故中共對其歷史地位特別推崇。其實，在五四前後，西風東漸，全國學界相當活躍，各種社團、活動、出版物如「雨後春筍」，僅各地白話文刊物就超過四百種。（中共記入革命史的毛編之周刊《湘江評論》，其實只出版了一個月，而周恩來負責的《覺悟》只出了一期）。

胡適：五四運動民主自由精神的守門人

二、三十年代至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前夕，這段時期國共分裂，中共上山打游擊、長征到陝北根據地，國統區則在完成北伐統一與清黨後，開始了全面的城鄉經濟與文化建設。這十多年中最重要的三本政論雜誌是《現代評論》、《新月》、《獨立評論》。

《現代評論》創刊於一九二四年，綜合性週刊，由陳源（西滢）、徐志摩編輯，胡適、陳源、王世杰、郁達夫、沈從文、高一涵、凌叔華等是撰稿人，除政論外也發表文學作品，一九二八年底停刊，共出版二零九期。

中共歷史把《現代評論》定性為「反對革命」的刊物，其實，該刊只是一個有獨立精神

的、以「不附和、不攻訐、不空談」為宗旨的公共論壇。五四後，中國思想文化界兩股潮流逐漸分野，一股是陳獨秀、李大釗為代表的激進革命主義，導致中共的出現與暴力奪權的發展，另一股則是胡適為代表的自由主義和知識分子的社會改良主義。胡適一派傾向於走歐美民主科學之路，他們追求的是人類的基本價值，即人權、自由、公平、理性。在一個民智初開，經濟落後的社會，自由派當然比不上激進革命派有煽動力和號召力，他們雖然在內戰中敗給了共產黨，但是，他們的文化遺產最終又回到了中國大陸，成為今天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的思想資源。《現代評論》的主角就是胡適、傅斯年、陳西滢，該刊便成為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二十年來論政的重鎮。

《新月》原是一份文藝月刊，一九二八年創刊，一九三三年停刊，共出版四十三期，主要編者有徐志摩、梁實秋、聞一多、潘光旦、羅隆基等人。其撰稿者達一百七十人。《新月》造就了一個「新月詩派」，但從一九三零年起，《新月》也像《現代評論》一樣，大談政治，宣稱實際政治由有能力的人去幹，「我們的工作是批評的工作」。《現代評論》與《新月》因遭魯迅攻擊而被中共貶為反動刊物。

胡適，這位中國二十世紀最卓越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代表人物，不僅是新文化的旗手，溝通中西文化的大師，也是一位熱情的政論家和政論刊物的「發燒友」。他在《現代評論》與《新月》之後，又與丁文江、傅斯年等人創辦論政月刊《獨立評論》，影響很大。該刊從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七年，辦了五年，既反對左派學運也反對國民黨的獨裁專制。最高發行三萬冊。胡適在「無可如何的局勢裏為國家盡一點力」、「辦一個刊物來談談一般人不肯說或不敢說的老實話。」而且，建立了一個政論的專業準則，被他們奉若「宗教」：「公平的根據事實的批評和討論」、「不倚傍任何黨派，不迷信任何成見，用負責任的言論來發表各人思考的結果。」因此，作者一律用真名發表文章。

他們辦雜誌的辦法是，招集社員，每人每月捐出收入的百分之五，積三月後出版，很多作家亦以發表為滿足，不取稿費，以支持雜誌的出版。

儲安平：四十年代自由主義代表人物

八年抗戰（一九三七 - 一九四五）期間，國共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危亡成為知識分子的第一關注，北京、上海、香港相繼淪陷，政論作家們的鋒芒集中在抗日和批判投降派目標上，雖然有如張季鸞這樣傑出的政論家在影響朝野，但和五四傳統的民主科學訴求，有相當的變化，可以暫時按下不表。

一九四五年日寇戰敗，中共八路軍勢力壯大，國統區百廢待興，政風頹靡，全國面臨內戰的危機。只不過三四年功夫，國民政府兵敗如山倒，終於一九四九年退守台灣。中共奪取大陸政權，成立了共和國。

在中華民族這場空前劇烈的歷史轉變時期，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感到無比徬徨苦悶而又焦躁不安。在這不足五年的時間內，最值得重視的政論刊物，是儲安平主編的《觀察》雜誌（前身是重慶的《客觀》週刊，也是儲主編）。《觀察》一九四六年九月在上海創刊，每週末出版，每期六萬字。繼承胡適辦《獨立評論》的同人刊物路線。費孝通曾說《觀察》當年「風行全國」，知識分子很少不是它的讀者。《觀察》最高發行量達十萬五千份。

《觀察》為甚麼大受歡迎？因為儲安平帶有強烈的傳播自由思想的使命感並十分敬業。他在一封向胡適約稿請予支持的信中說，他全力灌注在刊物上，天天工作十二小時，事無巨細，親力親為，謝拒應酬周旋與大小集會。更重要的是，儲安平的政論不迴避當時最迫切的時局和政治問題，給歧途徘徊的人們提供分析。一方面，他嚴厲抨擊國民黨當局對言論自由的壓制動輒指斥報章「意圖顛覆政府」，宣揚英國反對黨的民主政治學說；另方面又尖銳指出，共產黨統治下不可能實現真正的民主，他留意到中共的出版物中從有無對中共的批評文字，而斷言中共統治下自由是有無的問題，而國民黨統治下，自由是多少的問題。

《觀察》雜誌終因它的自由主義立場，而於四八年底被國民黨內政部查封，罪名是「一貫反對政府、同情共匪，擾亂人心．．．．．」

一九四九年四十歲的儲安平，在中共治下的上海要求《觀察》復刊，周恩來批示說，既然有那麼多讀者，當然可以復刊。復刊半年後，被胡喬木封殺，改由黎澍辦一份《新觀察》，儲安平被調去新華書店當了個副總經理。他那自由有無的著名論斷首次得到印證。到了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中，儲安平終因批評中共「黨天下」，一鳴驚人而墜入深淵，不僅自由喪盡連人權也被全部剝奪。

《觀察》雜誌及儲安平的命運，表面上是因言賈禍，實則有更深層的原因，那就是中國共產黨和西方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影響勢不兩立。毛澤東在建國前寫的幾篇著名文章，從《將革命進行到底》到《唯心歷史觀的破產》，其中心意旨就是警告「民主國人主義者」「自由主義人士」放棄對美國的幻想。中共在擊敗國民黨之後，主要目標轉向拉攏、改造和打擊這批影響力甚大的自由知識分子，因為美國寄望他們將在未來中國演變中再顯身手。

而儲安平正是「民主個人主義和第三條道路」的代表人物，這是中共出版物中對他的明白定性。

台灣：自由論政薪火傳承之地

正如大陸學者謝泳所指出，儲安平的《觀察》是中國最後一本自由主義刊物。一九四九年中共當權以來，在長達三十年的時間中，毛澤東實行嚴酷的思想統治，禁絕言論出版自由，自由論政完全失去了空間。但是，在海峽另一邊的台灣，卻有不少知識分子承襲自由主義的薪火，在國民黨一黨獨大的壓力下，為自由論政的權利堅持抗爭，付出代價，終於換來了台灣政治制度的開放與民主。

一九四九年，胡適、傅斯年、陳源、羅家倫、梁實秋等一批和中共交過手的自由派著名學者抵達台灣，胡適首創論政雜誌《自由中國》。胡適赴美後雷震接任主編，一九六零年因反對蔣介石連任總統、籌組民主黨而入獄。五、六十年代，著名雜誌《文星》、《中華雜誌》、《文學季刊》、《大學雜誌》等在國民黨威權體制下，為維護言論自由作出可貴的努力。台灣論政趨勢的重要轉折是一九七九年的美麗島事件，政論雜誌《美麗島》的編輯們因舉行三萬人集會反對國民黨一黨專政而遭逮捕入獄，雜誌亦遭查禁。

美麗島事件為八十年代台灣黨外抗爭運動開闢道路，一時黨外運動風起雲湧，數十名黨外人士當選立委與縣市長、省議員，黨外政論雜誌出版達三十多家。台灣知識分子循論政之路參政執政，前仆後繼，終於迫使國民黨於一九八七年宣佈解除黨禁與報禁。令台灣民主化邁出決定性一步的無數有志之士中，人們不會忘記這些政治批評家：雷震、殷海光、李敖、陳映真、柏楊、張俊宏、許信良、以及為言論自由而自焚身亡的鄭南榕。在解禁後的台灣論壇上人才輩出、百無禁忌展現了中國二十世紀最佳的言論環境。

從北京之春到八九民運中知識分子的角色

幾乎與美麗島雜誌同時出現的「北京之春」民主潮，是獨裁者毛澤東死後，大陸社會的解凍現象。也是中共統治三十年後首次出現的自由論政運動。

在此之前，有過一九五七年的「大鳴大放」與反右運動和文革時期的大字報及紅衛兵造反刊物。這兩次浪潮中都出現過大量的批評言論和一批知名的不同政見者，如反右中的儲安

平、林希翎，文革中的遇羅克、李一哲，他們向中共的政治獨裁與思想專制挑戰，要求人權、法制與民主，這是中國知識分子在空前黑暗的暴政底下，迸發的不屈的閃光，這些勇敢的言者都為自己的言論付出了慘重的代價，遭殘酷批鬥、長期監禁，直到被殺害。

但是，反右與文革的整體氣氛，只是中共控制和御用下的言論失序，除個別言論外，都未觸及專制政權本質，尤其是不能擺脫迷信毛澤東神化毛澤東的局限，因而，談不上自由論政。

「北京之春」的論政熱潮終於有了突破，一批剛從惡夢中甦醒的中青年拿起筆，先由北京西單民主牆大字報開始，繼而演變成油印刊物，形成全國範圍的民刊熱潮，在不到兩年時間內，已知名的就有一百零六份刊物出現。不用註冊，製作簡陋，然而，它們破天荒地對中共的施政與歷史提出正面的批評與評論，要求重新評價毛澤東，要求結束中共的人治和個人獨裁，甚至向美國總統呼籲維護中國人權。

「北京之春」的論政浪潮中出現了黃翔、任曉町、魏京生、劉青、徐文立等一批不怕犧牲的民主鬥士，他們不像過去那些政論前輩薪火相傳，或深受西方文化影響，他們來自生活，來自現實的體驗，具有明顯的草根性，並不具有政治野心，純粹訴諸於議論。然而，以中共元老鄧小平為首的中共當權者，在對民主潮實行寬容加以利用之後，便迅速將西單牆封閉、取締民刊、並逮捕活躍分子。嚴密的專政手段，甚至使民刊轉入地下也難以生存。「北京之春」在它最知名的編輯魏京生一九八零年被判重刑後，不久就消聲匿跡了。

在震撼世界的一九八九年北京天安門學生運動中，知識分子扮演的基本角色，仍然是政論家。他們多次簽名上書，發表國是聲明，向學生演講，要求政治改革和新聞自由，直到政治學者嚴家其發出反極權主義的最強音：要求中國最後一位皇帝下台！知識分子始終沒有成為八九學運的主導力量，他們表現出缺乏政治操作能力而善為意見領袖的書生本色。

鄧小平血腥鎮壓八九民運後，中共當局十年來嚴守對新聞言論自由的封殺政策，中國政治的自由論壇，轉移到海外，流亡中的異見者與民主運動，創辦了若干刊物，以更為徹底和堅定的自由主義立場，針貶時弊，反省歷史，探討中國民主的未來。一向享有言論自由的香港政論界，在九七回歸後，也並未放棄為中國政改進言的責任。

必須指出，知識分子論政的客觀條件，今天已發生了很大的改變，當代傳媒的技術發展，使「文章報國」的傳統方式有所改觀，論政的空間擴大了，透過電波的力量可以越過高山和

海洋，也可以穿過鐵幕和竹幕。政論作家們不必在特定的刊物上踽踽獨行了。但是，論政手段的變化，不會改變對論政的要求：熱情、負責和表達的才能。因為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面對的是八十年前先驅者們的未竟事業，在中國正實現五四運動的理想：民主與科學，而面對的障礙是一個擁有空前強大的專制力量的執政黨。

徐邦泰：「六四」十年後的中國 法輪功風靡北京 京城 中南海疑懼義和團

廿五日一清早，《中國之春》同仁來電：「六四」後北京發生最大規模示威。路透社北京廿五日電稱：一名中國武術大師的數千名徒弟，周日在北京中南海外示威。三百多字的電訊，僅表達示威者起碼的要求：「我們希望一個較少限制的環境下練功。」其實，真正追蹤過法輪大法發展蹤跡的記者都明白，李宏志（應該是李洪志）並不僅僅是名「武術大師」，而發生這次示威則有它更為深層的社會原因。

一、

據說，在中國大陸，修練李洪志的法輪功的各界人士已有幾千萬人，長安街上五人一排的長龍般的練功人早已引起公安的警覺。警方早有規定，每個練功點人數不能超過一千人。

儘管李洪志自稱對政治不感興趣，並要求弟子不要參加政治組織，但是，當局對風靡北京城的法輪功仍然是充滿戒心，誰敢保證法輪功不會成為新的義和團。

何況李洪志本人都在《轉法輪》一書中這麼自我介紹：「前些年有許多氣功師傅功，他們所講的東西都是屬於祛病健身那一層次的。當然不是說別人的功法不好，我只是說，高層次上的東西，他們沒有傳。全國的氣功形勢我也都知道，在國內外，真正往高層次上傳功，目前只有我一個人在做。」甚麼是「往高層次上傳功」呢？李洪志回答：「那不就是度人嗎？」李洪志還告訴弟子：「真、善、忍是衡量好壞人的唯一標準。」

一九五一年出生的李洪志所書的法輪經有：轉法輪、轉法輪法解、法輪大法義解、法輪佛法大圓滿法、法輪佛法（精進要旨）、法輪佛法（在悉尼講法）、法輪佛法（在美國講

法)。

雖然，李洪志沒有自己的寺廟，不收「會費」、不搞組織，但是他在國內外還是有自己的輔導站和輔導員，這種練功性質的輔導網絡的存在已足以引起大陸公安部門的疑懼。包括公安在內的八個部委聯合關心「法輪大法」的傳功現象，其直接結果是天津一青少年雜誌載文批評法輪功，肇事引發天津公安局與天津的法輪功弟子發生衝突，四十多名法輪功弟子被毆打和被拘捕，事情鬧到京城，北京城成千上萬的法輪功弟子周日列隊在中南海外請願示威。示威者秩序井然，結果朱鎔基露面五分鐘，所有被捕的法輪功弟子全部釋放。

李洪志人在美國，並未露面就示威一事發言，但是，美國的廿五日，在紐約、舊金山和洛杉磯都分別有幾百名弟子去中共領事館抗議示威的活動。舊金山的中共領事館門外，上午九時至十二時，有二百多名法輪功弟子和平抗議。這些抗議一下子使李洪志名聲大噪。可不是，「六四」已十年過去了。能夠在京津地區發動成千上萬人進行示威，能夠在美國三大城市同步舉行示威活動，眼下恐怕所有的「海外民運團體」加起來，都難有這樣的運作能力。僅僅就此一點，就足以令人對李洪志刮目相看了。

二、

事實上，除了練氣功者和少數專門研究中國大陸社會的人士，絕大多數「民運人士」是四月廿五日後才知道有法輪功和李洪志的。包括《紐約時報》和《華爾街日報》在內的主要媒體，廿六日都以顯著的篇幅報導了法輪功在北京中南海的示威活動，和李洪志其人其事。雖然李洪志本人否認法輪功是個宗教教派，否認示威活動經過組織動員，但是《華爾街日報》仍然把法輪功的發展與白蓮教和太平天國相提並論，並認為，中國共產黨的最大威脅可能不是民運人士或是下崗工人，而是法輪功的創始人李洪志。這種評論有待時間的證實，但是，已經發生的事件已引起世人足夠的關注和思考。

一九九八年曾是海內外民運推動中國民主黨在大陸爭取合法註冊的一年。這種努力最終以徐文立、秦永敏和王有才等人士重判入獄落幕。平心而論，這次組黨活動，並沒有牽動大陸本土廣泛的社會層面，並沒有與民眾的切身利益結合起來。以致它在遭受嚴厲鎮壓後，也沒有在大陸本土引發大規模的反彈和抗議。

法輪功則不然，李洪志的信徒人數已超過達賴喇嘛，超過世界上任何一種新興宗教，甚至超過了中國共產黨的五千萬黨員。早在九十年代初期，北京政府已對法輪功心生警惕。中國人當然比美國人更知道自己的歷史，知道白蓮教、拜上帝會和義和團是怎麼回事。

法輪功的日漸擴大顯示，中國大陸仍然是塊有著自己傳統色彩和特點的黃土地。李洪志一九九二年開始在東北開班，吸引了數千名信徒，每周可賺進二萬美元，隨後李遷居北京。一九九六年李出版《轉法輪》。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中國氣功科學研究會開除李洪志及其學派。一九九八年初李洪志申請抵達美國。法輪功崛起之快，自有它許多的成功原因。

首先是法輪功的非政治化傾向令一九八九年後日趨政治冷感的中國大陸民眾容易接受它。如果不是這樣，江澤民和朱鎔基的家人又怎麼會練法輪功呢？

其次是法輪功的專業化特點其「好處」和「功效」吸引了中國大陸各階層人士。八九年上街的當然是青壯年人多，這次法輪功北京示威則是老年人居多，因為老年人比青年人更珍惜健康與生命。修練法輪功的老年人當然要挺身而出捍衛「練功」的權利。我們反觀「海外民運」在「爭取合法居留」時期的盛況，以及「綠卡到手，兵散將走」的低潮期到來，就不難理解，任何一項政治運動如果不能同參與者的利益結合，是肯定成不了氣候的。

再其次是法輪功的非組織化形式反而有助於信眾的蓬勃發展。如果李洪志向海外的中國旅美政治學會、經濟學會、全美學自聯和民聯陣學習，搞甚麼「法輪功全球代表大會」，通過章程，選舉正副主席，三權分立，其結局就可想而知了。李洪志似乎甚麼學歷都沒有，乾脆自比耶穌和佛陀，信不信由你，反正已有幾千萬人成了信徒。去年曾冒出一位叫彭明的，在北京成立了中國發展聯合會，曾揚言要發展五千萬會員，結果卻讓公安以嫖妓罪名判了勞教，被當局「消滅」在「萌芽狀態」了。中國大陸的特殊國情決定，現階段任何明火執杖的非官方准許組織，不管是政治、宗教或學術性的，都會遭遇麻煩。李洪志堅持說法輪功不是宗教派別，不是集團組織，其用心即在保護國內信徒的練功權利，亦即法輪功的生存權利。這種非組織化形式正是目前中國大陸任何非官方勢力的生存發展之道。

最後一點是法輪功的本土化聯絡方式，令信眾人數幾乎以幾何式速度成倍增長。李洪志不搞嚴密的組織，但是，練功性質的各地輔導站和輔導員在實際上就成為李洪志的信徒骨幹。這些具濃厚本土化色彩的人士在自己的鄉土發展新信徒，僅僅靠書和錄像帶就可以找尋到大批的同修。

三、

有消息稱，這次超過一萬人在事先有組織情況下，一夜之間包圍中南海，而公安部門竟然事先毫無所悉。這件事情已提醒當局不可低估具有宗教色彩組織的號召力。

也許在這次法輪功萬人示威事件上，北京的公安部門疏於職守，但是，過度的防範和鎮壓不正是示威事件的真正肇因嗎？天津公安人員拘捕法輪功弟子，大陸報刊對法輪功的攻擊都導致了衝突的升級。而這些問題似乎並不是當局樂意去考慮的。

法輪功萬人示威，讓李洪志在西方亮相。法輪功一下子名聞全球。不過，震怒的北京當局在軟硬兼施的同時，如果決定把李洪志列為異端分子或敵對分子的話，那麼，在海外政治流亡人士的名單上會正式加上一名極為重要的成員。而此後法輪功及李洪志在海內外的生存和發展一定會成為中國大陸民主化進程的一項指標。

西方人已經用白蓮教和洪秀全來比喻法輪功了。不過，北京當局和李洪志本人更多想到的則是義和團。當然，義和團同白蓮教洪秀全是同中有異的，其差異究竟有多大，我們只有拭目以待了。

辛灝年：五四、六四與中國民主過渡的艱難反復歷程

講者簡介：辛灝年，即高爾品，中國安徽巢縣人，一九四七年十一月生於南京，武漢大學畢業，中國大陸知名的作家和教授，中國作家協會資深會員。八九年「六四」之後曾七次領頭上街遊行，抗議中共天安門大屠殺，並憤而辭去了所有「社會職務和榮譽頭銜」（全國青年委員、省青聯副主席、省人大常委等）。嗣後，曾兩度應邀赴北美講授「中國現代史和中國新文學」。一九九四年擔任多倫多大學訪問學者。同年底應《聯合報系》邀請赴台灣作訪問研究。一九九五年夏應哥倫比亞大學邀請，赴美進行學術交流。翌年二月被哥大承認博士學位，聘為歷史學博士後研究員。一九九八年復擔任哥大客座教授至今。

辛灝年教授迄今已在中國大陸出版十餘部文學、歷史著作，來北美後已發表中國現代史專論近二十篇，並應邀在美、加十幾所大學和各地僑界講演「中國現代歷史反思」系列四十場，次次引起震動，已造成廣泛影響。他的歷史學新著《誰是新中國——中國現代史辨》一書的中、英文本，即將於美國出版。書名為許多旅美中國大陸留學生所建議。美國著名教授黎安友（Andrew J. Nathan）亦在他為此書所寫的序文中，指他的思想和理論「已經得到了熱烈反響和接納」。

相距七十年的「五四」和「六四」，又迎來了它們的紀念日。並且一個已經八十周年，一個也已經十周年。自「五四」到「六四」，期間七十年，中國該經歷了怎樣的滄桑，又渡過了何等苦難的歲月。自「六四」而至今，中國大陸人民又在遭遇著怎樣的磨難，更在凝聚著何等巨大的爆發。乍一看去，二十世紀的中國，似乎只是在「黑夜」中掙扎，然而，一旦認真反思，揭穿謊言，便能看見二十世紀的中國，曾閃耀過多麼燦爛的世紀之光，輝耀過怎樣光明的國家前途，又曾怎樣地更新在、並奉獻在這個複雜多變與戰火紛飛的世界之上是的，是到了該好好地看取自己祖國的時候了，是到了該認真地研究整個二十世紀中國的時候了，是到了該將近百年來的是與非，高屋建瓴地予以剖析、總結，並能夠接收經驗和教訓的時候了，是到了必須將當代中國大陸人民對於民主的萬難追求和百年來中國民主過渡的艱難反復歷程「接軌」，結合，然後再奮力拼搏的時候了。

一、中國民主過渡的勝利發端、艱難歷程、成功標誌和檢驗標準

第一、中國民主過渡的勝利發端和艱難歷程

二十世紀的中國，是一個正處在轉型期的國家，並且正處在從專制向民主過渡的驟變期和漸變期。說它驟變，是因為它在本世紀初爆發了推翻專制王朝和結束君主制度的民主革命；指它漸變，是指在它的轉型期充滿了進步和倒退的反反復復歷程。就它在世界範圍內的意義而言，則它既屬於近現代世界民主過渡的一個部份，又與近現代歐洲一些具有專制歷史的先進國家，在民主過渡的歷程上具有完全的一致性。而這個一致性的根本表現，就是它既具有一個輝煌的勝利發端，又具有一個艱難反復的過渡歷程。

顯而易見的是，中國民主過渡的勝利發端就是辛亥革命。因為「看一場革命的成敗與否，關鍵是要看這一場革命與其對象關係的變化。如果革命戰勝了她的對象，她便勝利而無疑；如果革命被她的對象所打倒，她便失敗而無疑。辛亥革命的對象是君主專制政體的清王朝。這個王朝不僅被這個革命打垮了，而且就此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君主專制制度，即帝制」軍軌，因此，辛亥革命是勝利的革命。

辛亥革命更是一場勝利的民主革命。因為由辛亥革命所創建的新中國中華民國，既與滿清王朝及中國數千年專制國統劃清了鮮明歷史界限，又與清王朝立憲改良派所追求的君主憲政，劃清了憲政性質的鮮明政治界限。就前者而論，自中華民國創建之後，一是整個中國「民主空氣濃厚，民主潮流高漲，民主憲政在實驗中。僅一九一二年，即中華民國元年，中

國出現的新政黨，已註冊者即達八十五個，政治團體二十二個。各種政黨合法並存，和平競爭，三權分立的國家體制基本上得以維繫。」其後，如果沒有袁世凱復辟帝制，可以相信，民主憲政是完全可能逐步地走上軌道的。二是中華民國的創建，在思想上不僅使得民主共和的理念深入人心，而且使整個社會出現了「敢有言帝制自為者，全國人民必將共擊之」的感人政治局面。在新聞輿論上，僅一九一三年七月前，各種民辦報紙已達五百餘家。它們以監督政府和報道民間疾苦為己任，上敢於指責批駁總統，下能夠匡正救助時弊。專制輿論的一言堂，瞬間即被民主輿論的多元化所代替。而在文化上，中國的新文化運動之所以爆發在辛亥之後，中國的白話文運動之所以成功在辛亥之後，中國的新文學在歷經晚清改良文學的「自將洗磨」之後，乃成熟、成形在辛亥之後的歷史事實，無非證明，正是辛亥革命，才為文化開拓了自由發展的偉大時代條件。三是中華民國的創建，徹底地打破了皇朝權力政治和專制改良型經濟對於自由經濟發生和發展的種種箝制和壓迫，從而自根本上打開了自由經濟發展的廣闊道路，「扭轉了革命前民族工商業的蕭條局面，各類私營企業競相出現，各種實業團體紛紛建立。」軍閥其在資本積累、經營規模和生產發展上均出現了清王朝改革開放時代所不能想像的巨大進步，使工業落後的中國，一時出現了被冠以麵粉大王、火柴大王等稱號的民族工業巨子。中國的民族工業在清政府近五十年經濟改革的基礎上，不僅從此獲得了突破性發展，而且迎來了它發展的第一個黃金時代。中國現代自由經濟形態，即社會化大生產與自由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因為辛亥革命的勝利和中華民國的誕生，而從它的艱難開拓期走向了它的開始成形期。

就後者而論，作為中華民國民主憲政之第一個象徵的，便是「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的制定。它一是中華民國當時的最高法律，具有憲法的意義；二是體現了「主權在民」的政治理想；三是依照三權分立的原則規定了中央制度；四是規定了對「約法」的嚴格修訂程序。作為中華民國民主憲政的第二個象徵的，則是國會和參眾兩院的建立。而作為中華民國民主憲政的第三個象徵的，乃是「天壇憲草」的起草。因為意在反對袁世凱獨裁和復辟帝制的「天壇憲草」，不僅繼承了「臨時約法」的民主建國精神，艱難地排除了袁氏的干擾，而且其第一章即明確規定：「中華民國永遠為統一之民主國」。第一百十一條更專門規定，中華民國共和民主的「國體不得為修正之議題」。

雖然，不論是前者還是後者均已經證明，辛亥革命乃是中國民主過渡的勝利發端，但是，近現代許多國家的民主過渡進程卻告訴我們，在民主革命初造成功、共和國體初獲創建之後，將仍然存在著民主革命與專制復辟的反復較量、持續較量和殘酷較量這樣一個艱難的歷史進程。在這個歷史進程中，由民主革命初造成功而創建的共和國體，完全有可能為形形色色的專制復辟勢力所推倒，從而在一定歷史時期內，甚至是在革命的名義之下，實現王位、王權、

王朝和專制制度的公然復辟、變相復辟或全面復辟。直至能因復辟的成功，而將整個專制統治推向極端。英國革命在歷經了四十八年革命與復辟的反復較量之後才在王冠下建立了民主政體的歷史，法國革命在歷經了八十六年民主與專制的反復較量之後才繼承和重建了法蘭西共和國的進程，俄國在遭遇了七十四年的共產專制復辟之後才重新走上民主道路的現實，特別是辛亥之後八十年來中國民主過渡的艱難反復歷程，確實已經證明了上述認知的正確。

第二、中國民主過渡的成功標誌和檢驗標準

既然任何一個有著專制歷史的國家，其民主過渡，都將存在著民主革命和專制復辟這樣一個艱難反復的較量歷程，所以，我們才要識別革命事件和革命歷程的關係，從而界定民主革命的歷史範疇，並將民主制度的最後確認和確立當作民主革命最後成功的標誌。這樣，我們才不至因「一葉障目」，而將辛亥之後民主進程的曲折發展和專制復辟的暫時得手，誤認為辛亥民主革命的徹底失敗；更不會僅僅因為專制復辟者以革命的名義，或打著共產主義革命的旗號來推動專制制度的復辟，而產生對於革命性質的錯識，直至造成「錯把復辟當革命和錯把專制當民主」這樣一類重大歷史錯誤的發生。這對於堅定民主過渡必成的信念，無疑有著重要的認識價值和理論價值。

但是，如何檢驗這個歷程，如何在這一艱難歷程中檢驗誰才是民主的推進者？誰才是專制的倒退者？特別是在形形色色的革命中，如何檢驗誰才是推進民主的革命？誰才是在實際上反撲民主的「革命」呢？這就需要標準，一個共同的檢驗標準。

這個標準，就各國的共同性而言，即是民主進步和專制倒退的標準。就中國而言，正因為辛亥革命是中國民主過渡的勝利發端，所以，辛亥之後在中國發生的任何革命與運動，只要它與辛亥革命一樣，倡行民主，實現民權，推行自由經濟，消滅權力經濟，反對任何名義之下的專制和專政，保衛和發展了辛亥革命的偉大民主成果，它就一定為民主革命而無疑。反之，則任何一個否定、反對、破壞甚至推倒了辛亥革命民主成果的「革命」，都在其根本內容上走向了民主進步的對立面。因而，不論它信奉過怎樣的「革命真理」，鼓蕩過怎樣的「革命激情」，懷揣過怎樣的「革命法寶」，又獲得過怎樣的「革命成功」，只要它否定民主，強行專制，終止進步，一心倒退，甚至將我們的祖國倒退到了較之滿清王朝更加專制極權，更加腐敗腐爛的境地，它就只能是真正的反動而無疑。

二、五四運動與中國民主過渡歷程的關係

當我們對自己祖國民主過渡的勝利發端、艱難歷程，及其與世界民主過渡所具有的共同性，已經有了一個清晰的認識；當我們不僅對自己祖國民主過渡的成功標誌已經成竹在胸，而且對自己祖國民主過渡的艱難反復歷程也找到了檢驗的標準之後，我們就能夠對五四運動與中國民主過渡歷程的關係，有一個清醒的認識和評價了。

第一、五四運動是辛亥之後第一次勝利的愛國民主運動

首先，指五四運動是一場愛國運動，是因為它由「外爭主權」而起。

一九一五年因袁世凱接受日本《二十一條》，就已經引起過日本留學生和國內學生及民眾的堅決反對。一九一八年五月，當段祺瑞欲借參戰（指歐戰）向日本借款以圖擴充皖系，並不惜以國家資源作抵押，與日本簽訂軍事協定，同意日本在我國駐軍時，軍用中國留日學生中的絕大多數人，遂立即在東京舉行示威遊行，表示抗議。其時，北京、天津、濟南、上海、福州等地亦相繼爆發了反對段祺瑞賣國的學生運動，從而為五四運動的爆發奠定了基礎。所以，一九一九年春天，當中國人民得知「巴黎和會」將把戰敗國德國在戰勝國中國山東的「特權」轉讓給日本時，一場以「外爭主權」為運動目標的，愛國的學生運動和群眾運動，遂由北京學生的率先發動，而鋪天蓋地席捲在中國的大地之上。這便是五四運動作為一場愛國運動的由來。

其次，指五四運動是一場民主運動，是因為，為了達到「外爭主權」的目標，就必須反對正在「假共和之名義，以行專制賣國之實」北京軍閥政府，即「內除國賊」。為了制止賣國政府在《巴黎和約》上簽字，在校長蔡元培的支持下，北大學生即於五月三日晚議決「通電巴黎專使不得在和約上簽字」，並於翌日五月四日，聯合北京十三所大專學校的學生，齊集天安門舉行盛大遊行示威。當日下午四時許，學生火燒曹汝霖宅，痛打章宗祥，軍風三十二名學生因此而被捕。五月六日「北京中等以上學校聯合會」成立，並再一次致電巴黎拒絕簽字。學生的愛國行動和政府逮捕學生的行為，激勵和激怒了全國民眾。京師總商會召開緊急會議，決定聯合全國各商會一起援助學生。上海、天津各地，各團體或個人紛紛電請政府釋放學生。山東省議會正副議長等四人赴京與山東籍國會議員議決要求釋放學生，並為山東問題失敗彈劾內閣，連國會也提案，誓不承認《二十一條》然而，曹、章、陸三人雖被迫辭職，但蔡元培因保護學生竟也被迫辭職。由是，北京中等以上學校聯合會遂再度決定罷課，並堅持提出「外爭主權、內懲國賊」的口號，掀起了更大的運動高潮。此後，面對著北京政府所採取的監控新聞、禁錮輿論、取締學生活動和為曹、章、陸辯護等做法，特別是總統徐世昌於六月一日下達責斥學生的命令，以及北京政府於六月三日逮捕演講學生一百七十八名，

六月四日拘捕學生八百餘人之等等倒行逆施，全國學生和各界民眾乃以「真理所在，死生以之；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的精神，在全國範圍內發起了規模更加壯闊的民主運動，「賣國賊存在一日，商學工界即輟業一日」的呼聲始響遍國中。五四運動由是而成為一場偉大的民主運動。

指五四運動是辛亥之後第一次勝利的愛國民主運動，是因為，在這一場全國性的偉大愛國民主運動的巨大衝擊下、壓迫下，六月五日，反動的軍閥政府宣布釋放學生；十日，軍閥政府被迫免去曹、章、陸職務；十三日，國務總理錢能訓辭職，軍閥政府總統明令禁止鎮壓學生運動；六月二十八日，巴黎和會代表在全國人民七千多份函電和法國三萬多名華僑及留學生的逼迫下，拒絕在《和約》上簽字。由是，五四運動不僅獲得了反對軍閥政府賣國的勝利，而且獲得了反對軍閥政府鎮壓人民民主運動的勝利。正是這一雙重的勝利，才使得五四運動成了辛亥之後第一次勝利的愛國民主運動，和中國現代歷史上真正學生運動和群眾運動的典範。

第二、五四愛國民主運動勝利的理由

然而，五四運動為什麼會取得勝利？

要想回答這樣一個問題，首先，還必須回答另外一個更為重要的問題，這就是五四運動為什麼只會發生在辛亥之後，而不會發生在辛亥之前？因為我們只有回答了這樣一個更為本質的問題，我們才能理解五四運動為何能夠勝利的根本歷史原因。

這個原因，說到底，就是因為只有辛亥革命，才帶來了五四運動賴以爆發的歷史條件。這個條件，具體地說，一是人民已經擁有了集會、結社，甚至是組黨的自由；二是人民已經擁有了思想、文化、新聞、出版的自由；三是因為軍閥的連年混戰才不可能再造專制一統的局面；四是五四運動爆發在中國人民反對袁、張復辟的「護國」運動已經獲得勝利，並正處在反對軍閥政府假共和、真復辟的「護法」歲月；五是五四運動正處在民主和專制正在公開較量、而非專制已經戰勝了民主的「復辟時代」。

另外，五四運動的勝利，還有賴於其時已經獲得了相當成功的新文化運動。因為，它在新文學運動上的勝利，和它在推動白話文運動上的成功，不僅發源於它的「實愛共和、厭棄專制」，即擁護共和進步、反對專制倒退的革命精神，而且，也正是它的發動和成功，一方面為革命戰勝復辟，即民主戰勝專制帶來了思想革命的前提，另一方面，便是為五四運動的

爆發，既創造了民主正在挑戰專制、革命正在挑戰復辟的時代氣氛，又為五四運動的爆發和勝利，奠定了新思想和新文化正在獲得廣泛普及的社會基礎。

這才是五四運動不僅能夠爆發，而且能夠取得勝利的原因。

第三、五四運動不是中國共產革命的誘因

一個奇怪的現象是，一九八九年之後，特別是在海外，竟突然出現了一股奇異的思潮。這個思潮的要害，雖然是要否定一九八九年在中國大陸爆發的六四民主運動，然而，為了否定六四，這個思潮竟連同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也一起予以了否定。其否定的理由，便是五四運動和托名五四的新文化運動，誘發了中國的共產革命。

這個否定和這個否定的理由又該是怎樣違背了歷史的基本事實。

歷史的事實之一：首先，為五四運動創造了時代氣氛和奠定了社會基礎的新文化運動，其作為一場「寶愛共和，厭棄專制」的思想革命，標舉的是「民主與科學」，追求的是人權和民權，推崇的是科學和崇尚科學的精神，批判的是傳統思想文化中專制的思想文化成份，反對的是專制政治和專制制度的復辟。因而，新文化運動才既不是依據馬克思主義所發動的一場思想運動，更不是要標舉馬克思主義的一場共產革命。其次，新文化運動作為在思想革命前提下所發動的一場文化革命，它還有兩個組成部分。一為白話文運動，二為文學革命。前者固然與馬克思主義思潮沒有任何關係，後者，直至中共在蘇俄扶植下成立，從理論到實踐都不曾有過馬克思主義的任何侵入。由魯迅小說《狂人日記》所代表的那一聲「吶喊」，要揭穿的無非是「中國數千年專制的歷史乃是吃人的歷史」這樣一個主題。以魯迅為首的作家所創作的其他文學作品，目的雖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卻根本沒有開出過任何一張「馬克思主義和共產革命」的藥方，來作為救中國的靈丹妙藥。至於一九二一年中共在蘇俄的直接扶植下成立之後，立即秉承列寧「黨的組織與黨的文學」的專制政治要求，不僅要把文學變成「共產革命機器上的一顆螺絲釘」，甚至還提出了要建設「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口號，這就恰恰成為對志在「反文以載道」的新文化運動的反撲和反動了。

歷史的事實之二：五四愛國民主運動以「外爭主權、內懲國賊」為目標，因無任何「主義」作為其後盾，才能激起社會各界和最廣大群眾共同起來以支持之，參加之。如果說全國工人罷工乃標明「中國的工人階級已經走上了政治舞台」，那麼，早已在反袁、反張復辟中就罷過市，更於五四運動中先於工人罷工罷市的全國商人，即中國的「資產階級」，豈不是

更有資格走上政治舞台嗎？中國共產革命的發起者們，無非是要借用這一場偉大的愛國民主運動，來作為它一心要「登上政治舞台」的背景和理由，更要藉此來製造它的「歷史必然性和政治進步性」罷了。

歷史的事實之三：雖然中共侈言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乃使中國工人階級走上了政治舞台，並「由此而建立了中國共產黨」，但是，一九二一年七月，即在新文化運動已經獲得巨大成功，五四運動早已奪取了愛國民主勝利之後，中共在蘇俄直接扶植下召開「一大」時，其黨員總數只有五十三人，代表僅有十三人，並以鄉村小地主出身的不仕子為主體，更無一人是工人階級。即便是到了一九二三年初，當中共在蘇俄命令下向國民黨謀求「容共」時，它的總人數也僅僅只有一百三十二人。其創黨元年所得民間捐款的總數僅只有一千元（參見下卷）。這才是共產國際代表既要對中共明言「共產黨參加國民黨就是要挖走那些崇拜國民黨的知識分子、學生、包括工人」軍火的緣由，更是一九二四年後直至一九二七年，中國共產黨仍然只能借「幫助」國民黨，才能於暗中建立和發展中共組織的根本情由。因而，正確地說，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乃是對中國國民革命，即中國民主革命的巨大推動，而非誘發中國共產革命的原因。至於中國共產革命的誘因究竟何在，那就不是本文所要討論的問題了。

第四、五四運動是檢驗中國民主過渡時期形形色色學生運動和群眾運動的標準

沒有疑問的是，檢驗中國民主過渡的標準，也是檢驗五四運動的標準。然而，也正因為五四運動是辛亥之後第一次勝利的愛國民主運動，所以，它才是一場推動了中國民主過渡歷程的學生運動和群眾運動。由是，五四運動，才又成了檢驗整個中國民主過渡歷程中形形色色學生運動和群眾運動的標準。這個標準就是：自五四以後，在中國所發生的任何一場運動，只要它是一場由學生或群眾自發的，而不是為某些政治力量所操縱，或乾脆是由專制統治者所謀劃、所指揮的運動，它便是一場真正的學生運動或群眾運動，反之，則只能是一場運動學生和運動群眾的運動。此其一。其二，自五四以後，在中國所發生的任何一場學生運動或群眾運動，只要它追求民主和反對專制，而不是擁護專制和反對民主，它就是一場真正的民主運動，反之，則是一場破壞中國民主過渡進程的學生運動和群眾運動。其三，自五四以後，凡是在國難當頭的歲月裏，意在真愛國，而非假愛國，更不是藉愛國的名義以營一黨之私的「學生運動和群眾運動」，才是一場真正的愛國運動，否則，則只能是一場虛假的愛國運動。其四，五四運動在遭遇反動軍閥政府鎮壓時，所表現出來的偉大正義力量和巨大反抗精神，特別是它「外爭主權和內懲國賊」的勝利，尤為其後歷次民主運動留下了一個勝敗的標準，即愛國目標是否達成，民主進取是否實現的標準。其五，五四運動還對那些作為愛國民主運動對立面的政權，留下了一個是順應民主進步還是強行專制倒退的明確檢驗標準。

三、六四運動與中國民主過渡歷程的關係

歷史似乎是與我們中國人民開了一個偌大的玩笑。因為，在五四運動七十年後，在那個自稱是一個革命政權和共和國家的中國大陸，竟然爆發了一場聲勢浩大，卻又極其悲慘的學生運動和群眾運動。十年來，對這場運動，雖然在中國大陸民間，在海內外一切具有起碼良知的人士當中，並不存在著對它肯定和否定的問題，甚至由於感情的原因，中國大陸人民更不允許有任何對它的批評和不公。但是，在海外，它，和它的發動者們，卻已經不止一次地遭遇了批評、批判，甚至是圍剿的命運。因此，時當它的十周年之際，對它與七十年前五四運動的歷史關係，特別是它與整個中國民主過渡進程的必然聯繫，予以較為理性的歷史分析，也就顯得十分的必要。

第一、「六四」是一場民主運動

蓋因我們不僅擁有了檢驗中國民主過渡進程的標準，而且擁有了檢驗發生在中國現代歷史上形形色色學生運動和群眾運動的標準，那麼，要想確知一九八九年爆發在中國大陸的六四運動，究竟是一場什麼性質的運動，也就是一件並不困難的事情了。因為，以五四運動的標準來檢驗六四，首先要肯定六四的，就是它乃是一場自發的學生運動和群眾運動，因而，也就是一場真正的學生運動和群眾運動。其次，它的呼喚新聞自由、呼喊反對官倒、腐敗和要求與政府平等對話的明確呼聲，又證明了它恰是一場追求人民民主權力和反對專制腐敗的民主運動。再者，則是在它遭遇殘酷的鎮壓之時和之後，由全國的學生和群眾所迅疾表現出來的劇烈反抗行為，又證明了它自身在民主追求上的巨大進步和徹底覺醒。由是，我們稱六四是一場偉大的民主運動，也就毫不過分。

第二、五四運動和六四運動的歷史比較

然而，僅僅證明了六四運動是一場民主運動，還不能說明它的全貌，更不能將它爆發的政治意義和歷史意義予以更加深刻的說明。因為，我們如果不能將相距了七十個年頭的五四運動和六四運動，進行一番認真的比較，我們便不能看出「六四」和「五四」的區別，便不能對我們所處的時代有一個甚為清晰的認識，更不能對六四運動和中國民主過渡艱難反復歷程的關係，有一個更加明確的認知。

歷史已經告訴我們，五四運動不僅爆發在辛亥之後革命與復辟，即民主和專制正處於公

開較量的時代，而且還處在一場偉大的反復辟的思想革命，即新文化運動已經取得了重大成功的歲月。而六四運動卻爆發在中國大陸已經遭遇專制復辟整整四十個年頭，中共專制政權為了自救而正在推行經濟改革、卻決然不願施行政治改革之時。所以，五四運動才欣遇了一個人民已經擁有新聞、言論、集會、結社之相當自由的時代；相反，六四運動卻遭遇了一個人民的上述自由早已經被剝奪罄盡的時代。此其一。

其二，五四正處於一個能夠高舉著科學和民主大旗的時代，因而能夠公然地反對軍閥政府「假共和之名，以行專制之實」。相反，六四卻處於人民不能也不敢高舉科學和民主大旗的復辟時代，因而才不能公開地反對中國共產黨「假革命之名，以全面重建專制制度和全面復辟專制統治」。所以，前者才敢於高喊著「外爭主權、內懲國賊」的口號，以公開地要求，甚至是激烈地反對軍閥政府，而後者卻只能夠聲稱是「要求新聞輿論自由，反對官倒腐敗和期求政治改革」，以曲折地反對專制統治。

其三，正是由於上述原因，偉大的五四愛國民主運動才在對軍閥政府鎮壓的猛烈抗爭中成功了，獲得了「外爭主權和內除國賊」的勝利，軍閥政府雖然企圖鎮壓，卻不敢鎮壓，更不敢施以大規模的血腥鎮壓，甚至只能以讓步、認錯和「拒絕簽字、懲辦國賊」為告終；偉大的六四民主運動卻在中共專制極權統治者們殘酷的和血腥的鎮壓下，讓腥風血雨灑遍神州。從而使得中國大陸甚至是海外的中國民主運動，都開始陷入了它的低潮期。

由此可知，兩個民主運動雖然在時代條件、思想基礎、政治立場和勝敗結果上存在著上述重大的差別，但是，同作為偉大的民主運動，它們根本的相同之處，還是在於，它們均爆發在中國民主過渡的艱難反復歷程之中；而它們根本的不同之處，則是一個爆發在革命與復辟正處在公開較量的歲月，一個正處於已經實現了全面專制倒退的「復辟時代」。雖然這個復辟及其成功，乃是在「革命的名義之下」，猶如北洋軍閥們的企圖復辟和實現復辟乃是在「共和的旗號之下」一樣。雖然中共的復辟乃為北洋軍閥們的復辟所不能比、也不該比。

第三、六四與中國民主過渡歷程的關係

首先，我們仍應指出的是，六四運動如同五四運動一樣，也是中國民主過渡歷程中的一場民主運動。其次，我們則應該指出，六四運動乃是一場於專制的全面復辟時代，與以革命名義下的專制復辟進行抗爭的民主運動。再者，六四運動還是處於復辟時代和專制改良

時期的，一場從期求中共政治改良而迅速地走向了對中共徹底絕望的民主運動。雖然它失敗了，但是，以革命思想來代替改良思想的時代，卻因它而悄然來臨。另外，六四還是造就中共專制復辟政權必然失敗的一個政治「死結」。因為，不論是在朝的還是在野的中共改革派，即不論是體制內外的政治改良派們，均把平反「六四」當成了挽救中共專制復辟王朝的一劑苦藥良湯。然而，事實上，即便是由中共來平反「六四」，都已不可能再挽救中共必然敗亡的命運。更何況一個殺人越貨的慣犯，又焉有資格來為他所殺者和所偷者平反。因為，已經經歷過中共專制暴政和專制「仁政」，即所謂改革的中國大陸人民，今天，面對著不論是捲土重來的專制暴政，還是捲土重來的專制改良，即不論中共專制統治者是要抽刀斷水，還是要橫刀奪命，都既不可能再被壓服，又不可能再受欺騙了，而只能招徠他們對於整個專制制度的徹底反叛。革命，作為歷史的一個不拘任何形式的普遍變革進程，亦終於到了它應該到來的時候。今日遍及中國大陸的自發的人民反抗運動，便是明證。

四、孫中山的民主建國思想與中國民主過渡的必將成功

如果說五四運動因爆發在革命與復辟，即民主和專制公開較量的時代而獲得了勝利，六四運動卻在中共極端殘暴的大屠殺之下歸於失敗。前者雖然有助於我們認識中國民主過渡進程和檢驗其後的形形色色學生運動和群眾運動，後者則向我們指證了：中共政權乃是一個為軍閥復辟政府和袁世凱復辟帝國所不敢稍比的專制復辟政權。並且，如果我們還要將檢驗中國民主過渡歷程的標準來檢驗中共的「革命」，中共的統治，和中共七十餘年來的一貫倒行逆施，及其所欠下的億萬血債，則中共的革命就是對孫中山民主革命和民主建國思想的徹底背叛和反動，和對辛亥之後中國民主進程的巨大破壞。正是這一認識，才為當代中國大陸人民對於民主的萬難追求，提供了明確的認識前提和明智的現實追求。

這個明確的認識前提就是：中國民主過渡的艱難反覆歷程，不僅已經證明了孫中山志在追求民族獨立、人民有權和民生幸福之三民主義思想的完全正確，而且證明了孫中山先生志在還政於民的「軍政、訓政和憲政」之革命進程理論的十分英明，和孫中山曾一再明確指出過的，「革命前必須堅定地反對專制改良和革命後必須堅定地反對專制復辟」思想的極其精闢。特別是在辛亥之後，當中國的民主過渡已經遭遇形形色色專制勢力的公開反撲或公然復辟時，由他所高舉和交代的「護國和護法」的旗幟與任務，即「保護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的嶄新國統不遭顛覆和維護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的共和法統不遭閹割」，則從根本上指出了整個中國民主過渡的歷史任務和基本方向。已經經歷了十數年民間歷史反思運動的中國大陸人民，今天，確實已經重新地認識到了這個歷史任務和根本方向。

這個明智的現實追求就是：在中國大陸人民已經認清了孫中山民主革命和民主建國思想的歷史正確性，認識到了中國民主過渡的艱難反復歷程及其成功經驗和失敗教訓，特別是明確地認識到了中共的「革命」和統治，乃是一場革命名義下之曠日持久的殘酷專制復辟之後，終於產生了不僅要將自身對民主的萬難追求與孫中山民主革命和民主建國思想「接軌」，而且要和整個中國民主過渡的歷史任務、根本方向和艱難歷程「結合」這樣一個明智的追求。這就為當代中國大陸人民對民主的萬難追求，在思想、理論、目標、成功標誌和檢驗標準上，帶來了與整個中國民主過渡的完全一致性。猶如清政府那一場專制改良的結局，便是一場偉大民主變革的到來一樣，中共推行專制改良以自救的結果，亦同樣會迎來一場偉大的民主變革。只不過這一場偉大的民主變革既是對前一場偉大民主變革的繼承，又是對前一場偉大民主變革的完成。偉大的中國民主過渡，勢將與近現代世界的一些先進國家一樣，終於在歷經了革命與復辟、民主和專制之慘淡較量的主體歷程之後，就要迎來她從專制向民主過渡的最後成功了。

今天，如果我們要套用孫中山先生在一九零四年所說過的話來說，就是：「中國正處在一場偉大民主變革的前夜，中共專制復辟政權正在迅速地走向覆亡，只要星星之火，就能夠燃成燎原之勢。」

前夜已經來臨，變革必將成功。孫中山先生民主建國的偉大理想一定能夠實現。中國的民主過渡一定能夠走向最後的成功。

註釋

高爾品：長篇小說《少夫人達琳》第三二一頁。人民文學出版社，北京一九八九年七月第一版。

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近代史編寫組」編寫的《中國近代史》，第四二八頁。

同上，第四八二 - 四八八頁。

一九一八年五月，段祺瑞政府與日本簽訂《中日陸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和《中日海軍共同防敵軍事協定》，日本由是而獲得了在我國東北和內蒙駐軍的特權。

曹汝霖為交通總長，訂立《二十一條》時為外交次長；陸宗輿為幣制局總裁，訂立《二十一

條》時為駐日公使；章宗祥為駐日公使。

《張國燾回憶錄》，香港明報出版社，一九七零年。

孫中山：「中國問題的真解決」。原話是：「中國正處在一場偉大民族運動的前夕，清王朝正在迅速地走向死亡，只要星星之火，就能燃成燎原之勢。」

蔣培坤，丁子霖：十年觀察 十年思索

（一）

十年前發生在北京的天安門民主運動和「六四」事件，無論對於自四九年以來在中國大陸掌握政權的共產黨來說，還是對於半個世紀以來追求自由、民主的中國政治反對力量來說，都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大政治事件。它不僅在規模上是空前的，而且其性質也有別於以往任何一次群眾性政治運動。

五七年的「鳴放」、「反右」，是毛澤東搞的一場「陽謀」，但參加「鳴放」的知識分子，除少數曾接受過西方自由主義的洗禮，多數人則仍然是承襲中國士人「欲以天下為己任」的諫議傳統。六零至七零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發動的一場權力集團內部尤其是高層集團內部的清洗運動。而被捲入到運動中去的絕大多數普通民眾，則是出於對毛的忠誠和對各級官僚體制的不滿。至於七六年的「四五」天安門運動，則是一場憤怒聲討「四人幫」禍國殃民、呼喚黨內開明派結束「文革」極左路線的民眾抗議運動。這三次大的群眾性政治運動由於都曾給國家和民族帶來不同程度的甚至是災難性後果而影響了共產黨在民眾中的威信，但在普遍民眾中，除少數先進分子之外，一般都把運動所造成的後果歸因於黨的領導人在政策上的失誤，或者如共產黨自己所解釋的那樣，是由於黨內副領導人犯了「路線性錯誤」。因此，每當一次運動過後，老百姓雖然不無抱怨，卻從未失去對共產黨的信任。而從中共執政者這方面說，也正因為民眾對共產黨有這樣的基本信任，他們才有信心和勇氣在事後對運動中的錯誤或傷害作出有限度的「檢討」，並對運動中的受傷者進行「道歉」或作出「平反」、「昭雪」的舉措。

然而，中共執政者在如何對待「六四」事件這個問題上，卻開始了一個歷史的轉折。時至今日，十年過去了，中共執政者非但沒有對當年的事件作出過任何「檢討」，反而一再宣

稱：已經作出的結論不能改變。對於中共執政者這種不留餘地的強硬立場，很多人表示不解。他們根據以往的經驗，認為一個領導人去世了，他的繼位者總會有所改變。在「六四」這樣是非曲直不容爭辯，而是明抱著遲早要解決的問題，不談徹底「平反」也總該有所鬆動才合乎常理。然而，令人遺憾的是，中共新一代領導人面對國內民眾和國際社會的一再呼籲卻始終不為所動。這究竟是為了甚麼？在我們看來，這裏只能有一種解釋，那就是當年鄧小平對八九民運的鎮壓做得實在太錯了，以至於他不僅沒有給自己而且也沒有給他的繼位者留下任何回應的餘地

（二）

這十年來，我們作為在那場屠殺中失去兒子的父母，作為自願從事「六四」受難者專訪和救助活動的普通公民，時時處處都能感覺到有一種巨大的壓力威迫著我們，有一把無形的利劍懸掛在我們的頭頂。我們也曾有過幻想，覺得那麼多平民百姓被無辜地殺害了，如果中共當政者還有一點人性的話，總該會有一些起碼的同情心，至少不應該再對那些失去親人的父母愛兒施以淫威，甚至連他們接受世人同情和幫助的權利都要被剝奪！有時我們從電視屏幕上看到那些手操生殺大權的中共領導人「慈祥」地疼愛著自己的兒孫輩，我們真想問問他們，假如災難落到他們的後輩身上，他們又會怎樣呢？歷經磨難的中國人大概都會懂得政治是無情的。但是，在共產黨已宣布「結束」了階級鬥爭的今天，難道人與人之間還是像以前那樣，除了政治上的你死我活不再有別的？難道在共產黨人所講的「政治」之上再沒有更高的價值？在這十年裏，我們曾經有過困惑，也曾有過痛苦的思索。我們想到了中共「建國」初期的「鎮反」和「肅反」，想到了五十年代的「反右」和「大躍進」，想到了六十年代初的所謂三年「自然災害」，想到了十年「文革」和遇羅克、張志新的死，想到了「四五」運動和民主牆運動，我們想到了一個觸目驚心的數字——在將近半個世紀的各種運動裏，屬於非正常死亡的同胞竟高達六千萬。我們終於明白了，這是一個制度性的必然，只要在一個國家裏存在著共產極權制度，就談不上甚麼人性和人道。人們的不幸和災難也就不可避免，這種災難不是落到我們頭上，也必然會落到別人的頭上。

發生在八九年的那場殺戮，正是中國的極權體制造成的。鄧小平在他成為中共「第二代」領導人之後，拋棄了「第一代」領導人毛澤東的很多做法，卻並沒有從根本上拋棄毛澤東奠定的共產極權體制。鄧的一生始終是這種極權體制的忠實擁護者。與其他共產國家有所不同的是，中國的極權主義者除了領袖的個人專斷，更注重於通過「群眾運動」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在以往的歲月裏，毛和鄧一起，曾經一次又一次地發動過這樣的「群眾運動」，但他們絕不允許運動的參與者有自己的訴求。這類「群眾運動」的最典型的形態大概要算「反右」與「文革」了。但是，人們經歷了「文革」後的痛苦反思，尤其是經歷了整個八十年代

的思想啟蒙（用官方語言講就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終於覺醒了，一向被別人當作工具來發動的「群眾」開始自己行動起來了，而且有了自己的訴求。從此，中國的群眾性政治運動也就與以往的舊式政治運動有了區別，重新孕育、形成為現代意義上的公民運動。如果說七九年的民主牆運動是中國現代公民運動的先聲，那麼八九年的天安門民主運動，則可以說是這種運動的一次規模空前的演習。八九天安門運動不是由共產黨發動的，也不是得到共產黨默許的，整個運動也不再像以往的運動那樣，僅僅以共產黨的號召為口號，而是以相對獨立的立場，從體制外提出民主的訴求和要求維護公民的自由權利。正是因為這一點，它一開始就超出了中共強硬派的容忍度，使得中共第二代領導人鄧小平決意不惜一切代價去把這場運動鎮壓下去，也正是因為這一點，使得中共的第三代領導人至今仍不能從鄧小平那裏前進或後退半步。

凡真理都是樸實的。有些事情在某些理論家那裏也許畢其一生都想不明白，或者想明白了也沒有勇氣說出來，但在普通老百姓那裏，卻常常是一句脫口而出的「大白話」。最近，一位「六四」難屬在接受海外媒體採訪時說了這樣一句話：只要共產黨在，他對平反「六四」就不抱希望。這是一位普通工人，他的話也許說得過於絕對，也許他說不出更多的道理；但他卻把道理說到了「點」上。對於今天的中共執政者來說，推翻對「六四」的定論，無異要他們放棄所維護的制度。

（三）

世界上的任何事物，凡存在的都是合理的。但是，一切現在的存在或遲或早都終將失去其現實性，從而失去其存在的理由，一個不去否認的事實是，當十年前中國爆發天安門民主運動的時候，也正是世界範圍內共產極權制度面臨失去其存在合理性的時候，而且正越來越顯露其歷史的謊話。這個過程在前蘇聯及東歐所謂社會主義陣營早已發生了。中國要遲於七十年代末也開始發生了變化。最初是一批先進者對荒謬的個人崇拜及「文革」的荒謬開始了認真的反思。接著是民主牆人士對自由、民主和人權的呼喚，再接著是七十年代末開始的十年思想啟蒙。應該承認，八十年代的這一次的思想啟蒙，是中國自上世紀開始至本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第二次形成接受傳播西方現代文明的高潮。它雖然被共產黨內的專制守舊者和強硬派貶斥為與西方「和平演變」相呼應的「自由化」思潮而達到一次又一次的抵制及掃蕩，但它畢竟打開了共產黨長期以來嚴加設防的思想閘門，極大地衝擊著一切僵化教條和極端專制主義的陳舊事物。

在共產黨的詞典裏，一向把體現人類普遍價值的現代西方文明包括自由、民主、人權等等稱之為資產階級的「自由化」，而且始終把這種所謂的「自由化」視為威脅其極權體制的

「天敵」。這種情況即使在八十年代初實行「改革開放」以來，也沒有絲毫的改變，而且，隨著這種「自由化」思潮的大量湧入，中共領導層的實權派很快因極度的恐懼而變得極度的僵硬。這正是他們要以機槍、坦克來對付和平示威者的一個重要原因。八九年的事件以後，事情發生了根本變化。從「六四」鎮壓中對立起來的「第三代」領導人，由於其權力的合法性受到質疑，也由於其自身缺乏自信，則從極度的恐懼一變而為極度的神經衰弱。八九以前的第二代領導人還曾勉強發動過幾次「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批判運動，而八九以後的第三代領導人則連短命的批判運動都已搞不起來，只能用警察、監獄和放逐來對付所謂西方的影響以求得社會和政治的「穩定」了。

一個政權的握有者竟脆弱到如此地步，還能期望他們拿出足夠的勇氣來面對自己以及自己的前任犯下的歷史罪惡嗎？

(四)

近年來，一些西方政治家和「中國問題專家」堅持認為，隨著東西方冷戰的結束，國與國之間不同社會制度、不同意識形態的衝突已成為過去，代之以不同經濟發展、不同文化因素的碰撞與融合，因此他們聲稱，不能再用昨天的老眼光去看今天的中國。我們認為，現在說這樣的話還為時尚早。不錯，像五、六十年代那樣「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的冷戰格局確實已成為過去。但是，世界範圍內的共產極權制度並沒有最後消亡。至少在中國、北韓等幾個國家裏還依然存在著。雖然，這些國家的共產黨領導人已沒有了昔日那種對制度的信心，但他們並沒有放棄這種制度。這決定了他們不可能完全從昨日的冷戰陰影中走出，因而也就不可能像一些西方政治家所期望的那樣用一種新的眼光去看今天的世界。這裏可以舉出中國國務院總理朱鎔基為例，有不少人認為他在中共高層權力團裏算是開明的，他的這次訪美、訪加，也確實博得了一些人的讚賞和好感。但是，只要稍稍思量一下他發表的言論，人們就不難發現，無論在涉及到像科索沃那樣的國際問題時，還是在涉及到像人權、民主和「六四」那樣的國內問題時，他都沒有也不可能從中共固有的意識形態立場上作出任何改變。他的講話除了比江、李多了一份圓滑，實質上並無區別。

人權、民主與「六四」，這些問題對於當今的中共執政者來說，都是攸關共產黨本身及其制度存亡滅絕的大問題。因此，儘管他們賴以維持統治的權力基礎已大大削弱，但只要能把這種統治維持下去，他們是絕對不會在上述問題上作出讓步的。現在人們所看到的，只是具體策略層面的一些調動而已。

(五)

近年來，更有一些中國問題專家紛紛發表評論，他們說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的東方大國正在崛起，並預言即將來臨的二十一世紀將是中國的世紀。也許，這些說法有所誇大，但並無大錯。不可否認，今日的世界格局和國際環境對中國的發展是極為有利的。這不僅是指經濟的發展，而且是指制度的變革。但是，在我們看來，與一個崛起的中國相伴隨的，將必然是一個衰落的中國：崛起者，一個自由的中國、民主的中國、充滿活力的中國；衰弱者，一個奴役的中國、專制的中國、腐敗的中國。二十年的改革開放，如果單就中共權力集團而言，可以說既有所得，又有所失。在兩個十年中，它贏得了第一個十年，卻失去了第二個十年。在最前一個十年裏，它放活了經濟，使很多中國人擺脫了貧困，看到了希望，從而獲得了民心；在第二個十年裏，它打壓了要求政治改革的民眾，喪失了勇氣，丟掉了時機，致使整個社會腐敗成風，政情、社情嚴重失衡，舉國上下民怨沸騰，從而失去了其權力的民眾基礎。今日之中共，已不再有昔日的「絕對權威」，也不再有昔日的感召力，更不再有昔日那無所不在、無往不勝的控制力：它越來越陷入了進退維艱的兩難境地。今天，擺在中共執政者面前的問題是，它是否願意為中國的崛起、為全體國人的福祉、為使中國在未來世紀變成為受人尊敬的國家而放棄對權力的壟斷，放棄一黨之私利。

今天，擺在國人面前的同樣是一個兩難的境地：或者是為了從中共的所謂「改革開放」中分得那麼一點「實惠」而以自身的自由與尊嚴做抵押，或者是為使自己和自己的下一代早日成為自由人類的一員而承擔起公民的責任。在過去的二十年裏，多數民眾的生活狀況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變，但如果以為這是共產黨賜予的並容忍這種賜予，那麼所得到的那麼一點「實惠」將早晚會失去，事實上現在已經有很多人失去了。我們中國人在過去的幾十年裏，已經習慣了被剝奪。因此，當我們稍稍得到一些「實惠」就很容易滿足，中國的老百姓也應當改變一下自己了。人們應該懂得，我們作為一個人，有一些與生俱來的基本權利，它們是生命的權利、自由的權利以及擁有財產的權利，而不僅僅是中共官方所說的「生存權」。為使這些權利能得到切實的維護，為使這些權利不被無故地剝奪，必須建立起一種適當的制度保障，這種制度要能對權力實行有效的控制，要能使公民自由地行使自己的權利。在過去的將近半個世紀裏，尤其是在最近的十年裏，人們已經為此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今年是八九天安門運動和「六四」事件十周年，人們不應該忘記有那麼多優秀的青年男女和普通民眾為此獻出了寶貴的生命。

10 Years" Observation and 10 Years" Quest(Summary)

By Jiang Peikun and Ding Zilin

The three popular political movements namely the "Airing of Views" and "Anti-rightist" movements in 1957,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from 1960's to 1970's, and the 5th April Tiananmen Movement in 1976, all undermined the prestig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owever most of the people, with the exception of a few advanced elements, attributed the consequence of the movements to the leadership's blunder in their policy. After the movements, the people never lost their trust towards the Party, albeit with some grumbles. Based on such a trus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ad the confidence and courage to make a limited review of the blunders and damages of the movements afterwards.

However, the ruling Chinese Communist have started a turning point in history on the June 4th incident. Ten years have passed, and the ruling Chinese Communist not only did not make any review of the incident, but instead have repeatedly proclaimed that the decision made cannot be changed, which is contrary to the usual practic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The only explanation is that Deng Xiaoping's crackdown on the 1989 Pro-democracy Movement was indeed too wrong in that he did not leave room for himself and for his successor (for such a review).

The 1989 massacre was the result of the totalitarian system. The Chinese totalitarianism, aside from the leaders' arbitrariness, attached importance to achieving the aim through popular movement. The 1979 Democracy Wall Movement was the pioneer civic movement in modern China, and the 1989 Tiananmen Movement was an unprecedented exercise of such a movement. The 1989 Pro-democracy Movement raised the demand for democracy and the demand for upholding the citizens' freedom and rights from without the institution. It was because of this very point that Deng Xiaoping,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leadership, cracked down the movement at all costs.

The Chinese Communists today no longer enjoy "absolute authority" as before, and no longer have the appeal. They become more and more caught in a dilemma which is difficult for them either to advance or to draw back. Will the ruling Chinese Communists be willing to give up their monopoly on power and to give up their own

party"s selfish interests for the dignity of China in the coming century?

The Chinese people today are likewise caught in a dilemma: they either gain a certain "substantial benefit" from the so-called glasnost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while sacrificing their own liberty and dignity, or shoulder up civic responsibilities for themselves and for their posterity to become freemen. As a person, one has the basic inherent rights such as the right to life, the right of liberty and the right to own property. In order that these rights will not be unreasonably deprived, it is imperative to establish an appropriate system to safeguard them and to enable citizens to exercise their rights. For the past half century, especially for the past decade, people have made a great effort for this cause

蔡文輝：兩岸關係與中國統一問題

本文試圖以聚合理論的觀點來檢討海峽兩岸過去將近五十年間的由完全斷絕關係而至目前有限制來往的發展過程。可討論的範圍包括兩岸的政治、經濟，以及社會文化等方面的交流，重點則置於交流所遭遇的問題與瓶頸。

本文並試圖以政治發展的演變方向來討論中國大陸在廿一世紀可能發展的幾種方向。討論的重點是那一種發展的方向最適於兩岸交流的正常化與全面化，以及海峽兩岸終歸統一的可能性。

不論是五四或六四皆是人為的運動，那麼促成海峽兩岸的統一是否也需人為因素的催促，還是讓順其自然的演變下去，這是值得大家深思的一點。

CONVERGENCE AND THE FUTURE OF REUNIFICATION BETWEE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A DEVELOPMENTAL VIEW

by WEN-HUI TSAI (Professor of Sociology)

* This is a reprint of my manuscript under the title that was published by School of Law, University of Maryland in its Occasional Papers/Reprints Series in Contemporary Asian Studies, No.4, December 1998. The author would like to thank Dr. Hungdah Chiu for his permission to allow me to make this paper available for the conference.

I. CHINA SEPARATED

China is one of the few great civilizations that has been ruled continually by a centralized government. Yet, throughout China's long history, there were times when China was separated and divided. Long periods of diversions were found in Chinese history, notably the Three Kingdoms period, the Five Dynasties and Ten Nations period, and the period at the end of the Sung Dynasty. Even great dynasties like the Han, Tang, Ming and Qing all experienced internal division at one time or another during their respective period. The Republican revolution in 1911 and the subsequent establish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1912 were unable to unite all China as well; there were periods of conflicts between South and North, regional fights among numerous warlords, and the civil war between the Nationalists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s.

A divided China still exists today. The vic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s on the mainland and the retreat of the Nationalists to the island of Taiwan in 1949 has in reality created two coexistent political governments ever since: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hereafter) on the mainland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ROC hereafter) on the island of Taiwan. These two Chinas are different in many significant ways. Economically,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have taken different paths in their developmental strategies: a socialist approach by the PRC mainland China and a capitalist approach by the ROC on Taiwan. Politically, both the ROC on Taiwan and the PRC on the mainland have maintained their respective political administration with each claiming the sole representation of China. Culturally, Taiwan is more open to the world culture, as characterized by its active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cultural exchange,

while mainland China was closed to the outside world in total isolation for nearly forty years.

The apparent consequence of the above differences betwee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has kept the two sides apart since their separation in 1949. In reality,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have been distinct political entities for the past fifty years. Military hostility and psychological warfare between the two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s occupied the central stage of activities until the late 1980s. However, the two sides have shown signs of conciliation in the 1990s, with the exception of a few minor incidents in the spring of 1996. As mainland China is moving toward economic modernization and rejoining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contacts with the ROC on Taiwan have increased steadily. The seed of convergence and reunification between the two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s has begun to take its roots and grow.

The purpose of this essay is to examine the current status quo of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PRC and Taiwan and to discuss the future of socio-economic convergence and possible reunification in the future. The essay will begin with an analysis of economic convergence that has been the center of the contacts betwee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since the late 1980s. Then, people to people contacts in social and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the two sides will be examined. Problems of political contact between the two sides will also be addressed. Finally, the issue of reunification between the two sides in the coming new 21st century will be discussed to explore its feasibility.

II. ECONOMIC CONVERGENCE

The most impressive development betwee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since the mid-1980s has occurred in the sphere of economic activity. Economic convergence is currently in full bloom between the two sides.

Taiwan's "economic miracle" is well known around the world, for Taiwan has built itself into one of the great economic powerhouses in the world since the 1970s with a steady economic growth rate, surplu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an impressive

accumulation of national wealth and an enviable volume of foreign capital reserves. Taiwan has been hailed as a model for developing nations in the third world. To mainland China, Taiwan's successful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ies, surplus of capital and technological and managerial skills are invaluable to them at the time when the PRC on the Chinese mainland is in great need of capital, technology, and managerial expertise for its current push toward economic reform.

A. Learning From Taiwan's Economic Miracle

Within the PRC's political propaganda machine, Taiwan had been portrayed as a poverty-ridden place with "people eating banana peels." But in 1979, YU Qiuli, then Vice-Premier, admitted for the first time that Taiwan's standard of living was "many times better than that of China." Since then, several measures have been taken to "learn from Taiwan." They include: (1) the establishment of a Taiwan 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 in Xiamen, to collect information on Taiwan's economy; (2) the publication of a series of monographs on Taiwan's management skills; and, (3) the allowance for open discussion in magazines and newspapers o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al experience in Taiwan. Economic planners in the PRC have since then openly called for adopting certain features of the Taiwan model to "learn from Taiwan."

In his study of the economic reform in the PRC during the past decade, Professor Chu-yuan CHENG found several important features that have been adopted from the Taiwan model. Cheng lists these steps taken by mainland China as evidence of its desire to "learn from the Taiwan model." They include the establishment of "special economic zones," the promotion of small private economies, the institution of a new farm policy, the revision of the PRC's developmental strategies and the adoption of an "open door" policy. Let us further elaborate on the PRC's "learning from Taiwan" efforts:

(1) The establishment of "special economic zones" and its expansion. Cheng argued that this was an imitation of Taiwan's export special zone" strategy. Until the adoption of this policy, the PRC's economic planning basically was built upon a principle of self-

reliance, a principle that avoids any foreign economic involvement. But, in the early part of 1980, DENG Xiaoping and his economic planners decided to establish four "special economic zones" in Shengzhen, Zhuhai, Shantao and Amory to allow foreigners alone, or in cooperation with governmental agencies, to do business in these four zones. The goal is to encourage foreign capitalists (including those from Taiwan and Hong Kong, and other overseas Chinese) to invest in processing goods for export purposes. In contrast to other regions in mainland China, these "special economic zones" allow foreigners to hold sole control and ownership of a business, to employ foreigners in managerial positions, to hire or dismiss workers freely and to enjoy tax exemptions. By 1984, fourteen additional "special economic zones" had been established. Since then, the program has been expanded to many parts of the interior and coastal China.

(2) The promotion of small private economies.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features in Taiwan's economic developmental process has been the contribution from a vast number of small businesses; they are alert, flexible and very competitive in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market. In 1981, the PRC's State Council made a policy decision to allow families to conduct private business activities with a limited number of hired hands. Then, in 1983, families with private business enterprises were allowed to operate jointly. In recent years, joint ventures between government-controlled business and private business have been promoted heavily. There are more than twenty million small business households in the PRC today and they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current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campaign.

(3) The institution of a new farm policy. Taiwan was able to move into its early stage of industrialization partially because it practiced a mild land reform policy that allowed farmers to keep their own crops; the land-to-the-tiller program in Taiwan, on the one hand, encouraged farmers to increase crop production to increase wealth, and on the other hand, to transfer capital from the landowner to industrial investment. In mainland China, the collective farm system did not work to increase farm production. Thus, the PRC changed its policy in 1979 to allow farmers to sign a contract with their production unit for a guaranteed quota to be submitted to the production unit, while they could keep the surplus amount above the quota outlined in the contract.

(4) The revision of mainland China's developmental strategies. Since the failure of the Stalin model of developmental strategy that had favored heavy industry, the mainland Chinese planners have changed their strategies in favor of a Taiwan model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balanced growth in agriculture, light industry and heavy industry. As a result, we have seen the growth of mainland China's production of consumer goods and electronic components, which in turn has helped to improve the people's standard of living in mainland China.

(5) The adoption of an "open door" policy. As it is well known, the success of Taiwan's economy was built upon its open trade policy with foreign nations. Mainland China had closed its doors to all major economic powerhouses in the West. However, in recent years mainland China has made several policy revisions that encourage bilateral trade with foreign nations; active involvement in international banking and trade organizations; foreign investment in mainland China; the export of cheap labor to Hong Kong and Taiwan; and, joint ventures in tourism enterprises.

Mainland China claims that it is building a new China under socialism with a Chinese spirit. The leadership of mainland China may not want to admit to influence from Taiwan. But judging from its curr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its economy is without any doubt full of the "Taiwan spirit."

B. Bilateral Trade Between the Two Sides

Ever since the relaxation of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two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s in 1987, mainland China has become a fascinating place for the Taiwanese to visit and to do business. Mainland China's attraction to Taiwan is twofold. First, Taiwan's economic developmental strategies have proven to be successful, which gives mainland Chinese economic planners a chance to "learn from Taiwan." Second, Taiwan's tremendously large national wealth and well-trained technological and business personnel are needed by the mainland Chinese. Consequently, it is no surprise to see the rapid growth of trade and economic exchange between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during the past ten years.

Bot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s have made trade betwee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possible, if not necessary, in the 1980s and 1990s. Domestically, mainland China is opening its door for economic reform that encourages trade with outsiders, including Taiwan. In Taiwan, martial Law was abolished in 1987 which allowed "indirect" contacts with people on the mainland. Internationally, mainland China needs to re-enter the world economy to support its economic reform, and thereby create an environment conducive to international trade. The Taiwanese, on the other hand, view mainland China both as an investment target and as a market for surplus goods. As world protectionism and the ever-increasing wage demanded by laborers in Taiwan have slowed Taiwan's international trade expansion, declining international market size and increasing production costs have made it necessary for Taiwanese businessmen to look for alternatives. The Chinese mainland is an ideal place for low-cost labor and market expansion. As a result,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 have developed rapidly since mainland China initiated its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policy in 1979.

Indirect trade between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has been conducted through Japan, Singapore, Hong Kong and other countries. Among them, Hong Kong remains the most active location for economic exchange between the two Chinas. According to statistics compiled by the Hong Kong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indirect trade between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through Hong Kong was only U.S.\$46.8 million in 1978, but increased to U.S.\$11.3 billion in 1996. If we take this indirect trade through other countries, the total volume definitely would be even higher. Table 1 shows indirect trade through Hong Kong between Taiwan and the PRC from 1978 to 1996.

Table 1. Taiwan-Mainland Indirect Trade via Hong Kong, 1978-1996

Year	Trade Indirect	Indirect Taiwan's
Turnover	Taiwan	Taiwan Trade
Exports	Imports	Balance
* * *		
1978	46.8	0.1 46.7 -46.6

1979	77.8	21.5	56.3	-34.8
1980	311.2	235.0	76.2	158.8
1981	459.4	384.2	75.2	309.0
1982	278.5	194.5	84.0	110.5
1983	247.7	157.8	89.9	67.9
1984	553.3	425.5	127.8	297.7
1985	1,102.7	986.8	115.9	870.9
1986	925.5	811.3	114.2	696.8
1987	1,515.4	1,226.5	288.9	937.6
1988	2,718.0	2,239.3	478.7	1,760.6
1989	3,483.4	2,896.5	586.9	2,309.6
1990	4,043.0	3,278.0	765.4	2,512.6
1991	5,793.2	4,667.2	1,126.0	3,541.2
1992	7,406.9	6,287.9	1,119.0	5,168.9
1993	8,689.0	7,585.4	1,103.6	6,481.8
1994	9,810.7	8,517.3	1,293.4	7,223.9
1995	11,457.0	9,882.8	1,574.2	8,308.6
1996	11,300.0	9,717.6	1,582.4	8,135.2

* * *

(source: Central News Agency, Chinese World Almanac, 1996, Taipei: Central News Agency, 1996, p.756; Mainland Affairs Council, Monthly Statistical Report on Economic Activities Between the Two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s, Taipei: Mainland Affairs Council, October 1997, p.20)

Table 1 also shows several important points. First, the growth rates between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have been steady in indirect trade during the period in both imports and exports, with only a brief period of interruption. Indirect trade has begun to account for a continually rising proportion of the total trade turnover for both sides. For example, according to one report, the volume of Taiwan's indirect exports to the PRC was only 0.1 percent of its total exports in 1979, but by 1996 this figure had risen to 8.4 percent. On the other hand, the volume of imports from mainland China climbed from 0.4 percent of Taiwan's total imports to 1.6 percent in 1996 during the same period. The situation on mainland China is similar. Mainland China's indirect

exports to Taiwan were 0.4 percent in 1979 and 1.1 percent in 1996, while indirect imports from Taiwan were 0.1 percent in 1979 and 7.0 percent in 1996. Growing mutual trade dependency is evident. Taiwan is now the sixth largest trade partner of mainland China, while mainland China is ranked fifth on Taiwan's list.

Second, the impact from the student demonstration movement and the subsequent Tiananmen Square incident in June 1989 has had little impact on indirect trade between the two Chinas, as the volume in both exports and imports continues to grow. Trade with Taiwan was badly needed by mainland China at the time when the PRC was under economic sanctions imposed by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Western nations.

Third, indirect trade has favored Taiwan heavily, with Taiwan enjoying the largest trade surplus. Consider 1996 as an example: Taiwan's indirect exports to mainland China through Hong Kong were U.S.\$9.7 billion, while its imports from mainland China were only U.S.\$1.5 billion. This reflects a surplus of U.S.\$8.2 billion for Taiwan. Taiwan's exports to mainland China are about five times its imports from mainland China. Thus, mainland China is more an export market to the Taiwanese businessmen than an import source.

According to a recent news release from the Xinhua News Agency, Taiwan's indirect exports to mainland China consist chiefly of industrial materials, and parts and components. For instance, man-made fibers account for 39.5 percent of the total value of Taiwan's indirect exports, followed by electronic parts and components (11.4 percent), plastic raw materials (10.9 percent) and machinery and equipment (8.1 percent). Herbal medicines remain Taiwan's leading indirect import from the mainland, followed by food products, tobacco and fuel.

Finally, the increasing volume of indirect trade between the two Chinas also reflects the need for direct trade. Governments on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s have taken steps to encourage trade between them. Taiwan is currently planning to designate two sea ports for limited direct trade with the mainland. It is generally expected that trade between the two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s will show continuous growth in the

years ahead.

The steps that have been taken reflect a significant change for both sides and even more so for the ROC on Taiwan. Since the 1949 withdrawal to Taiwan, the ROC has regarded any contact with the mainland, be it personal or business, as "supporting the rebels," and thus within the purview of sedition. But the government stance suffered a major setback in late 1989, when the ROC Supreme Court acquitted two local businessmen of a government sedition charge for directly doing business with the PRC. The Court ruled that such activities did not constitute treason or aiding rebels to overthrow the ROC government.

The relaxation of the travel ban to the mainland, approved by the ROC government in November 1988, represents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turning points in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Chinas, both sociologically and economically. It is estimated that Taiwan travelers have infused some U.S.\$2 billion of foreign exchange into the mainland each year. Moreover, such travel has given Taiwan businessmen an opportunity to survey the mainland Chinese market and establish direct business negotiations with their Chinese counterparts on the mainland. According to one statistic reported by mainland Chinese officials, Taiwanese businessmen invested close to U.S.\$16.68 billion on the mainland between 1979 and August 1997. In 1996 alone, for example, investment accounted for U.S.\$3.5 billion, with more than eight hundred joint business ventures with mainland China, and 10,584 individual Taiwanese running businesses.

As mainland China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dependent upon investment from Taiwan and as the ROC has relaxed its ban on trade with mainland China, direct trade between the two sides likely will be possible in the near future. It was reported recently that mainland China has established four industrial parks for Taiwanese investment; five more such parks currently are being planned. At the same time, Chinese merchant ships registered under foreign flags have been reported to be conducting direct shipping between Taiwan and the mainland.

Judging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ast ten years,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have

established strong economic ties. Although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differences still exist, the two sides have found economic convergence through bilateral trade mutually attractive and beneficial. As long as such economic exchange does not compromise Taiwan's security, the ROC government will not only allow indirect trade to continue to flourish, but may also consider direct trade with the mainland. The two old enemies may now become business partners.

III. SOCIAL AND CULTURAL CONTACTS

Sociologically speaking,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are now two different societies; they are on different levels of societal growth. Taiwan is an open society that is characterized by higher education, freedom of travel, economic prosperity, advanced health care and a social welfare system, and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 Mainland China is still a totalitarian society in which people's lives are tightly controlled by the state; uncertainty and poverty still characterize mainland society.

Although official political contact between the two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s is still nonexistent, contact between people from both sides is now permitted. The breakthrough emerged on November 2, 1987, when the ROC government in Taiwan allowed its citizens to travel to the mainland to visit their relatives. For the first time in almost forty years, those family members who were forced to separate because of the civil war in 1949 were permitted to see each other again. Since then, the ROC government has extended visitation privileges to tourists and academicians and certain other professionals. The ROC also has accepted a limited number of visitors from the mainland. Although political disputes remains a severe obstacle between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contacts in social and cultural exchange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 have increased in both quantity and quality significantly since 1987.

The earliest sign of people to people contact between two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occurred in July 1987 when Taiwan's Bureau of Entry and Exit began to accept applications from Taiwan residents for indirect tourist travel to mainland China by way of Hong Kong and Macau. The travel permission thus enabled Taiwan residents of those who were born in mainland China to pay a visit to their relatives who were

residing on the mainland. Then, in April 1988, The Taiwan Red Cross Society began forwarding mail from Taiwan residents to the mainland. Members of private organizations were allowed to participate in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nferences, sports, and cultural activities held in the mainland and a limited number of distinguished mainland residents and overseas mainland Chinese scholars and students were permitted to visit Taiwan.

In December 1988, a Taiwanese soldier who was left behind on the mainland during the civil war was permitted to come to Taiwan to visit his family in Taiwan and in March 1989 the visitation privilege then was granted to include the relatives of this soldier. Indirect telecommunication links across the Strait began and simplified mailing procedures were adopted for correspondence destined for the mainland. Elected officials at all levels were permitted to pay private visits to the mainland during holidays and recesses. Cultural, educational and civilian organizations were allowed to send representatives from Taiwan to the mainland for visits in April 1990. Travel to Taiwan was approved in June 1990 for mainland residents noted for their academic, cultural or sport achievements.

Legislation was established to regulate cross-strait contacts. In November 1990, the Executive Yua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on Taiwan approved the revised draft of the "Draft Statue Governing People-to-People Relation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 and the Strait Exchange Foundation was established in Taiwan as a quasi-government unit to act on behalf of the government. The Foundation was designed to assist the government in handling civilian affairs across the Strait. The first talks between the Strait Exchange Foundation and its counterpart on the mainland, the Association of Strait Relations was held in April 1993 in Singapore to discuss issues related to social and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Several such talks, which are commonly known as the Koo-Wang Talks, were held between 1993 and 1995. However, the Koo-Wang talks have been suspended after mainland China's military threat during Taiwan's Presidential election in March 1996.

According to a report by the ROC government, there were 243,500 individuals who applied to visit their relatives on the mainland during the first year after the policy

change on mainland visitations in 1987. Among them, 209,036 persons, or 85.87 percent, actually did visit the mainland. Central Bank statistics show that between January and September 1988, Taiwan travelers to the mainland had requested U.S. \$3.1 billion in foreign exchange for the purpose of traveling to the mainland. Among them, U.S.\$2.17 billion, or 70 percent of that amount, was spent on gifts for relatives on the mainland. A survey of those who returned from the mainland shows that 18.74 percent spent NT\$50,000 (approximately US\$1,800) or lower, 43.34 percent spent between NT\$60,000 and NT\$100,000, 23.48 percent spent between NT\$100,000 and NT\$150,000, and 13.44 percent spent NT\$150,000 or more. The survey also reported that 36.22 percent would like to visit the mainland again, 57.09 percent were undecided and 5.55 percent would not want to visit again.

ROC's Mainland China Affairs Commission in 1998 reports that the government has adopted a total of 250 item measures to encourage contacts between two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s since 1987. With a more relaxed atmosphere, people-to-people contacts between Taiwan and the mainland have expanded from family visitations to cultural and athletic exchanges. In the ten years since the ROC government on Taiwan opened its door to visitations between Taiwan and the mainland, the number of applications to the mainland has been impressive. According to government statistics, more than 1.8 million (1,829,947) Taiwan residents were granted permission to travel to China between 1987 and June 1997. However, the number reported by the China Travel Agency in Hong Kong, which acts on behalf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accepting applications from Taiwan travelers was five times larger than Taiwan's official statistics; in the past ten years the China Travel Agency in Hong Kong had issued 10,665,400 permits to Taiwan residents for traveling to the mainland. As shown in Table 4, the figures reported by the China Travel Agency in Hong Kong show a steady growth of Taiwan visitors that reached its peak of 1,526,000 in 1996, while Taiwan's official statistics have shown a decline since 1994. Moreover, the data collected by the China Travel Agency in Hong Kong is about five times more than Taiwan's official figures. Such a discrepancy apparently is the result of the large number of illegal and/or unauthorized visitations via Hong Kong by Taiwan residents. If we take into account Taiwan residents visiting mainland China through Japan, the total number of Taiwan residents who have visited mainland China would be even

higher than the statistics reported in Table 2.

Table 2. Number of Applications from Taiwan Residents for Visitation to Mainland China, 1987-1997

Year Number Approved by Number Accepted by PRC

Taiwan Authority China Travel Agency in H.K

1987 27,911 ---

1988 236,839 430,766

1989 195,235 530,534

1990 60,001 925,768

1991 14,346 995,714

1992 6,965 1,511,990

1993 420,948 1,541,628

1994 431,283 1,150,000

1995 273,748 1,265,000

1996 126,459 1,526,000

1997* 36,212 788,000

TOTAL 1,829,947 10,665,400

*data for January 1 to July 31, 1997.

(source: <http://www.mac.gov.tw>)

Meanwhile, the number of mainland Chinese residents to visit Taiwan has also shown an increase. ROC government statistics reports a total of 220,368 residents of the Chinese mainland have visited Taiwan since 1988. The number of visitors from the Chinese mainland is much smaller than those from Taiwan to the mainland due to the ROC government's tighter control of mainland Chinese visitations. Table 3 shows the growth pattern of the visitations to Taiwan taken by mainland Chinese since 1988.

Table 3. Number of Mainland Chinese Entering Taiwan, 1987-1997

Year Number of Persons

1987 -----

1988 385

1989 4,849

1990 7,523
1991 11,116
1992 13,177
1993 18,445
1994 23,654
1995 42,295
1996 56,545
1997* 42,379
TOTAL 220,368

*data for January 1 to July 31, 1997

(source: <http://www.mac.gov.tw>)

In addition, there have been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illegal immigrants from the mainland to Taiwan in search of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According to a recently published report, the Nationalist authorities in Taiwan captured 1,712 illegal immigrants from the mainland in 1989; it increased to 5,646 in 1990, and 3,981 in 1991. It is generally agreed by Taiwan authorities that the actual number of illegal immigrants was larger, because many of the mainland Chinese immigrants successfully entered Taiwan undetected. These illegal immigrants from the mainland have come to Taiwan in search of a better life. No one knows the actual number of these illegal immigrants who are now residing in Taiwan, but it is estimated to be more than 500,000. The Red Cross groups on both sides now are handling exchanges of illegal immigrants and criminals between Taiwan and the mainland.

As Taiwan still does not open its tourism to mainland Chinese, the majority of those legally entering Taiwan come to Taiwan for the purpose of social and cultural exchanges. Academic exchange is a major part of these exchange programs. According to an ROC government report, a total of 28,427 permits for visitation has been granted to mainland Chinese residents to enter Taiwan for activities in cultural and academic exchanges since 1987. Among them, more than half of the visitors (60.96%) are for academic exchanges, while 39.04% are engaged in cultural exchange activities. Among those who are engaged in academic exchanges, the largest group consists of those academics who travel directly from the mainland. Overseas mainland

Chinese scholars and students account for 7.75%. Table 4 gives a detailed breakdown of these academic and cultural exchanges.

Table 4. Visitations by Mainland Chinese to Taiwan for Cultural and Academic Exchanges Since 1987

Items Number of Visits %

Cultural and Academic Visitors 28,427 100.00

Cultural Exchange Visitors 11,099 39.04

Academic Exchange Visitors from overseas 17,328 60.96

Mainland Chinese from overseas 2,204 7.75

Academics from Mainland 13,946 49.06

Mainland Chinese Students 1,103 3.88

Scientists and technicians from Mainland 75 0.27

(source: http://www.gio.gov.tw/info/mainland/ass_aaf.html)

Academic and cultural exchange activities include attendance at academic conferences and workshops, visitations and touring of academic institutions, public speeches and professional presentations, joint academic and research projects, and public performances for theater and music groups. In addition, scholars and experts from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s have also attended professional conferences overseas which were sponsored by Taiwanese-backed foundations and foreign organizations. The best-known example of cooperation is the joint discovery of the oldest known fossils of complex animal embryos by scholars from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In February 1996, Professor LI Chia-wei of National Tsinghua University in Taiwan and Professor CHEN Junyuan of Nanjing Institute of Geology and Paleontology published their findings in U.S.-based *Science* and in the British journal *Nature*. Many scientists around the world have hailed the discovery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volutionary breakthrough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Both Li and Chen said their personal friendship has blossomed into a rewarding example of scientific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s.

As part of people-to-people exchange, reporters from the mass media from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s have engaged in reporting special events that occurred in

Taiwan and the mainland. Many of Taiwan's newspapers,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s have also stationed their reporters on the mainland on a regular basis. Although reporters from the mainland do not have permission to be stationed in Taiwan on a regular basis, about one hundred mainland reporters have visited Taiwan since 1991 according to the Taiwan-based Straits Exchange Foundation. Such media exchange is expected to grow in the years ahead.

IV. ISSUES OF POLITICAL REUNIFICATION

The biggest bottleneck in interaction between two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s is political: Taiwan's insistence on its political sovereignty in refusing to accept the PRC's term for "One nation, two systems." When MAO Zedong and his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elebrated their victory against CHIANG Kai-shek and the Nationalist army in 1949, the goal of China's unification under one rule was in sight. Although CHIANG Kai-shek still occupied Taiwan, the liberation of Taiwan through military means did not seem to present a problem. However, the attack by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on Quemoy and other Nationalist-held offshore islands failed later that year.

Then came the Korean War in 1950, which propelled the decision by President Truman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send the Seventh Fleet to protect Taiwan as a corollary to the defense of Korea. Three years later,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OC on Taiwan signed the Mutual Defense Treaty to protect Taiwan from any PRC military aggression. Although mainland China initiated another attack in August of 1958 with the shelling of Quemoy, it failed to defeat Chiang and his Nationalist Army.

Between 1950 and 1970, Taiwan continued to receive support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continued to occupy the Chinese seat in the United Nations. But the General Assembly of the United Nations in October of 1971, by a tally of 59 to 55 with 15 abstentions, voted against the U.S.-sponsored procedural motion that would have allowed Taiwan to keep its UN seat. The General Assembly then voted to grant that seat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us withdrew from the United Nations.

The most damaging blow to the ROC on Taiwan came in February of 1972 when United States President Richard Nixon traveled to Beijing for an official visit to the PRC and a meeting with Chairman Mao. A joint communique was issued by the two leaders on February 28, 1972. The so-called "Shanghai Communique" summarized both the American and Chinese points of view on global politics. On the matter of Taiwan, the communique stated that there is only one China and that Taiwan is a part of China. With the signing of the Shanghai Communique and the later U.S. withdrawal of diplomatic recognition from the ROC in 1979, the ROC on Taiwan was isolated further from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and felt threatened by the PRC's intention to rule Taiwan. The door was tightly closed between Taiwan and the PRC for the entire decade of the 1970s.

The 1980s were a turning point in relations betwee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With the PRC's urgency to implement its Four Modernizations policies, military aggression against Taiwan seemed to be too costly at the time. Calls for political negotiation and peaceful reunification were sent by Beijing to Taiwan. As a result, there has been increasing contact between the two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s throughout the later part of the 1980s and into the 1990s, even though the ban on official and direct contact with the PRC is still imposed on Taiwan by the ROC. Each side continues to claim sole representation of China.

A. The Call from Beijing

The call for political unification was initiated by Beijing. On January 1, 1979, when the United States cut off its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the ROC, the PRC's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issued a "Message to Compatriots on Taiwan," asking the people of Taiwan and the Taiwan authorities to allow contacts and exchanges between the two sides in order to pave the way for eventual reunification. This was followed by the so-called, "three links and four exchanges." The "three links" were bilateral mail, trade and transport/shipping links, and the "four exchanges" included bilateral visits by relatives and tourists, academic groups, cultural associations and sports representatives.

Then, on January 14, 1979, DENG Xiaoping said Taiwan could keep its existing socioeconomic systems, continue its relations with America, Japan and other foreign countries on a people-to-people level, and even maintain its own military. But Deng insisted Taiwan must change its national flag and turn over its sovereignty to Beijing. Two weeks later, Deng said, the PRC would no longer use the term "liberation of Taiwan" and would not use military force against Taiwan in the immediate future.

The most concrete proposal was made by Marshal YE Jianying on September 30, 1981. Ye outlined nine working principles for reunification talks with Taiwan. The so-called "Ye's Nine Principles" were: (1)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Kuomintang should begin negotiations with equal status; (2) the two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s should agree on exchanges for mail, business, shipping, visitation, tourism and such activities as academic, cultural and athletic events; (3) Taiwan would be given a special region status with its own military and political autonomy an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from Beijing would not interfere with Taiwan's internal affairs; (4) Taiwan's current social and economic systems need not be changed and its people's life style would not be altered. Private ownership of property, house, land, business and inheritance would be allowed in Taiwan. Taiwan could continue its economic and cultural relations with foreign countries; (5) Taiwan's leadership would be recruited to occupy key national positions in the PRC to participate in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6) the central government from Beijing would assist Taiwan if Taiwan ran into financial hardship; (7) Taiwan residents who were willing to reside in China would not be discriminated against and would enjoy freedom of travel between Taiwan and the mainland; (8) Beijing would protect the investment interests of Taiwanese business on the mainland; and, (9) China's reunification is the responsibility of every Chinese, and therefore China would welcome any suggestions from Taiwan and any other person toward the final goal of reunification.

As Taiwan was not impressed by "Ye's Nine Principles," the PRC's leader, DENG Xiaoping, made another attempt at reconciliation in 1983. On June 26 of 1981, Deng outlined his five "Opinions" with respect to the reunification issue. These were: (1) after reunification, China would not send its military or administrative personnel to Taiwan; (2) Taiwan would enjoy its own independent legislative authority and adopt its

own laws; (3) Taiwan could maintain its own military so long as it did not threaten the mainland; (4) Taiwan could maintain some of its rights in dealing with foreign affairs; and, (5) Taiwan could adopt a special flag and call itself "the Chinese Taiwan." Such a position was later confirmed by JIANG Zemin in January 1995 in his "Eight Point Policy" on the Taiwan issue, in which Jiang indicated that anything would be negotiable under the one China principle.

As the best solution to the Taiwan problem and to reunify China, the official position of the leaders from the PRC was clearly in favor of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policy. Although China reacted violently to Taiwan's President Lee's visit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June 1995 and to Taiwan's presidential election held in March 1996 by staging several rounds of military exercises, China's position has not changed drastically from reunification through peaceful means to a military invasion. The PRC signaled to Taiwan that everything was negotiable so long as Taiwan would not seek independence and reclaim its membership in the United Nations. Mainland Chinese leaders often told friends on Taiwan who visited Beijing, "Just come to the negotiation table; then we will talk." With the Hong Kong issue settled, mainland Chinese leaders now are eager to lure Taiwan back and to unify China.

B. Taiwan's Response

Taiwan, however, has not warmly received the offers of Deng and other leaders from mainland China, and has stubbornly refused to negotiate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for possible reunification between the two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s. Taiwan insists that mainland China must abolish Communism in favor of Dr. SUN Yat-sen's doctrine of the 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 before it will talk to the PRC. During the Kuomintang's 12th National Congress held in Taipei in 1981, the party resolved to seek "reunification of China under the 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 President CHIANG Ching-kuo, who was also the chairman of the Kuomintang, supplemented this resolution with a "three no's" policy: no contact, no negotiations and no compromise. Chiang later said,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policy proposed by mainland China was a conspiracy to "eat up" Taiwan and that it cheated people from the free world.

Although Taiwan still officially imposes its "three no's" policy toward the PRC, it started to show some flexibility after the death of CHIANG Ching-kuo in 1987. Restrictions on unofficial contacts with mainland China gradually have been relaxed since. A series of new policies toward mainland China have been initiated, which has led to a de facto thaw between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The ROC government on Taiwan also said it would consider a policy of "one China, two governments" in working toward final reunification.

Perhaps the most significant breakthrough in contact between the two governments occurred in May 1989 when the ROC's Ministry of Finance, Dr. Shirley W. J. KUO, led a delegation from Taiwan to the 22nd Annual Asian Development Bank Meeting in Beijing. Although the ROC claimed that Dr. Kuo attended the meeting not as the Minister of Finance from the ROC, but as a board member of the Bank, Dr. Kuo's attendance was significant because she became the first high-ranking ROC government official to attend an international meeting held in the PRC and to meet with PRC officials face to face.

It has become evident that the ROC on Taiwan under its new president, Dr. LEE Teng-hui, has taken a more liberal policy toward the reunification issue, allowing more contacts between people on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s. Several semi-official agencies also have been established to handle contact with the PRC. These include the formation of the Mainland Affairs Task Force in August 1988,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ational Unification Council by the Presidential Office in October 1990, the appointment of Vice Premier Chi-yang SHIH as chairman of the Mainland Affairs Council under the Executive Yuan in the same month, and the inauguration of the Foundation for Exchange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 in November 1990. A government publication calls the new policy toward the PRC a "pragmatic adaptation."

Judging from past developments, the stickiest point in the political reunification process is the sovereignty of the ROC on Taiwan. On one side is the PRC's refusal to permit Taiwan to continue to call itself the Republic of China. On the other side is Taiwan's insistence that the ROC is still a legitimate political entity representing

twenty-one million people in Taiwan, and thus must be treated equally as a sovereign government if any negotiation is to take place. In his inaugural speech in May 1990, President LEE Teng-hui of the ROC on Taiwan stated the official position that if the Chinese Communist authorities can implement political democracy and a free economic system, renounce the use of military force in the Taiwan Straits, and not interfere with Taiwan's development of foreign relations on the foundation of a one-China policy, the ROC would be willing, on the basis of equality, to establish channels of communication.

Since both sides thus far have been unable to negotiate reunification, several alternatives have been proposed to spun compromise. Among the several models that have been proposed by scholars and politicians from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s as a compromise solution,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model seems to be most popular to the mainland Chinese. It is in fact the official position of the PRC on the reunification of China. In this model, there is only one China, i.e., the PRC. Taiwan would be under the PRC's rule, even though it may continue its current capitalist economy and way of life. The ROC on Taiwan, however, insists that it will not be rul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s and that any reunification negotiation must be between the two governments on equal grounds.

Figure 1 gives a graphic summary of the evolution of relations betwee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During the period before 1987, there was a total separation betwee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No contact was permitted by either side. Then, mainland China began to call for Taiwan to return to the motherland and Taiwan responded to that call with indirect non-political contacts. However, the goal for future unification is still unsettled. Taiwan is calling for a policy of "one China, two governments," that would allow its existence as a political entity in the international area to be continued. Mainland China on the other hand has insisted on a strategy of "one nation, two systems" that would absorb Taiwan into its political jurisdiction.

(Figure 1 here)

We so far have touched on the positions from the governments on either side of the

Taiwan Straits. But what about the feeling of the people toward reunification? Since the people in Taiwan have more at stake than the people on the mainland, let us examine a few public opinion polls taken recently on the issue of China's reunification.

A public opinion poll taken by Gallup's Taiwan branch in the last quarter of 1990 found that most people in Taiwan are very uninformed about the current political developments in PRC-ROC relations. About two-thirds of the 1,013 surveyed, all over twenty years of age, said they had no idea what shape Taiwan-mainland relations would take in the next decade. Half of those surveyed agreed that party-to-party talks between the CCP and the KMT should be held. Over 56 percent of the respondents also saw nothing wrong with government-to-government talks between the PRC and the ROC. Subsequent opinion polls in the 1990s have consistently found a strong resistance to immediate reunification with mainland China under Communist rule. Figure 2 presents the results from eleven major public opinion polls from 1995 to 1998.

(Figure 2 here)

Until now, as we have demonstrated, one of the major obstacles to negotiation betwee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has been Taiwan's insistence that any talk with the mainland must be on a government-to-government basis, not betwee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Kuomintang as the leaders from the mainland have proposed. However, the findings from the public opinion poll, as presented in Figure 2, seem to suggest that this is not the issue in the minds of ordinary people in Taiwan. Moreover, people surveyed are not supportive of the Taiwan independence movement either. The general sentiment seems to be in favor of maintaining the current status quo, i.e., one China and one unofficial Taiwan.

V.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ENTERING THE 21ST CENTURY

Entering the 21st century,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face difficult challenges. In

Taiwan, we have seen the healthy growth of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 the continuation of economic prosperity, the expansion of social welfare coverage to all citizens, and the emergence of a pluralistic society. Taiwan is not perfect, but it is definitely a more matured and modernized nation than mainland China.

In late 1988, on the tenth anniversary of the Third Plenum that made DENG Xiaoping the PRC's paramount leader, mainland China's leadership faced daunting economic and political difficulties. Defensively, the leaders pointed to the tremendous gains of the previous decade as proof that the direction of the PRC set by DENG Xiaoping and his proteges was the only correct program for the future. This tactic was reminiscent of most post-1949 Chinese politics: using comparisons with China's dismal past to highlight the benefits of current policy, and thereby buttress the authority of the current regime. Leaders also typically have used visions of a bright future to spur the Chinese people to greater efforts and sacrifices.

But as everyone knows, mainland China's future progress will not be judged by a utopian fantasy or political propaganda, but by its transformation from an underdeveloped and totalitarian country to a non-socialist and technologically-advanced nation in which economic prosperity, political stability and social harmony are part of the people's way of life.

Mainland China is at a crossroads today. The recent economic prosperity in mainland China has led many western observers to suggest that China today is better than it was ten years ago. For example, Al Neuharth, the founder of the USA Today newspaper outlined the following impressive gains in his newspaper column in June 1998 on the eve of President Bill Clinton's visit to China:

*Then (1988) most of the 900 million people were dirt poor, and many went hungry. Now most of the 1.2 billion are well fed, and a large and growing middle class enjoys gadgets and luxuries.

*Then no dissidence was allowed. Now there is open criticism of lower-ranking officials.

*Then the atheist communist government denied any practice of religion. Now, 132

million people worship as they wish.

*Then China's culture and mores were inbred and centuries-old. Now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young Chinese who have studied or traveled abroad have introduced Western values.

*Capitalism rapidly has replaced socialism in most segments of the economy.

Mr. Neuharth concluded that "one-fifth of the world's people is far better off than it was 10 or 20 years ago. If you read or hear otherwise, you are being misinformed."

But such a positive appraisal is not shared by everyone. James R. Lilley, the former U.S. Ambassador to China, disagreed partially in a feedback column. Lilley said, "today things are better for most Chinese. But there is another side of the picture. Many Chinese still live in poverty. There are great disparities in wealth which concern the regime greatly. The banking system is flawed, and corruption and favoritism thrive." Richard Madsoen even questioned the freedom Chinese people seemingly have gained in recent years. He argued that "the freedoms enjoyed by the Chinese people are the corruption and ineffectiveness of their government." He called it a freedom "outside the law." James Cox goes even further in stating that mainland China is a "nation of a million rules and 1.2 billion rule breakers."

Carol Hamrin believes that mainland China will have to deal with four major obstacles in achieving its dream of restoring its historical greatness: the accelerating development gap caused by international economic trends; mainland China's resource/population pinch and highly uneven regional and sectorial development; the highly rigid authoritarian Leninist leadership structure and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dependency; and, a severe moral-cultural depression characterized by friction between generations and among social groups, and alienation from the regime.

It will require tremendous effort to overcome these four obstacles;. The problems in mainland China today are deeply rooted in China's past. Clearly, life in mainland China today is better than life before, signified by its recent economic growth. Although

mainland China has started to pattern its economic structure after that of Taiwan, it needs to develop a social and political structure that is conducive to a broader change in both economic and non-economic spheres of activity. Mainland China may have had some success in its economic reforms during the past ten years, but this success will be short-lived if the leadership is not willing to make changes in socio-political institutions to sustain economic growth.

American political sociologist Seymour Martin Lipsett once used two criteria to classify nations in the worl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government to implement its policy and the legitimacy of the support of its citizens. He developed four types of governments in the world. Type A is a government marked by higher degree of both effectiveness and legitimacy (examples include the United States, Canada and most of the western European governments). Type B is a government of high legitimacy but low effectiveness (examples include India and Mexico). Type C is a government of lower legitimacy but with high effectiveness (examples include the former USSR and Communist China before its open-door policy). Type D is a government characterized by both lower degree of legitimacy and effectiveness (examples include Vietnam, Lao and many African nations). Instead of seeing Lipset's typology as four distinctive static types of government, we may treat them as four distinct stages of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a nation's government.

Seen from such a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 mainland China from its inauguration in 1949 to the middle of the 1980s clearly was in Stage C that PRC government was in firm control and was able to implement all the policies handed down from the central government even though it did not have the support of its citizens. In Stage C, mainland China was a totalitarian state in which the people's fate was totally in the hands of the state and individual freedom was non-existent. People did not support that type of the government, but they had no choice. But mainland China in recent years has moved into Stage D, marked by a gradual loss of its effectiveness and a continuing lack of legitimacy; this was evident during the 1989 student demonstration and the widespread corruption and illegal activities in the 1990s. Some senior Communist cadres even suggested that the corruption today under the Communist Party is worse than under Nationalist rule. Ji Weidong pointed out that the existing

Chinese Constitution is nothing but a sugar-coated formality and that political reality severely deviates from the rule of law.

In Figure 3, we can see that there are three directions mainland China may experience in the future. Mainland China may be back to Stage B if a forced revolution erupts that gains high legitimacy but creates a chaotic society immediately after revolution. Mainland China may also turn back to totalitarian rule if it decides to exercise its military might in controlling people's lives similar to the period under Mao. Mainland China may still also move forward to build a government that is both legitimate and effective as in Stage A if it is willing to promote a peaceful evolution and full scale modernization, creating a new society of economic prosperity and political freedom. WEN Zhimin saw democracy as a necessary and effective means in resolving China's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flicts. He believed that economic reform will eventually lead to the rule of law and democracy in China.

Clearly, the best choice for China's future development is to reach Stage A, a new society of political stability and economic prosperity. Until now, mainland China was ruled by charismatic leaders such as Mao and Deng; the law was manipulated and abused by its leaders. What China needs in the future is to build a new society with distributive justice that is ruled by written law, not by leaders' personalities and charm. The Taiwan experience has proved that the road toward this goal may be difficult but not impossible. If Taiwan can do it, so can mainland China.

VI. CONCLUDING REMARKS

For over one century, since it began its search for modernization, China has struggled. The Communist victory on the mainland in 1949 brought hope to the Chinese for building a new China with political sovereignty, territorial integrity, economic prosperity and freedom of human spirit. The dream was quickly replaced by the nightmare of human suffering under PRC rule.

Ever since 1949, these two governments have been at odds with each other. Mainland China adopted a Communist mode of government and economic practice, while

Taiwan adopted a version of capitalist practice in its own developmental path. The result was a great discrepancy between the livelihoods of the people and these two Chinas; this is evidenced by Taiwan's fast economic growth and relatively relaxed political atmosphere in sharp contrast to the PRC's slower economic growth and totalitarian government.

Have the PRC and ROC moved closer together so that Chinese on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s could benefit from unification? Recent changes that have occurred on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s seem to suggest that a process of partial convergence is now taking place. Not only has the PRC adopted a number of economic developmental strategies from Taiwan's successful past experience, but it also has started to encourage the development of a pluralist society on the mainland, a society characterized by the relaxation of press censorship and private ownership of property.

Indeed, Taiwan has served as a living model for the PRC. If the current trend of convergence continues, the two sides without any doubt will eventually show more similarities than differences. As the convergence perspective of modernization theory has suggested, the more a society tries to modernize, the more it will have to share in a modern, rational way of life. The PRC is no exception. This would contribute positively to the reduction of tensions between the two sides

Judging from the differential development experienced betwee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Taiwan's position against a hasty reunification is quite understandable. Economically, socially, culturally and politically,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are two separate entities. Socioeconomic convergence between the two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s will help to narrow the gap and lead to eventual reunification through peaceful means. Only then, can China reclaim its old glory.

References

Central Daily News

1989 Central Daily News (Overseas Edition), November 12.

Chang, Linda

1998 "Taiwan, Mainland Scientists Find Oldest Animal Fossils," The Free China Journal,

February 13, p.4.

Chang, Maria

1990 "Taiwan's Mainland Policy and the Reunification of China," published and distributed by Strategic Studies from the Asian Studies Center of the Claremont Institute of California.

Cheng, Chu-yuan

1986 The Taiwan Modern Model and the Mainland 日 Modernization, Taipei: Lienking Publishing Company.

Chin, Chung

1991 "Trade Across the Strait," Free China Review, Vol. 41, No.1, 1991.

China Times

1993 China Times (Taiwan Edition), January 19.

Chiu, Hungdah

1996 "An Assessment of Political Reform and Development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unpublished paper read at the Conference on Post-War Taiwa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September 9, 1996, College Park, Maryland.

1993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on Taiwan, OPRSCAS #115. Baltimor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School of Law.

Cox, James

1998 "Nation has million rules and 1,2 billion rule breakers," USA Today, June 24, p.8A.

Hamrin, Carol Lee

1990 China and the Challenge of the Future,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Ji, Weidong

1998 "On Rule of Law and Democracy," Modern Chinese Studies, No.60., pp.4-26.

Kao, Kong-lian

1994 The Current Status and Prospect of the Economy and Trade Between the Two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Taipei: Mainland Affairs Council.

Kau, Ying-mao

1988 "The Reunification Issue of the Divided Nation," in LU Keng, ed., Debates Concerning the Issue of China 日 Unification, Hong Kong: Bai-xing Cultural Company, pp.259-293.

Lee, Wang-lai, ed.

1996 1997 the Chinese World Almanac, Taipei: the Central News Agency.

Li, Da, ed.

1987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and Taiwan, Hong Kong: Wide Angle Press.

Lilley, James R.

1998 "Feedback," USA Today, June 26, 1998, p.7A

Lipset, Seymour Martin

1965 The First New Nation, Garden City, N.J.: Doubleday.

Liu, Philip

1991 "Investment Showdown," Free China Review, Vol.41, No.1, 1991.

Liu, Welling

1998 "Cross-Strait Media Exchange to Expand," The Free China Journal, April 17, p.2.

Lo, Amy

1991 "Strait Talk," Free China Review, Vol.41, No.1, 1991.pp.16-19.

Madsen, Richard

1998 "China's complexities befuddle U.S.," USA Today, June 20, p.7A.

Mainland Affairs Council, ed.

1998 Open Measures in Cross-Strait Contacts by the Government and Case Examples of Communist China ㊦ Unfriendly Acts in Recent Years, Taipei: Mainland Affairs

Council.

1997 Crossing Historical Barriers. Taipei: Mainland Affairs Council.

National Editing and Translation Bureau, ed.

1993 Draft Statue Governing People-to-People Relation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 Taipei: National Editing and Translation Bureau.

Neuharth, Al

1998 "You can' t believe all you read about China," USA Today, June 26, p.7A.

Shaw, Yi-ming

1988 Beyond the Economic Miracle, Taipei: Kwang-hwa Publications.

Sung, Anna

1991 "Adjustment in Policies," Free China Review, Vol.41, No.1, pp.20-21.

Tsai, Cheng-wen and Chia-cheng Lin

1989 Politic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Taipei: Institute for National Policy Research.

Tsai, Wen-hui

1997a "The ROC's 1995 Legislative Election and the Future of the Opposition Parties," pp.1-18 in Winston L. Yang and Deborah A. Brown, eds., The Republic of China on Taiwan in the 1990s, New York: Center of Asian Studies, St. John's University.

1997b "A Giant Step Forward: The 1996 Presidential Elec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on Taiwan," American Asian Review, Vol. XV, NO.1, Spring, pp. 15-38

1996 In Making China Modernized: Comparative Modernization Betwee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2nd ed., OPRSCAS No.5-1996 (136). Baltimor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School of Law,

Wen, Zhimin

1998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Modern China Studies, No.60, pp.27-56.

Yang, Li-yu

1983 "Deng Xiaoping's New Ideas on Reunification," The Seventies (Hong Kong), August, pp.17-19.

丁偉：中國的國際地位與民主前景（提要）

（ 1 ）後冷戰時期的中國外交

- 高度原則性和高度靈活性結合：言詞強硬，但行動靈活務實。
- 經濟持續開放，使北京繼續爭取融入國際體系，接受國際規範，以及資本主義遊戲規則。
- 對西方提出的要求，不斷作出實質性讓步，特別是在美國外交政策最關注的議程上 - - 全球各地區安全問題。
- 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不擴散問題上，中國近為美國要求，加入不擴散核武器條約（一九九二年）、化學武器公約（一九九六年）、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一九九六年）、桑戈組織（Eangger Grop）（一九九七年）。從過去排斥到今天加入，反映北京國際地位的演變，也合乎中美雙方的共同戰略利益。
- 剩下來的問題是導彈技術控制體系（MTCR），看來已與美國武器售出掛鉤。

(2) 中國國際地位的演變

- 從「弱大」到「強大」：弱國、大國、強國的特徵同時存在，造成複雜心理與矛盾心理。

例：對日本的態度。

- 認定本身是一個地區強國，也確證未來若干年美國是唯一超級大國，因此不得不與之打交道，並從中取得最大的好處。

- 對周邊國家的重視：東北亞與南亞核子化的憂慮。

- 從美國得到經濟利益，加強本身的經濟實力，但也加強對美國市場的依賴 (asgmmetrical interdependence) 。

(3) 國際地位與民主前景

- 中國能有自信，如在與列強的較量中心理較為平衡，不再是自大自卑，加上改革穩定發展，前景並不會悲觀。

- 接受國際規範，要與國內外政治秩序與法制化掛鉤。如何促進國內經濟、社會、政治、法律等制度上的改革與結構性現象？

- 多元社會興起與共產黨的演變。共產黨人也要下崗，但也有共產黨人成為經濟精英，比如大財團的董事或總經理。

- 政治文化改造與民主化 - - 從梁啟超的新民說到李慎之的故事。

王丹：八九民運的意義

1999.4.7

任何一場政治與社會運動都是在特定的時代背景和社會環境下發生的，因而呈現出不同

面貌。但不同的政治與社會運動又總有其共通之處，比如它是一種集體行為，比如它總是以意見表達為主要形式，等等。中國大陸一九八九年發生的學生運動和民主運動，有其特殊的一面，但更重要的是，它是中國處於社會轉型過程中不可避免會發生的社會衝擊。

八九民運的意義在於：它不是中國民主化進程的開始，而是這一進程的里程碑。中國人爭取民主與自由的歷史至少已有一百年，群眾性的大規模抗爭自「五四」運動以來就沒有終止過，但是這一進程始終表現出社會與國家權力纏結不清的問題。中國過去的民主運動總是以政府的權力為關注焦點，或者是企求掌握權力以達到推行民主的目的，或者是希望訴諸政府以求自上而下推動改革，因而既忽視了公民社會自身的建設，又影響到了運動本身的獨立性。八九民運是一個轉折點。在八九民運之前，包括學生與知識分子在內的社會各界普遍對政府抱有幻想，因為一九八八年左右中國的政治環境前所未有地寬鬆。事實上，正是這種幻想促使學生走上街頭。但是，殘酷的現實打破了幻想。野蠻的軍事鎮壓和鮮血不僅令人震驚，更令人思索：一個曾經表現出如此開明的政府，一夜之間會成為猙獰的魔鬼。這顯然已不僅僅是某一兩個執政者的個人問題，也不完全是用極權制度的歷史可以解釋的。它促使青年一代知識分子開始對權力的本質進行質疑。

九十年代，隨著自由市場經濟的拓展，中國開始出現公民社會的萌芽，大批知識分子下海經商，社會各階層普遍持功利主義立場。這並不是一個社會的理想狀態，但它的背後表現出一種令人鼓舞的跡象：國家與社會正在日益剝離，相對於國家而言，社會的獨立性正在日益增強。人們普遍表現出的對政治的淡漠，實際上是對政府的疏遠與警惕，這絕對是一種好現象，它說明中國的民主化進程可以擁有更堅實的基礎，而八九民運，正是這一基礎的起步。沒有八九民運，我們不會這麼快就從對權力的迷信中走出來，我們仍有可能為政府的魅力所迷惑。

就我個人而言，一方面，八九民運已經成為我心中的情結，它凝聚了我青年時代的理想與熱情，是八十年代的精神象徵符號；讓八九民運得到公開的重新評價，是我無法放棄的努力目標；另一方面，我也希望從八九民運中汲取教訓，為思考中國的未來提供座標。八九民運本身是一場偉大的民主運動，能有幸積極參與是我的光榮和驕傲，它影響了我的一生，也許還將繼續影響下去。但是我也期待自己盡快從這個光環下走出來，無論是個人，還是國家，都不應該陷在一種情結中不能自拔。

最後我要說的是，在八九民運中，真正的英雄是那些死者，是他們的生命打動了全世界，也是他們的生命，必將打動歷史。

于浩成：二十一世紀中國將是民主和統一的中華聯邦

1999.4.12

二十世紀即將過去，二十一世紀就要來臨。回顧過去，展望將來，看清腳下的路，朝歷史正確方向走，無疑是既有理性，善於思考，又具責任感和使命感，「以天下為己任」的中國知識分子今天所面臨的重大課題，當前中國仍然處在一個社會、政治的轉型時期，這差不多已是人們的共識了。這個轉型期是指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以及信息社會或稱知識社會（後工業社會）的轉型，從專制和人治政體向民主和法治政體的轉型，這個轉型期也就是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進程。在當今世上，人們共認美國是最強的發達國家，而中國則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這就說明我們中國這一東方的文明古國比起西方發達國家來大大地落後了。

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是從十九世紀中葉才開始的，西方列強的砲艦打開了中國的大門，一八四八年中國在鴉片戰爭中被打敗，將香港割讓給英國。香港經英國殖民者一百五十年的經營，從一個荒涼的小漁村變成一座有東方之珠之稱的國際大都市。因此可以說中國的現代化是從香港開始的，以鴉片戰爭為起點，經甲午中日戰爭、戊戌變法、辛亥革命到五四運動，中國現代化初期大體經歷了三個階段。鴉片戰爭後，國人認識到西方列強的「船堅炮利」，洋務派提出向西方學習，「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但他們認為中國的政治文化還是優越於西方的，正如張之洞在其所著《勸學篇》中所說「中國學術精微，綱常名教以及經世大法，無不畢具，但取西人製造之長，補我不逮，足矣」，這就是所謂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到了甲午戰爭，堂堂的天朝大國竟被日本這個「蕞爾小國」打敗，中國又丟掉了台灣，於是「中體西用」之說逐漸被揚棄，國人認識到中國不但軍事、技術不如人，政治制度也落後了，必須「變法改制」才行，因此乃有戊戌變法，戊戌變法雖遭以慈禧太后為首的頑固派扼殺，以失敗告終，康、梁和光緒帝在中國也搞一場「明治維新」的夢想破滅，但國人要求變革的努力並沒有停下來，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終於在本世紀初獲得成功，推翻了中國最後一個封建王朝，首次建立了共和政體，即中華民國。

然而，辛亥革命只將一個滿清皇帝趕下了台，孫中山還不得不把大總統讓給袁世凱，中國外有列強侵略，內有軍閥統治，其落後也如故，正如孫中山所說「中華民國只有一塊假招牌」（《在上海中國國民黨本部的演說》，《孫中山全集》卷五，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版，

第 262 頁)於是乃有五四運動的興起。在這時候國人不但從器物上和制度上感覺不足，而且從文化根本上感覺不足，正如梁啟超所說：「革命成功將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漸漸有點慶然思返，覺得社會文化是整套的，要拿舊心理運用新制度，決計不可能，漸漸要求全人格的覺悟。」(梁啟超：《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飲冰室全集·文集》第 14 冊，上海中華書局，1936 年版)五四運動既是反帝愛國運動，又是新思想文化啟蒙運動，前者的口號是「外禦強權，內除國賊」；後者則高舉科學與民主兩面大旗，也就是人們常說的把德、賽兩先生請到中國來。

五四運動至今已有八十年，但國人對其認識和評價還很不一致，一是中共官方出於政治需要，一向強調其反帝愛國的一面，有意忽略、沖淡其思想啟蒙、倡導民主自由、個性解放的一面。十年前為紀念「五四」七十周年，官方發佈的口號是「愛國、改革、創業、奮進」，民主不見了，據說今年關於「五四」八十周年的宣傳，為了貫徹「穩定壓倒一切」的方針，也是要強調經濟建設和科教興國。二是有些學者看不到「五四」反傳統的批判精神之偉大啟蒙作用，說甚麼「五四」的反傳統過激了，是「反中國文化」，「勢將動搖國本」。不錯，「五四」對中國傳統思想文化提出批判，提出「打倒孔家店」口號，但這與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所說「同傳統思想進行徹底決裂」是不同的，更不能與「文革」初期紅衛兵造反「破四舊」以及後期的「評法批儒」、「批林批孔」同日而語。在五四當時有些人確實曾有過份激烈的主張，如錢玄同主張廢除漢字，魯迅講過不看中醫，不聽京戲等等，但總括來講，當時反對的不是傳統的一切，而是傳統的統治，對傳統只繼承不批判，社會就會停止進步，陷於停滯。三是海外有些被稱為新儒家的學者對國內人民深受封建思想文化毒害缺乏切身感受，同時又看到發達資本主義社會中思想文化上某些偏差(如極端個人主義、過份放任自由等)，因而力圖從中國傳統文化中發掘出今天有用的因素重新加以詮釋、利用，其用意固然不錯，但對中國現實來說未免「隔靴搔癢」，觸不到痛處，正像當前大陸某些中青年學者大談特談具批判現代西方社會弊端的「後現代學」，而在事實上中國離現代尚遠，侈談甚麼「後學」豈非「食人牙慧」、「捕風捉影」？所有這些思潮在客觀上都適應了中共當權者在意識形態上固守早已過時的馬列主義，拒斥西方思想文化的政治需要。他們為此重新拾起「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老調，只不過在晚清「中學」指的是中國正統的儒學即孔孟之道，當今則指馬列主義毛思想，最近則又加上鄧理論而已。

從五四時期起，中國究竟走向何方：西方還是中國本位文化的爭論一直沒有停止，西化實即現代化，這是人類文明的主流，「全盤西化」的提法用詞不當，使人誤以為把傳統文化完全拋掉，甚至中國人吃飯也要丟掉筷子，改用刀叉，後來胡適更正為「充分現代化」，五四運動確實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一座重要里程碑，因為「五四」做為一場真正具有現代意義

的思想啟蒙運動，喚起了全民族主體現代意識的覺醒。中國史學家一般將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做為近代史時期，「五四」以後才是現代史時期，由此可見五四運動所具有的劃時代的歷史意義，五四時期啟蒙思想家們確實是功不可沒的。陳獨秀、胡適、周氏兄弟（魯迅和周作人）諸人的思想整整影響了生活在二十世紀中國的兩、三代人，說五四運動走了「借思想文化以解決問題」的老路怕是不妥的，在任何時候思想總是行動的先導，據說法國國王路易十六在獄中讀到伏爾泰和盧梭著作時嘆道：「這兩人亡了法國！」梁啟超也說過：「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

但在五四運動以後，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卻出現曲折，這是當時世界的大環境造成的。本世紀初期起，資本主義制度的種種弊端逐漸呈現並發生了兩次世界大戰，社會主義思潮由是興起，俄國十月革命爆發並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實為列寧主義和斯大林主義）。當時不少政治精英和知識精英都認為走俄國人之路才是正確方向，連孫中山都提出要「以俄為師」，民主主義者的陳獨秀成了中共創始人和領袖（他晚年才覺悟走錯了路，但為時已晚）再加上日本經三十年代初起，更加緊侵略中國以致「救亡壓倒啟蒙」，思想界先驅們大聲疾呼的民主自由、個性解放等都被迫淹沒在抗日救國的緊迫現實鬥爭之中，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和專制、腐敗又大大失去民心，中共終於在一九四九年取得了全國政權，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共之所以取得勝利，據其自己宣傳是由於武裝鬥爭即「槍桿子中出政權」。究其實際主要是由於毛澤東提出的新民主主義理論獲得了大多數知識精英的認同並贏得了民心的結果。

毛澤東在其《新民主主義論》和《論聯合政府》中宣稱社會主義革命是將來的事情，新民主主義即中共最低綱領與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基本上是一致的，他在一九四五年召開的中共七大上提出要建立一個獨立、民主、富強的新中國，他更解釋說他所講的「民主」即林肯的三大民主（民有、民治、民享）；他所講的「自由」即羅斯福的「四大自由」（言論和表達的自由、信仰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毛澤東：《答路透社記者十二項問題》，1945年9月29日）他還講要「個性解放」，說「束縛的個性如不得解放，就沒有民主主義，也沒有社會主義」。他這些說法與五四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因而得到了多數知識分子的竭誠擁護。然而毛在取得政權到手以後卻出爾反爾，自食其言，很快就宣稱中國已進入社會主義並開始實行計劃經濟和無產階級專政，等到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發覺自己「誤上賊船」，為時已晚，悔之不及。

馬克思主義者和共產黨人斷言，資本主義將為社會主義所代替乃是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然而這項定理卻沒有經受住實踐的檢驗。實行計劃經濟不但沒有使生產力得到發展，反而造

成生產的停滯，特別是人們親身體驗到沒有經濟自由也就不會有個人自由和政治自由，社會主義正如哈耶克所說不過是「走向奴役之路」，以無產階級專政名義的極權主義專制統治給人民帶來歷史上罕見的巨大災難，當毛澤東去世，文革結束，國門重開以後，人們驚訝地發現那個「一天天爛下去」的資本主義體系竟是一個高度發展的文明而與百孔千瘡、滿目瘡痍的中國形成了強烈的反差，從這時起，國人開始進行反思，大多數知識分子反思的結果是向五四回歸，也就是向人類文明的主流，即自由經濟、民主政治、多元思想文化和個人本位價值觀的回歸，一九七九年初在中共黨內召開的理論工作務虛會內和北京青年學生和市民自發辦起的民主牆上都發出政治改革的呼籲，爭取民主、自由、法治和人權的實現，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當權派一方面進行經濟改革，以市場經濟取代計劃經濟，使社會主義名存實亡；一方面提出所謂「四項基本原則」，藉以維護共黨的統治地位，鄧的「經濟放鬆，政治收緊」方針推動的結果，雖然經濟上有了較大發展，部分人民生活有一定改善，然而主要受益者只是特權階層，而官場腐敗嚴重程度較之在大陸垮台時的國民黨政府有過之無不及。錢權交易無孔不入，國有資產大量流失，正是在這一情形下，八九民運勃然興起，以悼念黨內改革派領袖胡耀邦為契機，大學生和市民舉行示威遊行，後又發展到進行絕食鬥爭，提出反貪污、反官倒、反特權等口號和政治改革的要求，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當權派變本加厲地貫徹以「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反動方針，罷黜另一黨內改革派領袖趙紫陽，並造成六四屠城的慘劇。

十年前發生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的這場悲劇表明中共統治者為了維持自己手中的權力而不擇手段，肆無忌憚，據說北洋軍閥段祺瑞在「三·一八」慘案後曾有自責的表示，比起鄧來，其殘暴程度可說是小巫見大巫了。

八九民運雖遭嚴厲鎮壓，但緊接著發生於一九九零年的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相繼垮台的事件，說明社會主義各國人民爭取民主、自由和更好生活條件的鬥爭完全是合理的、正當的、符合整個世界潮流的。人們相信民主變革也一定會在中國發生，六·四烈士的鮮血不會白流，中共一黨專政結束的日子已經為期不遠了。

十年以來，在知識界和民運人士中間一直在總結歷史經驗教訓，探討未來前進方向，憲政民主派認為，以大陸現行憲法為基礎，進行憲政改革，以和平、漸進方式，完成建立一個統一的民主、法治、現代化中國的目標將是代價最小的途徑。自由是民主的先決條件，首先應實現載入憲法的公民言論自由、結社自由，離開和返回自己國家的自由以及其他各項自由權利，下一步應是通過修憲完成人大議會化、司法獨立、建立憲法法院、軍隊國家化等項民主改革，待時機成熟時再召開由各黨派、各地區、各民族、各界代表人物參加的立憲會議，

統一制定各省市區以及台灣、香港、澳門、西藏、新疆、蒙古等地區人民都能接受的新憲法，自由選舉國家領導人員，宣告中華聯邦成立。

憲政民主派主張以變法改良方式實現中國政治的現代化即民主化，但不反對其他方式實現變革的努力，有人把改良與革命對立起來，非此即彼，或讚揚戊戌變法、貶抑辛亥革命，或讚揚英式改革，貶抑法式革命，這恐怕也失之片面。美國獨立宣言說得好：「我們認為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他們都從他們的『造物主』那邊被賦予了某些不可轉讓的權利，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為了保障這些權利，所以才在人們中間成立政府，而政府的正當權力則係得自被統治者的同意，如果遇有任何一種形式的政府變成損害這些目的的，那末，人民就有權利來改變它或廢除它，以建立新的政府。」

六四以後，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在人民心目中完全破了產，中共統治者乃乞靈於愛國主義、民族主義做為自己的救命稻草，他們以此宣示自己統治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他們把人民對民主自由的要求視為危害國家的行為並加以治罪；他們以祖國統一為名，妄圖把他們的專制統治擴充到台灣，並將抗拒他們的人加上「分裂國家」的莫須有罪名，中共一再堅持以「一國兩制」方式解決台灣問題。最近又宣稱今年澳門回歸後下一個就輪到台灣了，而且不容無限期拖延下去。大家知道，「一國兩制」將港、澳分別做為大陸中國的一個特區，相互之間是中央和地方的關係，地方的權力是中央授予的，實行一國兩制將台灣也做為一個特區（大陸外交公布則一直稱台灣為省）形同兼併，台灣人民不能同意是理所當然的，一些政界人士和學者提出中國實行聯邦制將是較為可行的統一模式，因為各邦之間一律平等，中央的權力是由各邦授予的，這就避免了以大壓小，以強凌弱的不公正方式，更現實的辦法則是先邦聯後聯邦，如美國在建國初期所做的那樣。當前，台灣的統獨繫於中國大陸的民主化。因此大陸人民爭取民主和台灣人民保衛民主的鬥爭就聯合在一起了，這兩方面的奮鬥目標看來是一致的，這就是建立一個民主和統一的中華聯邦。據報導，汪道涵講過一個中國既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也不是中華民國，而是兩方共同締造的一個未來的統一的中國。他這番話比講「一國兩制」前進了一步，可惜還沒有得到中共的正式確認。我們認為他這番話接近於成立中華聯邦的設想，可是解決統一問題的最佳方式，對全體中國人都是有好處的。

項小吉：對八九民運的幾點思考（摘要）

1999.4

講者簡介：項小吉前北京政法大學國際法研究生。八九年學運期間，為北京學界對話團團長。「六四」後偕妻王虹流亡海外。八九年秋由香港前往美國紐約，在哥倫比亞大學讀法律。現為律師，並擔任美國自由亞洲電台顧問。

民運要有鮮明的口號：

口號反映運動的近期目標、方向，是有動員力。

歷史上各次社會變動的口號分類比較（經濟類、民族類、正義類）

反甚麼、要甚麼。（口號的基本格式）

（經商有廣告、從政有口號）

民運要有嚴密的組織：

本土化—國際化，專業化—職業化，組織化—規範化

革新性、獨立性、階段性、廣泛性（時空）

平等意識—分工意識，政治意識—對手意識，堅持—團結

民運要有具體內容：

要從關心民眾的日常生活開始，要從典型的共同的事例做起。

（言論、結社、選舉、人權，固然重要，但還不是一般人所感到迫切的）

☆關於發起〈全國索賠運動〉的倡議

民運要有策略原則：

政治要徹底，操作要靈活，不要過份期望（對西方國家），不要自作多情（對中共內部）。

要清楚反對誰，爭取誰，依靠誰，（工人、農民、職員、個體組織、自由職業）

要充分利用現代科技、資訊傳媒、國際社會。

我對中國民運前景充滿信心：

世界潮流

民眾經驗

項小吉：關於發起「九九全國索賠運動」的倡議

緣由：過去五十年中國政府粗暴踐踏人權，製造了大量的政治迫害和民事侵權事件。受難者及其家屬至今未能得到公正賠償。在此我們向國人號召：運用法律手段，興起索賠運動。以此伸張正義，推動法治，不忘歷史，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識，保障人權。

運作：「索賠運動」只求經濟賠償，不查政治責任，讓民間團體通過聘請律師進行集體訴訟，先按不同時期的迫害侵權分別進行，再協調成立總的聯絡中心。

分類：政治迫害（關、管、殺、逃、勞改勞教致死致殘、酷刑、失學、失業、株連家屬。）

民事侵權（土地、資產、財產、工傷、勞保、職業病、下崗、升學、就業、遷居、污染。）

分期：鎮反、土改、三反、五反、肅反、反右、四清、社教、文革、一打三反、清查、民主牆、自由化、六四。

步驟：成立「文革受難者索賠委員會」等

成立「全國索賠運動聯絡委員會」

歷史經驗證明推動社會變革經濟口號最有號召力，動員面也最廣。

我們不主張「打土豪，分田地」掠奪別人的財產，我們只要求合理地取回我們失去的權益，「要賠償」比「反腐敗」更具體更符合民眾的利益，雙管齊下，不僅反甚麼更有要甚麼。

汪岷：論公民抗命權

講者簡介：汪岷 廣州市第十六中學教師，中國大陸早期的民主運動參與者之一，曾被中共廣州市委以革命宣傳罪「開除公職，實行群眾專政，就地勞動改造」長達六年。七九民主牆時期是廣州地區大專院校地下民刊《未來》的主編之一，八十年代出國留學，曾任《中國之春》主編、中國民聯副主席、總幹事。現在是中國民主聯合陣線（民聯陣）主席，中國民主黨海外籌委會秘書處負責人之一。民聯陣總部和中國民主黨海外籌委會秘書處目前在美國。

公民抗命的「權利」

甚麼是公民抗命權？它的涵義是：一個公民的義務本來是守法的，但是，當他發現某一

條或者某些法律、行政命令是不合理的時候，他可以有三種態度，第一種是通過既定程序去訴求以修改它，例如上訴、打報告、呼籲或者通過會議或政府部門去抗爭等等。但是這種訴求被拒絕的時候，他可以採用第二種比較激烈的方法。即運用憲法上給予人民的權利：遊行、示威、集會等等來表達自己的看法。但是當這些方法受到官方的阻撓，或者官方根本無視這些民主的基本權利的時候，這個公民就可以把方法上升到最激烈的程度：即違抗它並願意付出違抗的懲罰代價（開除，坐牢直至死），以期喚起公民及輿論更大的注意和同情，以迫使政府修改它。公民的這個第三種權利在西方叫做公民抗命權。

運用公民抗命權的例子在外國都很多，比較出名的有近代印度的甘地和美國的馬丁·路德·金，他們都運用這個權利來推動社會的變革，更近一些有美國人民的反戰運動，運用了如拒服兵役，焚燒兵役證而寧願坐牢等等抗命行動，成功地喚起了美國人民的輿論壓力，迫使政府在參戰撤回了軍隊。再有就是南非的曼德拉，坐牢二十七年，換回全世界人民對他和他所領導的民主運動的尊敬。

嚴格來說，公民抗命權並不是一種法律意義上的「權」，因為比較專制的政府也會允許人民擁有第一種權利，而比較開明的政府會容忍人民擁有第二種權利，卻沒有一個政府願意把這第三種權利寫進自己的憲法或者公民法教科書，它只是一種天賦人權，它是游離於民主與法治之間，令民主促進法治變革的一種很特殊的催化劑。

值得指出的是，儘管所有政府為了維持自身的尊嚴和既得利益都不喜歡公民抗命，然而在對付公民抗命的措施上卻有開明與殘暴之分，而且其中差別有時又非常大，比如美國政府在對付反戰的示威分子時，往往採取比較寬容的態度，例如前捕後放，即捕即放，只要把他們送離鬧事的現場就放等等。他們之所以採取較開明的措施，可能是認識到這種公民抗命分子實質上是人權分子，這種犯法和其他刑事犯法不一樣，只不過是「良心犯人」而已。而另一種政府則採取完全兩樣的措施，包括把坦克開上來鎮壓抗命的公民，例如八九年的天安門學運。一般來說，比較重視人權的國家較為尊重公民抗命權，而相反的國家則不能容忍。

法治與民主衝突的產物

有些學術界的朋友說，公民抗命權是反社會的、反法治的，這種說法不對。在公民社會裏，法治和民主是一對孿生子，也是一對冤家，他們有互相依賴生存的一面，有相輔相成的一面，但也有矛盾衝突的一面。互賴的一面，是指民主離開了法治就變成無政府主義，泛自由主義，這是公民所不樂見的。矛盾的一面則在於：法治是限制性的，而民主是擴張性的，

法治是有條件的，有時間性的，它的制定幾乎全部都和制訂的年代有關，和制訂人的智慧有關，和社會背景有關，社會向前發展，時代在變化的時候，某些法律就會顯得過時、愚蠢，或者暴露出原來不曾暴露出來的不合理性，人們對「舊法」的不滿會增長，於是民主就會出來企圖改變法律，以適應新的時代與新的社會環境。在這種新與舊、合理與不合理的衝突中，舊法的制訂者、執行者或者受益者自然會高舉著「法治」與「秩序」（或者甚麼「穩定高於一切」）的旗幟，拼盡全力來反對民主，以致「官逼民反」，這就產生了政治上「公民抗命」的基礎。

用這種觀念來看「公民抗命」，可以說這種政治運動模式在世界上是一種普遍的規律，它在歷史上的產生決不是偶然，而是必然的了。

民主與法治在西方國家中尚存著如此深刻的矛盾，而至於出現馬丁·路德·金這類公民抗命專家，在無視法治、無視人權的共產黨國家，特別是像中國這類封建頑固陣地裏，這種衝突就更加明顯，更加激烈，而就顯得更加必要了。

公民抗命行動是公民社會裏法治與民主矛盾衝突的最高階段。「公民抗命權」正是為在這個階段裏公民的「非法」行為提供了全部的理論根據。

公民抗命的範圍界定是公民

官逼民反，會逼出兩種結果來，一是逼上梁山，二是公民抗命。兩種形式都很激烈，但是激烈的方法卻很不一樣，前者是革命，後者是改良，前者是「體制外」，後者是「體制內」，前者會傷害到別人，後者會傷害到自己，前者號召用強力修改惡法，後者打算用心靈感召人民起來去修改惡法。

（海外一些人，一聽到「改良」就反感，就以為提倡者都是共產黨的幫兇。當然也有一些人，如坐過共產黨十多年牢的楊小凱，一提起「革命」就頭疼。）

本文不打算討論「上梁山」好，還是公民抗命好，那是另外一個話題，但是我認為，主張是甚麼有時在運作中並不那麼重要，主張的範圍界定是比甚麼都更加重要的事。

「公民抗命」把自己運作的範圍界定在「公民」一詞上。這意味著：

公民抗命並不反對法治，只反對法律或命令。

公民抗命並不一般地反對所有的法律，只反對一些法律或命令。

公民抗命只反對主要的不合理的法律和命令，盡量避免涉及到其他沒有甚麼直接聯繫的法律和命令。

公民抗命不涉及到刑事上的法律，如殺人、放火、搶槍等等。

公民抗命一定是和平、理性、非暴力的。

公民抗命一定要有利、有理智、有節制地去推動。

如此等等。

「公民抗命」把範圍界定在「公民」之上，起碼有如下的三個優點：

第一是有利運作者們正面宣傳自己的主張和最終目的是要建立一個公民社會。

第二是避免了當局為了鎮壓而製造鎮壓的藉口，把公民抗命污蔑為無政府主義，或流氓造反。

第三是最符合公民抗命的訴求——最大限度地得到海內外輿論的同情和支持。

國家越落後，公民越抗命

香港著名的民主活動家李柱銘律師是贊成公民抗命權的，他有一篇文章論述到這個問題。但是他有一個觀點我不敢苟同，他說：「由於中國大陸資訊既落後又受到箝制，許多公民抗命的行動可能不會為多少國人所知，而且，也由於這個原因，公民抗命權這個理念也頗難向中國大陸的人民廣泛宣傳。」他傾向於認為，公民抗命權這個在大陸近期內不會為人所接受。

首先公民抗命並不因落後和受箝制而不能成功。甘地領導抗命運動的時代，印度這個國家也非常落後，資訊也不發達，社會專制而愚昧，但是印度人民接受了他，甘地可以說是相當成功的。如果統治者更專制，對付抗命公民的手段更殘暴，那公民追求真理，「以身試

法」的行動會顯得更慘烈、更悲壯、更動人。輿論受箝制的效果對群眾運動來說有壞處，也有好處，壞處是開始不容易為人所知，容易被扼殺在搖籃裏，好處卻是，一旦為人所知，爆發性的新聞更具震撼性，外界和本國人民會付出更多的同情心，所給予的支持也會更強烈。

其次，公民抗命的理念也不會因為是中國人或者說中華民族而較難接受。公民抗命對於我們這個古老的民族來說並不是甚麼新東西，它是「古已有之」。中國人在歷史上各個朝代裏抗命的英雄和事件層出不窮，例子可以說俯拾皆是，魯迅把這些人稱作「中國的脊梁」，給予很高的評價。中華民族是有抗命的傳統的，當然他們也有溫順、奴性、逆來順受的一面，但是他們的血液裏，是有接受公民抗命的基因的，包括那些中毒最深的「馴服工具論」的受害者們——中國共產黨人。大陸有個作家叫張一弓，寫了一篇報告文學叫《犯人李銅鐘的故事》：李銅鐘是個老實的農民幹部，虔誠的共產黨員，但是他都帶頭領導饑民搶了糧食，自願去坐牢。這篇故事一出來，就招致當局某些人大為惱火，以為大逆不道，然而卻受到民間的歡迎，一紙風行，洛陽紙貴，這說明了現在中國的老百姓不單能夠，也願意接受公民抗命這個觀念。而且也許國家越落後，越容易挖掘出種種「抗命」的因素和事件。

中國共產黨多年來的政策錯誤，政治上僵化，經濟上倒退，帶來嚴重的社會問題，中國人民，特別是比較敏感的年輕一代，外來訊息較快的大城市，以及沿海地區和少數民族地區，人們心中都孕育著不滿（儘管可能有些人說不出來不滿甚麼），特別是八九民運，東歐形勢大變之後，人人心中都有一條抗命的導火線，問題是在甚麼時候爆發，在於甚麼人去點火，甚麼事件去點火罷了。

八九民運是一場公民抗命運動

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廣場群眾運動就是一場偉大的公民抗命運動。

給一段歷史，特別是一段最近發生的歷史定性無疑是一件困難的工作，因為無論橫著看或者豎著看，都存在著各人角度的問題。而事件發生的年份越近，則越難獲得較為深切的數據。儘管如此，卻依然不妨礙我們從運動的主流方面，包括參與的成員，提出的口號、綱領，觸及到的社會問題，運動理論的層次以及它們的影響等方面，去得出一個更為趨近於真理的結論。

十多年來，各種的評論、新聞媒介，不少名人的演說文章都曾經給這次運動下過定義，最流行的說法是一次愛國民主運動，這種說法最早起源於廣場學生自己，然後是香港人跟著

用。自然這種說法當時也許對付共產黨來說有其戰術意義，然而並不就說明它準確。說是「民主運動」還可以，「愛國運動」則是個特定的概念。外國評論者們說這是一次「自由化運動」、「反政府運動」，這都沒有描繪出它的內涵。海外更有一些人一廂情願地說，它是一次體制外的反對運動，例證就是這場運動的某些領導者逃亡到外國後成了體制外的反對派。然而流亡到海外後才成了「體制外」，不等於在國內就是「體制外」。事實上，八九民運是一場完完全全立足於體制內的公民運動。

八九民運從運動的導火線開始，從起初到高潮，都沒有脫離過「公民」的範疇，即使是到了「六月四日」鎮壓的前夕，鎮壓部隊和市民的小型衝突，也遠遠沒有達到「革命」的地步。李鵬政府為了要動武而說學生「動亂」，是至今連他們自己的宣傳機構都不好意思再說下去的定性單詞。從運動的主體——學生和市民來說，他們的訴求的層次非常低，只要求政府對話，要求承認他們是愛國學生運動而已，從廣場提出的口號與理論來說，基本上還是停留在「悼念胡耀邦」、「反貪污」、「反官倒」，要放寬言論尺度等等，還沒有七九年時期的魏京生走得遠，更加沒有五七年的右派分子「輪流坐莊」，「不要黨天下」等等涉及到較深層次的口號。說他們是體制內，那是說鬧事的是一批貨真價實的「公民」，而不是不法之徒，他們基本上願意守「法」，儘管他們裏面的少數精英分子也許已經感覺到了這個法統的不正確。天安門前之所以聚眾，正表達了中國人民的不滿、不安、躁動，但是他們並沒有整套的綱領，他們只訴求到最低的一點，要當局收回成命，收回《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對學生的定性，他們的訴求不是一個政治理論的層次，他們爭取的沒有任何實質性的東西，只是一種民心的價值取向——即王軍濤所稱的「一個共和國公民的權利」，他們爭取的這種權利，就是公民抗命權。

我這麼說，絲毫沒有貶低八九民運的意思。恰恰相反，我贊成公民抗命應該在特定的環境特定的階段裏保持高姿態，低訴求。而且我還要把它稱為中國近代最偉大的一次公民運動。試想想，中國人民在中國歷史上最專制的政黨統治下，在自我界定的範圍裏，用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式，把街頭抗議動作發揮到淋漓盡致的程度，這怎能不偉大呢？中國人在五千年歷史上，沒有幾次，幾十萬人聚到一個廣場上，來認識自己是一個「公民」，是一個真正有表達不同意見的有尊嚴的人，這種聚集，怎能不偉大呢？中國公民在這個地球上，從來沒有一次用公民抗命的行動，牽動了全世界人民的心靈，引發了整個東歐社會主義體系，包括蘇聯人民的翻天覆地的變革，這場運動，怎能不偉大呢？

八九民運的偉大，也表明了現今中國人民完全接受了公民抗命這種對付共產黨的方式，也許，在目前共產黨的這種殘暴的鎮壓之後比較可行的方式。

公民抗命必須願意坐牢

下面我想談談一些關於「公民抗命」在運作中要注意的問題。

由於公民抗命就是以身試法，因此它必須具備犧牲精神 $\frac{3}{4}$ $\frac{3}{4}$ 願意因此而坐牢是一種先決條件。

儘管我們不主張犧牲，但不主張犧牲和要有犧牲精神是完完全全的兩碼事。當我們一面鼓動人民參加抗命行動的時候，我們一面要告訴自己，要負起全部最危險的責任。

也許，我們不反對別人，包括自己在內，不願捨生取義，也用不著因此而問心有愧，但是，我們必須把最大的尊敬獻給那些捨生取義者，不能把他們視之為「傻瓜」。以身試法的關鍵就在於一個「試」字，在惡法和人民的衝突的臨界線上，只有「試」才能試出法的醜陋，才能引起輿論的注意。

楊巍是中國民聯一個普通的會員，他之所以為人稱頌，並不因他有多麼高深的理論，而是因為他的「以身試法」的精神：你說民聯是反革命組織，我認為這條法令不合理，我就是民聯的成員，我回來了，要辦就辦我。

中國共產黨對付政治上的不同政見者的大棒是「反革命」罪，而在他們的刑法上反革命罪是沒有固定的量刑標準的，這非常可怕：最殘酷的刑法不是最嚴厲的刑法，因為它告訴了你它有多嚴厲，最殘酷的刑法是它不告訴你準備怎樣懲罰你的刑法。魯迅說過，最可怕的鬼不是有多麼恐怖臉孔的鬼，而是沒有臉孔的鬼，因為你猜不透它的臉孔有多恐怖。

中共把民聯、民陣這類不同政見者的組織打成「反革命」組織，但是他們從來不敢向國內人民公開這是一個甚麼樣的反對派，「反革命」這頂帽子是怎樣扣上去的，戴了這頂帽子的人會受到甚麼樣的懲罰，他們只是一味用這種沒有臉孔的鬼來嚇唬人民。

楊巍這麼一試，就把這個鬼試出來了，國內開始有人知道，原來民聯是像楊巍這種留學生組成的，民聯的政治主張是怎樣的，共產黨捉到了民聯的人會有怎樣的懲罰，於是人們就開始心中有底了，人們就不那麼害怕民聯了，「民聯是反革命組織」這條法的可笑與愚蠢就很明顯了。

楊巍是留學生裏第一個敢於回去以身試法的人。

王軍濤則是從另一個角度去「以身試法」，他對八九民運的貢獻並不在於他在這場公民抗命運動中參與了多深，而在於他敢於承擔抗命的一個公民的責任。也許他在運動前期沒有其他領袖那麼光輝熠熠，但在這個最後的審判的日子裏，他在樂章的最後一頁敲出了歷史的最強音。我不反對作家張郎郎寫過的「逃跑學」的觀點，但是我又十分尊敬那些「二進宮」、「三進宮」的人。我自己就坐過一段短暫時期的牢，當我每天抓著鐵窗桿眼巴巴地望著外面的藍天和白雲的時候，不知曾經多少次暗自發誓以後永不坐牢。當人們嘗過共產黨牢獄的滋味而又再去「以身試法」的時候，他已經用不著甚麼「北京中級人民法院」的判決了，他無疑已經在生與死、真理和地獄之間作過深思熟慮，面對自己的行為作了最後的歷史性的判決。

公民抗命權需要奉獻精神去爭取，爭取公民抗命權需要有王軍濤、楊巍一樣的帶頭人。

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基督教、天主教之所以迷住了半個世界的人民，除了聖經的博大精深，教義的千錘百煉之外，耶穌的殉難故事無疑是必不可缺的因素。如果甘地、馬丁·路德·金或者是曼德拉沒有坐過牢的話，他們領導的運動恐怕不會成功。也許有人會說這些人是歷史上鮮有的，幾千年幾百年才出一個。但是只要我們仔細回頭審視一下古今歷史上大大小小的公民抗命運動，不難發現任何一場全都有願意坐牢或者捨生取義的先例，幾乎無一例外，這一點，我們要明明白白的告訴所有參與抗命的骨幹分子，讓他們有充分的思想準備和考慮衡量利害的機會。

告訴和不告訴，是大不一樣的。

抗命的時機和場合

有了奉獻精神，不一定就有公民抗命運動。

我在國內曾經接觸過形形色色的各種不同政見者，認識過不少很有奉獻精神，很認認真真的人，然而真正能成事的，卻可以說是鳳毛麟角，百中無一。其原因主要在於沒有選好「振臂一呼」的時間和場合而已。同一個演講者，同一份演講詞，在適當的時間裏發表在北京大學三角地就和在不適當的時間裏發表在中南海前面，可能導致了完全不同的兩種結果，後者可能無聲無息進了牢房，而前者卻可能造成了一場真正的運動。

甚麼是公民抗命最好的時機呢？歷史告訴我們：

一、戈巴喬夫的功勞

公民抗命的最好時機是新聞注意力最集中的時候。八九民運之所以在北京一下子就星火燎原，全世界都轟動了起來，自然王丹、柴玲、吾爾開希有功勞，然而郭婉容、戈巴喬夫也有「功勞」。試想想，如果沒有亞銀在北京開會，如果沒有戈巴喬夫的訪華，怎麼會有一千多名記者雲集北京，沒有這些記者，怎能把全世界的注意集中到天安門廣場上？運動的操作者們應該明白這個聚光燈的原理，把握住每一個這種聚光的時機。

二、阿 Q 頭上的疤

中國民聯在「六四」事件一周年前夕曾經發動過一次天安門廣場散步活動，散發和電傳了一些傳單進北京，害得北京當局派了大量軍警把廣場封鎖了起來，被海外輿論大為調笑，北京市民心裏也暗暗高興。美國留學生葛洵單人匹馬，在審判王軍濤的前夕闖進北京，吸引了全世界人民對審判民運人士的注意，這兩件事，都是用了很少的人力和財力，卻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原因是甚麼？火候拿捏得準確 ¾ ¾ 這些日子都是中共最忌諱的時候。這些阿 Q 頭上的疤在這些日子裏特別疼。隨著中共繼續一黨專政，這些永存在人民心裏卻令中共心驚肉跳的紀念日還會增多。

三、罪不責眾

公民抗命的另一個要素就是要聚眾，並不是說只有聚眾才能鬧事，一個人也能鬧事，例如上面所提到的葛洵，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聚眾才能更好地鬧事，我們可以假設如果葛洵之後有連綿不斷的第二波、第三波的人不斷地湧進北京要求旁聽，造成的新聞效果肯定更大，引起北京市民的關注，全世界輿論關注肯定會更大。葛洵也許會留下的時間更長，膽子也會更大。在公民抗命運動中，既鼓勵孤膽英雄，更鼓勵群膽英雄。公眾比較注重前者，而我們更注重後者，人多膽壯，罪不責眾這句話絕不是懦夫的語言，而是街頭運動的藝術。

由於運作者們應當更注重群膽，因此運動中就得注意到如何保護群眾。我們在前面提過公民的帶頭人要有捨生取義的勇氣，但對於群眾，我們不願見到他們全部都犧牲與坐牢，犧牲與坐牢都不是抗命的目的。

我們所說的保護群眾包括了保護群眾的積極性。

運作者們要提出人們能接受的口號和主張，在高潮時候，特別是公民抗命的最激烈的時候，要保持住公民能承受的口號和主張。

四、小小排球，也能鬧事

聚眾鬧事並不一定要用激烈的口號和主張，有時候，最平和、最無政治內容的理由，也許恰恰是當地最好的聚眾的理由，一九八七年中國女排打贏了球，北京的大學生就趁勢上街遊行，把它變成一場街頭聚眾事件，提出了一些政治口號。

特別是眾人已經聚集起來了的時候，是最容易產生過激口號和主張的時候，人多膽壯有好處，也有不好處，在這種時候，領導者就特別需要冷靜。六四之後，海外就有人抱怨為甚麼當時沒有人帶頭衝人民大會堂，並且推論說如果衝了就有可能演變成羅馬尼亞的局面。這種推論姑且勿論說對與不對，但是其當時的判斷是非常幼稚的。

五、組織旗幟，不必鮮明

聚眾的人們也不一定要打出組織的旗號，不少人說六四事件應該有一個堅強的政治組織在領導。這句話說漏了兩個字 ¾ ¾ 背後。今天在大陸殘酷的政治環境下，打出組織旗號，政治組織站在前面領導運動，是極其不智的。六四事件的時候，如果有人站在天安門廣場上，提出要民聯來領導這場運動的話，不但廣場的中堅分子會把他推出糾察線外，而且群眾會一哄而散。就算在海外，也不是事事必須組織旗號鮮明，都跑到前台來領導才成，相反，有很多事情，色彩較為溫和，如學自聯，或者乾脆甚麼組織都不是，只是留學生或者華僑在公開領導，也許能把事情辦得更好。我知道的很多中共領使館派人到大學校園去活動，給留學生「碰」了回去，公開的都是留學生自己在鬧，實際上是民聯民陣這些組織在起了作用。這不等於說，政治組織應該躲躲閃閃，而是說，該鮮明時要鮮明，該不鮮明時就不鮮明。有些群眾因而說我們是黑手，那是因為不了解我們的神聖的目的，我們應予耐心的解釋，中共因而說我們是黑手，我們應該引以為驕傲。

六、大將軍退有陣法

《三國演義》裏的故事說，有一次蜀國打了大敗仗，全軍敗回首都，全軍將領都受到了責備，統帥諸葛亮還自貶三級。唯獨卻賞獎了趙雲，有人問他為甚麼，他說：趙子龍打敗仗也不掉一兵一卒，大將軍也。進有規矩，退有陣法，這是對公民抗命運動一種高境界的要求。

凡是參加過大規模街頭運動的人都知道，群眾運動大都一哄而起，一哄而散。前者並不要命，最要命的是後者，中共往往利用了群眾運動的這種先天的弱點，唯運動敗退時進行殘

酷的鎮壓，或者乾脆斬草除根，以防東山再起。八九民運的歷史告訴我們：在六四前在廣場上吹著進軍號的領袖們是英雄，六四後掩護英雄們撤退的人們也是英雄，而且後階段的這些英雄對公民抗命運動的貢獻一點也不比前階段那些英雄們差，因為他們為下一次公民運動保存了實力，也提供了榜樣。在這一點上，中共也許知道得比我們還清楚，因此他們在對羅海星等人的判刑一點不比民運領袖們輕。目前在海外，我們對這些撤退中的英雄宣傳得還不夠，對撤退的「陣法」也研究得不夠。對撤退的戰略意義的重視，才能說明運動的成熟。

七、和對手保持近距離

公民抗命是一場「韌」的戰鬥，也是一場「黏」的戰鬥，對付一個有四千萬黨員，有著最有系統、最有效的思想控制系統的世界頭號的共產黨，沒有一種「韌」的精神，沒有一種作好「持久戰」的準備，無疑地任何一場公民抗命運動都只能是短命的。我一向主張和中共保持一種近距離的拳擊狀態，一種膠著的「黏」的戰術。我們這一代大陸年青人的最偉大的指導者毛澤東關於「敵進我退，敵退我進」的游擊戰術，正好是目前對付他所創立的黨的最有效武器。在太平洋彼岸高喊著過激的口號不單無益，而且有害。公民抗命運動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應該研究各種不同的方勵之先生所提倡的「擦邊球」的戰略和戰術，這裏面需要有和中共鬥智鬥力的全部耐心、耐性和耐力。

而我樂觀地相信，我們所屬的這個民族是具備這些偉大潛質的。

劉青：艱難的起步 - - 中國的人權狀況

1. 恥笑人權

一九七八年底，雲貴高原的幾個青年人來到北京，在民主牆張貼了一封致美國總統卡特的公開信，所寫內容就是人權。中國政府後來在長達數年的時間裏，通過報紙、廣播、無數的大會和小會，對此嗤之以鼻，說民主牆那伙人在向美國總統乞求人權呢。在迫害民主牆的年月裏，這條罪狀長期被用來證明民主牆是一伙烏七八糟的人。七八年的中國，人權不僅是禁區，而且被幾十年的宣傳塗染成了荒誕不經的問題，中國政府順理成章的把它鍛鑄成了大棒打異己，中國多數百姓對它一無所知又視若瘟疫，就是有些民主牆的參加者對它也避之唯恐不及。有意思的是，撰寫這封信的黃翔，在民主牆還發表了其他簽署真名的詩詞和文章，獨獨這封給總統的信忘記了留名。如果這一忘記原是發表這封信整體籌劃的一部分，就可以

看出，即使勇敢又渴望人權的人，當年扣人權大門時，有著對現實狀況怎樣的疑慮。

這和當年中國的實際情況相符一致。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八年的中國，從官方報告的字裏行間和其他研究中國的資料看，有四千萬以上的人非正常死亡，他們消失在綿延不絕的政治運動和由政治運動驅動的經濟運動中。數以百萬計的上訪者在廣袤的國土上流浪，為的只是求討昭雪平反。從現實到理念，大陸的中國人那時還不知道距人權有多遠。所以，面對無所不在的人權侵犯，人們的智慧不是用來躲避自保就是咬牙忍耐。

傅月華組織的遊行很能說明那時的人權狀況和人們心目中的人權理念。這次遊行有一些特點：它是發生在北京東西長安街上抗議政府和共產黨的首次遊行；遊行的口號是「反饑餓反迫害要民主要人權」，這是一字不改的使用了當年共產黨領導的抗議國民黨的遊行口號；從遊行的組織者傅月華王振雄算起，它的成員幾乎清一色是無法生存的上訪者。遊行隊伍從東長安街往西長安街走，開始有一二百人，計劃最後到民主牆前召開集會，講述他們所受的迫害和痛苦。跟隨他們的外國記者有一大批，好幾輛採訪車，大大小小的錄影機和放影機，緊緊追蹤大概四九年之後就沒有在中國大陸拍攝過的場景。好奇的中國人絕大多數不敢靠近，遠遠觀看面有困惑和恐懼。少數走過去的是相反的兩極，有人鬼鬼祟祟聲音不高的表示同情、支援和激勵，但也有人衝上去破口大罵。最後，這支遊行隊伍被人數少得多的破口大罵的人衝的七零八落，終於不了了之。這時他們已經到了電報大樓前，離當時中國唯一的一小塊敢說點真話的民主牆僅有幾十米。靜靜的在民主牆前看民主人權文章的大量讀者，也靜靜的看著他們被衝散。我聽到一個約三十歲的青年衝上去怒吼：「就你們這樣子，活該不給你們平反，說明過去把你們收拾的不夠。」

一九七九年旗幟鮮明專門追求人權的組織，只有產生於民主牆的中國人權同盟。它是由任曉町、陳旅和張溫和等人成立的組織。成立時發表的人權十九條，是他們對世界人權理念模糊朦朧的理解及對中國人感觸深痛的那些權益的結合物。這個組織早期的總部設在天景二號陳旅家中。到過天井二號的一些民主牆成員常以玩笑輕視的口氣說，那裏是大車店，民間的上訪接待站。這說明當年敢於爭取人權的人，主要是失去了生存保障的上訪者。同時還說明，就是民主牆成員，對爭取生存權這樣的人權，也還缺乏真正的理解和支援。我七九年接待過許多來訪者，對要求改革要求民主很贊同很支援，但是一提人權和人權組織，總覺得不是正路怪裏怪氣。正是整個社會在人權意識上的貧乏和扭曲，中國政府才會以蔑視加調侃的態度談人權，不是對人權嗤之以鼻，就是企圖用人權醜化民主牆。

2.以清污和鎮壓對付人權

但是，像醜小鴨一樣，一個壯麗的生命不會為歧視偏見所凋萎。人權在民主牆被鎮壓以後，並沒有從中國社會消失，反而以淡一些的面目登堂入室，在官方的報刊雜誌和廣播中出現。這次不再是投訴無門的平頭百姓，而是中共主管意識形態最高層的一些人，如果硬要找他們和民主牆時期那些人的聯繫，大概只有都受過人權迫害這麼一個共同點。不過，鄧小平也受過迫害，可見這一個共同點並不是決定性的。

這批人中主要有王若水、王若望、夏衍和周揚等，但最引人注目的是夏衍和周揚。這不僅因為王若水、王若望一些人在此之前已經有過關於人權民主的言談，夏衍和周揚是新出現的黑馬，更主要的是他們兩人以往的情況對比這次的言談，反差之強烈給人印象深刻。周揚是中共中央的宣傳部長，夏衍是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這個部統管和指導中國一切意識形態文化藝術。兩人自三十年代起，就是共產黨在這一領域的幹將，五六十年代後更是這一戰線上實際操作的前台主帥。魯迅文章中所談的四條漢子，夏衍和周揚是其中主要的兩條。中國四九年以後的文藝宣傳界的人士說，夏衍和周揚是兩根棍子，從四九年一路打到六六年。但是，六六年之後的文化大革命，那些新冒出來的棍子，把他們兩人也幾乎打折。

這場實質在談人權的討論，是從一九八二年開始的。這個時間與民主牆被徹底解決的時間，即不僅西單民主牆被取締，已經大傷元氣但是仍然有些聯繫和活動的剩餘的民主牆人士也全被捕入獄的一九八一年，只相隔了一年。

不僅時間相距很近，如果深入下去注意事物的本質，民主牆所追求的目標，與這次報刊雜誌討論的人性異化，其實反映了一個事物的實踐和理論兩個方面。民主牆爭取的是政治民主化和基本人權獲得保障，即通過實踐爭取社會遵從理智和人性，這次討論談的是人的異化和人性、人情、人道等，它的潛台詞是在理論上證實有人性和需要遵從。民主牆與這次討論相隔時間的短暫，參加者屬於截然不同的人士，看似不同的話題但所談的實質卻是一個東西，說明中國以往的災難給了不同的人在人權上相同的啟示。

像民主牆一樣，這次關於人性異化的討論，開始出現的時候，沒有遭到壓制。於是，中國的報刊雜誌宣傳廣播一時異常活躍熱烈，大量關心國事的知識分子投入了討論，更多的人十分關注這一重要理論的變化和發展，真有點「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味道了。雖然是引用了馬克思有關人的異化、本質等話語出發，但一路向人情、人道和人性發展，否定了教導人們對異己「像嚴冬一樣冷酷無情」的革命的人道，接下去就快要到人權了。但是，壓制人權始終是專制的基石，這一領域異常敏感，觸摸不得。於是，針對這一意識形態上的新情況，

還有社會上日益活躍內容多樣的生活，中國政府一九八三年開展了「清除精神污染」的運動。掌握著中國政治上全部權利的鄧小平說，「清污」是他八三年僅做了兩件事中的一件。

周揚是「清污」運動的犧牲品。這次「清污」運動，中國官方表示的勝利標誌是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周揚的檢討文章。中共那時的總書記胡耀邦也公開說了這樣意思的話：檢討了就還是好同志，一不打棍子二不揪辮子，該作甚麼以後還作甚麼。但是在高壓下寫了檢討的周揚，已經不可能該作甚麼還作甚麼了，報紙公開他檢討後不久，他就住進了醫院，此後再也沒有離開。一九八六年前後，他神智出現了問題，生命對他剩下的只有痛苦。一九八九年，坦克碾過北京，許多年輕的生命被碾碎，周揚稍後不久在醫院裏無聲無息的離開了人世。

與思想理論上的高壓同時進行的，是對社會行為的大清洗，即鄧小平自稱的八三年所作的另一件事「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鄧小平所作的這兩件事在功效上是互為補充的，在實質上是一致的，其實是從理論到社會實踐對人權的一場大迫害。不過「清污」是針對思想意識的，具體的人大多是執政黨自己的進階官員，所以還表現的比較溫和，「嚴打」是衝著社會生活行為來的，打擊的物件是政治控制略微放鬆後在生活上有強烈的要求和表現的一般人，因此充滿了血腥氣。一九七九年之後，中國人藍螞蟻的形象正在快速改變，服裝的花色和式樣短時間內變的豐富而且色彩斑斕，性觀念上的變化猛烈地衝擊著中國人在性上的神秘、保守和迂腐，以跳舞為突出表徵的對生活樂趣的追求如決堤之水奔瀉而下，等等。這些變化並不一定完全是好事。同時，像人的異化的討論一樣，這些變化似乎同人們頭腦中典型的人權觀念不完全相同。但是，如果注意到中國從前所以沒有變化，完全是政府動用行政和宣傳的力量，在許多時候還動用了專政機器，對人性強力束縛的結果，就可以知道這些改變在中國是人權的恢復。當然，這些變化還僅是生活態度上的變化，人們努力追求的還僅是獲得生活情趣上的人權，沒有涉及政治和尊嚴上的人權。就是如此，像不能容忍異化的討論一樣，這一獲得生活情趣上的人權也觸動了專制機制異常敏感的神經，遭受到「嚴打」。十分典型說明這場運動在人權上的迫害程度的，是對於跳舞者的迫害，有人因為跳舞被逮捕、被判刑，甚至被槍斃，例如西安馬燕秦跳舞一案，數百人被逮捕，數十人被判刑或被槍斃。

所以，民主牆直接訴求人權與此後在理論和實踐上迂回取道人權，兩者的再一個共同之處是結局，它們都在高壓之下失敗了。不同的是，對於民主牆的努力，中國政府以恥笑和不大的力氣就給擊潰了，而對於人性異化的討論和社會追求生活情趣上的人權，則是運用了全黨全國的力量，發動一場運動以根除影響。也許，所費力氣和認真程度上的差異，還可以給人兩者之間的時光沒有白白流失的安慰——人權已經發展到中國政府要花費點力氣來對待的

時候了。

3.人權已是社會運動的目標和旗幟

鄧小平作了八三年的兩件事之後，進入了他一生權力的鼎盛時期，標誌就是他在國慶節以最高統帥的面目大閱軍，而且大學生的遊行隊伍高高擎舉著「小平同志您好」的橫幅標語。這說明他不僅控制了專制國家最高權力，而且得到了許多獨裁者難以得到的社會基層的曲意討好。事情奇怪的一面是，幾次被鄧小平痛打並使他借助這些功績攀升的人權意識，在鄧小平一路上升和鞏固權力的同時，不僅沒有縮小、消亡，反而也在上升和鞏固。最明顯的說明也是「小平同志您好」的橫幅。中國是個官本位的國家，對於有官銜的人不可以直呼其名，這種稱呼在中國人的意識裏暗含了輕視和不恭敬，是會種下禍根的。把姓和官銜連在一起稱呼，是對官員上司承認自己的低下和敬畏，直呼姓名是身份高的人才有的不成文特權。因此，公開打出「小平同志您好」的橫幅，除了表面示好的一層，潛意識裏，也有人的權利和尊嚴上升的一層。

八三年之後，在理論上闡述人權的，是新的人和新的形式，他們既不像民主牆人士那樣站在社會上大聲疾呼，也不像主管意識形態的中共官員那樣在馬克思主義中挖掘和求證，而是進入了學堂和社會作品，社會基礎和範圍都比以往深厚。他們的代表如科技大學的方勵之教授和作家劉賓雁。方勵之是科技大學的副校長，他的學者兼行政管理者的身份，給他提供了許多向學生講述民主和人權理念的機會，影響很快超出科技大學而在社會上廣泛流傳。劉賓雁則通過他讀者眾多的報告文學，揭露中國社會中人權侵犯的嚴重惡劣，其影響力迫使行政或司法部門對一些個案的不得不糾正，因而大大激勵和促發了許多人捍衛人權的勇氣和努力。那些年裏，還有一些個人的案件對社會人權意識的提升也很有意義。如喬雪竹的著作權之爭，遇羅錦的離婚案件。這裏，她們的對錯是非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一種爭取和捍衛自己權益意識的覺醒。人權的基礎就是要能夠意識和分清自己的權益，才會爭取和捍衛自己的權益，進一步才會知道尊重和保護別人的權益。

正是由於八三年之後，遭受多次沉重打擊的中國社會中的人權意識沒有消亡，反而像經受過嚴冬的生命一樣，更加生機勃勃頑強茁壯，所以在八六年的學運和八九年的民運中，人權才會每次都一面旗幟和公開爭取的目標之一。眾所周知，這兩次運動在中國政府的鎮壓下失敗了，但是它在人權上所展示的意義卻不應忽視。

八六年的學運，是知識分子的運動，主要成分是大專院校的青年學生。從七九年開始，

內心意識到了人權重要，痛感中國缺乏人權而導致許多災難，因而對人權有濃厚興趣的，大多是知識分子，尤其是年輕的知識分子。當時在北京大學的胡平說，有次下課後，教師說還想談談人權，紛紛離座的學生又重新歸座，打起精神準備洗耳恭聽，教師只說了一句人權是資產階級的東西，便使得學生們一哄而散。這個事例很可以說明青年知識分子對真正人權的關注。八六年學運中人權是爭取的一個目標，第一是這種關注在年輕知識分子中已經相當廣泛，第二是關注升級為爭取的行動了。不過，這次爭取還只是知識分子先行者的單獨行動，缺少社會整體的參與支援。中國政府對這次運動使用了軟硬兼施的鎮壓策略，一方面將政治舞台前台的頭號人物胡耀邦撤免，登報開除方勵之、劉賓雁和王若望的黨籍，一方面宣布不搞秋後算賬不搞運動，使這次沒有社會廣泛參與的人權民主很快消沉了。

八九年的運動，有些人也稱為學運，其實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一次民主運動，學生在這次運動中雖然起著重要的顯眼的作用，但全國數以千萬計的其他民眾的投入，學運是包容不下的。這次運動中，人權仍然是一面旗幟和一個爭取的目標，一定程度上起著凝聚和激勵人們的作用。這說明人權在中國已經為更廣泛的人所關注接受，社會願意將它當做一個目標去爭取了。中國政府對包括人權在內的這次運動的政治訴求，呼叫了數十萬精兵強將，動用了飛機坦克，靠流淌的鮮血和碾碎的生命才使之歸於沉寂，也說明人權在中國政治生活中有了不容忽視的份量。

4. 恐怖中人權意識的考驗

八九年的人權民主運動被血腥鎮壓後，中國政府擺開了全面整肅的架勢，一方面是為了根除人權民主的力量，一方面是共產黨極左派想趁機把中國倒退到毛澤東那樣的專制時代。我當時被關在陝西渭南第二監獄的嚴管隊裏，眼看著嚴管隊騰空了一層樓，培訓了大批的犯人，四處張揚著說：因六四「暴亂」而判刑的學生市民，凡是分配來咱們監獄，先讓他們在嚴管隊裏磨兩年野性；而死不認罪的那些人，只要在監獄一天，就別夢想看到嚴管隊以外的藍天。後來我被轉移到漢中第三監獄，看到那裏的嚴管隊為六四「暴亂」的學生市民，趕做了大批鐵床，其堅固程度怕是幾代人也睡不壞。

社會上同樣殺氣騰騰，每一個單位都像過篩子一樣過所有的人，人人要表示同黨中央保持一致，與「動亂」「暴亂」劃清界線，交代自己在這場運動中的行為和表現。黨員更是要進行重新登記和審查。持續不斷的審判和行政處罰，將社會壓入恐怖和驚慌之中。這種強化人類真理和救世主的地位，同時以監獄配合整個社會全方位施加高壓，是中國政府和執政黨最擅長也最有效的統治藝術，幾十年來就是靠了它，把中國社會調教得不懂人情和人性，當

然也不懂甚麼是個人的權益和尊嚴。所以，才會演出文革那樣的人類醜劇，不僅一般的人相互告密、攻擊，肆意侵犯他人的人權，甚至夫妻也相互誣陷自保，父子也反目為仇劃清界線。「六四」後，中國當局就指望這一法寶再次靈驗，重新回復堅如磐石的統治。

然而，歷史難重複，過往「畢竟東流去」。在「六四」後的整肅恐怖中，有許多感人的故事，顯示了中國人的人格在黨文化的灰燼中重新萌芽，幾年來的人權意識已有了一定的社會基礎。可以試舉幾例：寶雞師範學院的院委會議上，奉上級指示的院黨委領導要求人人表態「和黨中央保持一致」，一位院長助理憤而站起來說，「無法和殺人犯保持一致」；「六四」後中國政府設立了舉報電話，時常收到舉報鄧小平、楊尚昆和李鵬，罪行是指揮殺人；王軍濤、吾爾開希等一些被全國通緝的人，在逃亡的程序中受到無數認識不認識的人的協助和保護，有時為了幫助一個人有十多人被捕判刑等等。

當然，絕大多數人不像這些英雄那麼英勇。告密依然存在，陷別人以自保還是某些人的看家本領，可是那種堂而皇之和以此為榮已經無影無蹤，做這種事時常常鬼鬼祟祟不說，有些人事後還會告訴被告密人一些情況，以便他事前有所準備。絕大多數人採取的是不合作態度，不告密不攻擊別人，雖然抵擋不住各種處罰的高壓，覆述了報紙和上級教導他們說的話，但內心十分痛苦，有人講述這種屈辱時甚至留下了淚。由於大陸已是這樣的人權意識狀況，加之國際上強大的人權壓力，這次中國政府打算恢復毛時期統治的中興計劃才虎頭蛇尾的走了過場，大多數為「六四」政治犯預備下的監獄鋪位沒有等來要收拾的犯人。

5.八九年至九四年 - - 變化的邊緣

「六四」之前，中國爭取人權的力量，幾乎是孤軍奮戰，國內基礎不夠厚實，國際缺少有力的聲援。「六四」這一震撼人心的事件，極大的改變了這種局面。國內的人，尤其是那些有識之士，越來越多的意識到人權是一個社會的基礎工程，雖然不像政治運作常常有立竿見影的效應，但也不像政治運作大多懷有急功近利的心態。將人權的改善寄望於政治權利的改換，看似快捷，但回顧歷史卻發現，在轟轟烈烈熱熱鬧鬧和代價昂貴以外，社會離原來的出發點並沒有多遠，僅是一些政治人物的位置得到徹底改變。反之，艱辛遲緩的人權運作，一般在看得見的年限裏，很難有根本改變的期待，但每一步都是前進，都為更好的政治運作創造條件。而且，在「六四」之後國際國內的各種綜合條件下，情況變得比較適合爭取人權。通過爭取人權狀況改變，達到中國社會整體發展和改變，這是一條和平的可行的道路。有越來越多關心國事的人，在人權上大力呼籲和投入力量。同時，一般老百姓也由於中國社會的變化，日益意識到人權對自己的重要。因此，中國社會的人權基礎比以往厚實了許多。

國際上，中國的人權事業也得到了一定的支援。「六四」以前，由於中國政府的嚴密封鎖，國際對中國的人權狀況沒有甚麼了解，透過竹幕的殘缺不全的影象和聲息，還不足以促成人們真正的關切。在那個時候，國際上佔上風的看法，甚至是接受了中國政府的宣傳，比如對於爭取人權的民主牆，就和中國政府的看法相近，認為是干擾鄧小平改革開放的瞎胡鬧。然而，「六四」那場血腥鎮壓，由於有電視現場錄像和播放，成了中國政府在全世界面前進行的屠殺表演。這種殘忍激起了全世界的公憤，從「六四」那一天開始，中國不良的人權狀況，始終是國際社會關注的重點，得到國際輿論的同情聲援，民主國家政府也以一定方式，表示對中國人權的關注和促其改變。

在國內的變化和國際的壓力下，儘管「六四」後中國政府想的是恢復原來的專橫統治，卻也難以扭轉整個歷史潮流，所以「六四」後的幾年，中國的人權狀況還是有了一些變化。

從社會方面講，人權意識比以前明顯高漲，人權的爭取也比以前勇敢、策略、平和及富有韌性，而且顯現出較為牢固穩定。舉例來說，言論出版權是重要的人權，還在「六四」之後的恐怖階段，就有人堅持行使自己的這一人權，國內不能發表，就投稿海外，即使被抓也不畏懼後退，王若望、張偉國等一些就是這樣。再如籌劃成立人權、權益組織的也大有人在，九三年北京發起和平憲章運動，而上海和西安就有人要求註冊，行使結社自由的權利以保護人權，雖然遇到刁難和威脅，但並沒有動搖他們爭取人權的意願。就是一般人的人權意識，也與「六四」前大不相同，沒有人再認為人權是可笑而虛幻的東西了，雖然對人權的理解不夠完整正確，但人權可以保護並對自己有益卻已清楚。

中國政府這方面，由於國內民眾的不合作，國際上強烈的人權壓力，雖然有效的阻止了「六四」之後中國政府打算進行的全面的嚴厲的迫害，但並沒有能夠使中國政府改變它在人權上的一貫立場。這就使得一八八九年之後的各種有利條件，還不能構成中國大陸的人權狀況本質改變。中國政府依然拒絕世界批評，以生存權發展權和民族的特殊性為理由，堅持在人權上我行我素。另一方面，為了應付國際壓力和國內發生的變化，在本質不變之外，又有一些非本質的具體的變化。

所以說中國政府在人權上本質沒變，是因為只要涉及敏感問題或是中國政府認為對政權有挑戰性的問題，不論怎樣侵犯人權或者違背中國的法律，中國政府都不會在意國際壓力和國內民眾的看法和感情，而是一如既往的鎮壓迫害。例如：

抓捕、關押和審判，繼續是中國政府對付異議人士的重要手段。「六四」後的幾年，每年都發生大量的這類案件，使中國的人權一直是國際關注的焦點；

言論思想集會都是重要的人權，但八九年「六四」之後對這方面的控制，甚至比此前更為嚴厲，這一人權領域至今也沒有出現鬆動和改善；

對被關押的良心犯政治犯的迫害和虐待，仍然是中國政府逼迫異議人士接受改造和轉變，以利其維護專制統治的手段；

為了維護統治，中國政府還進一步通過立法的形式施加控制和迫害。如安全法暗含了可以不准中國人回國的意思，並且允許警察對電話搞竊聽活動等等。

可是，中國政府不認為直接挑戰專制的人權問題，「六四」後的幾年就有一些改變：

首先是理論和態度上有一定變化。理論上不再一味強調人權是內政，而是改為強調一部分人權更重要，態度也有所軟化，曾表示歡迎國際紅十字會去監獄視查；

中國大陸有一些人在海外發表了持不同政見的文章，這雖然叫中國政府惱怒，但處理比以往輕緩。前文化部長王蒙曾經在香港的演講中說，中國政府目前允許大陸人寫文章在海外發表，這一說法雖然不符合事實，但在海外發表文章的人所受迫害，確實遠低於過去；

在抓人和放人上也有變化，過去中國政府不管對錯，抓了就很難放。「六四」後非法被抓的許多人常是臨時關押，應付政府害怕出現的麻煩，如不再有影響和作用，便可能釋放；

中國政府對於人權的壓力和衝擊，比以前有大一些的忍受力。有些受迫害者和他們的家屬開始運用國際人權保護機制來保護自己，如向聯合國投訴，請求國際人權組織的幫助，希望海外新聞媒體報道以期獲得國際上的重視、同情和聲援。這些在過去被視為滔天罪行的做法，「六四」後逐漸變得不再嚴重，已經很少有人直接由於這樣的行為被關押判刑；

也許，最大和最有成效的人權變化是在不涉及政治的領域。「六四」之後，中國政府逐漸放棄了強硬的社會主義路線。一般人的生活和經濟活動，只要是與政治統治無直接關係，中國政府不再強行干涉、管理。因此，中國人民在政治權利之外，已經享有了不少的自由和人權，其中包括私下批評和不滿政府的言論。

當然，上述這些人權方面的變化，遠遠不夠，而且盡是表面文章，遠未具有人權實質改善的意義。如果只注視惡劣的人權狀況，對中國人權的未來難免感到失望。但是如果從七九年到九四年，縱向觀察分析中國的人權狀況，還是可以看到歷史的進步。給人鼓舞和希望的是，中國社會的人權意識和需要日益加強，國際社會對中國的人權情況遠比以前了解、關注，並存在著一定的影響和壓力。而困難之處則是，中國政府把人權問題視為一個政治問題，而且是與政府的生死存亡關連的政治問題。儘管如此，中國政府已經難以對人權採取進攻性的戰略，而是處於守勢了。這些綜合因素使人可以樂觀推測，中國的人權發生本質性的變化和改善，已是大勢所趨的歷史潮流。

6. 人權是否在走回頭路

中國政治有一種怪現象，即戲劇性的變化，以及政治人物說了不算、算的不說。鄧小平高度讚揚民主牆言猶在耳，即開始大抓民主牆人士判刑勞改，而民主牆卻是造成他獨掌大權的政治力量。這樣轉臉巨變的事例，在中共的統治史中屢見不鮮。最新的事例，是《紐約時報》對於中國人權狀況的評述。《紐約時報》在九八年十一月二日社論中說，幾個月以前還有理由希望，中國當局正在稍微放寬言論自由。但十月以來形勢驟變，公安部門在全國一連串的逮捕、羈押、抄家搜查行動，讓國際社會和中國民間的希望破滅，顯示中國又在走壓制迫害的回頭路。這不僅是《紐約時報》的看法，最近已是國際社會的普遍認識。為何在短短的幾個月時間裏，國際社會的看法有如此大的劇變？其實是因為中國在如此短的時間裏，發生了令人有理由作出如此判斷的大量事件。

首先是有大量事實，使國際社會確實「有理由希望」，中國可能逐漸的主動的改善人權。譬如，一九九七年底，中國政府簽署了《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十個月後又簽署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中國政府以保外就醫出國治病為名，釋放了魏京生；六個月後，又以同樣理由，釋放王丹出國。法律上的變化也引人注目，制定了內容有重大修改的新刑法，廢除了非法剝奪數百萬人自由的收容審查制度，承認和確立無罪推定的審判原則，允許律師立案後就介入以維護被告權益等。而中國政府處心積慮在國際上的活動，更是廣為世界所知並關注。如克林頓訪問中國不僅與江澤民展開人權討論，還史無前例的通過電視向中國民眾直播；從未使用過中國的聯合國人權高專，九月份也到中國進行了十天訪問；此外還有美國宗教代表團訪華，中國進行的國際人權交流和對話，在中國舉辦的人權研討活動，等等。

上述這些事情和變化，對人權來說都是非同小可的事情，是國際社會長期爭取也難以達成的。如魏京生的釋放，國際社會將近二十年來都在努力呼籲。而簽署兩個人權公約，對中國政府在人權的態度和理論上，則是意義深遠和至關重要的一步。中國法律上的許多弊端，一直嚴重侵犯人權並被國際社會批評，這次修改法律雖然未能盡如人意，但確實已經是不小的一步了。至於國際上的人權對話和交往，雖然是花拳綽腿擺給外人看的，但要想擺得好看也需要下些工夫，所以對人權也是有益無害的事情。一年之中有這麼多的人權變化資訊，對於十分了解中國在人權上走一步也難的國際社會，受到鼓舞並予以好的期望是理所當然的。

不過，《紐約時報》批評中國的人權在走回頭路，也並非空穴來風而是同樣有大量事實。最讓國際社會感到震動的，是僅僅由於籌辦中國民主黨就有數百人次遭拘禁、逮捕、審訊和抄家等。十二月份，籌組民主黨的發起人王有才，更被中共當局悍然判處十一年徒刑，另外兩個成立民主黨的參與者秦永敏和徐文立，也被分別判處了十二年與十三年徒刑；尤為荒誕的是著名工運領袖張善光被判處十年徒刑，所謂的罪行竟然是接受採訪時講述了目睹的社會情況。從海外返回大陸的異議人士王策，以及黃河清、李力等人，想向中共進言民主改革，卻招致了逮捕並面臨審判。如此密集沉重而嚴酷的懲處，所依據的事實和法律又如此脆弱甚至荒誕，令全世界的民主國家惶惑不解又極為氣憤，儘管與此同時中國政府又釋放了國際社會長期援救的劉念春出國治病，也難以平息各國紛紛表示高度關注和不滿、批評。

事實上，在十二月底國際社會深感震驚前，持續不斷的一系列的迫害始終在進行中。只是由於國際社會希望與中國交往，又被變化和發展的那些事情所鼓舞，而忽略了單個的或規模不很大的人權侵犯。如國際政界和媒體都很關注的方覺，他是權力架構內溫和民主改革的官員的代表人物，及北京活躍的宣傳政改的知識分子施濱海，他們早在七月就遭到秘密逮捕。而著名工運活動家李必豐被判刑七年，異議人士趙常青因為競選人大代表被判刑，以及山東的陳增祥、廣東的范一平，也都因與海外異議人士接觸慘遭多年勞改。甚至與海外電子雜誌交換網址的商人林海，就因為這種互通有無的網址交易，都被扣上了顛覆政府的帽子逮捕審判。一貫用來對付異議人士的利器勞動教養，則將沈良慶、王庭金、楊勤恒等等眾多的異議人士陸續送進了勞改隊。有兩個事例可以說明鎮壓迫害的程度和範圍：掛靠國安部下屬公司、公開主張為中共補臺的中國發展聯合會，財產也遭查抄人員也被拘傳審訊，沒收出國護照直至強令停止一切活動；可能最典型說明近來人權侵犯性質的，還是九月份中國警方公然扣押了「六四」人道捐款一事，連對於「六四」難屬和傷殘者的慈善行為都要取締。

這些對立矛盾的事實，其實也是近一些年來中國人權狀況的寫照，不過不如一九九八年所表現的鮮明強烈。例如美國政府對中國人權狀況的評價，說一九九六年完全消除了異議聲

音，異議人士不是被關入牢中便是被流放海外，但是評價一九九七年的人權狀況時，又用了許多含有鼓勵和期望的詞語。這其實並沒有錯，挑選和側重的材料不同，歸納出的結論自然不同，而不同的事實在中國社會確實都存在。但是根據這些矛盾對立的現象，是否可以同意《紐約時報》所說，中國九八年十月以來發生的鎮壓，顯示中國又在走壓制迫害的回頭路？這個問題可能難以非黑即白的回答。

人權在走回頭路，前提是人權已經走上了正路。然而中國的實際情況是，人權尚未走上正路。正路最基本的條件和標誌，應該是政府方面已經尊重人權承諾，願意接受人權批評和糾正人權侵犯，至少應該有這方面的誠意；社會民眾方面應該對人權有了相當程度的意識和習慣，對政府侵犯個人的權利和尊嚴的行為，不論是否危害到了自己或至愛親朋，都有相當大量的人挺身而出，對政府批評譴責對受害者的權益加以維護，社會輿論和新聞媒體也都能夠有力的秉公直言。如果沒有發展到這樣的程度，那麼人權一定是處於政權的迫害壓抑之下，其實沒有回頭路可走，只有政權對人權侵犯迫害的程度輕重之區別。顯然，中國目前離人權走上正路尚有距離，對人權侵犯迫害的範圍和程度，全由掌握最高權力的少數幾個人的認識和意志所左右，是聽憑專制者「賞賜」人權的階段。

當然，就是這一階段，人權狀況的侵犯迫害程度，隨時間地點條件的不同，也還有所不同及大小、輕重的區別。有不少中國民眾說，你現在只要不搞政治，在中國還是有自由的。這句話一語道破目前人權狀況的實質，即中國政府現階段強力壓制的是政治人權，一般民眾能夠享有經濟文化等方面的人權，而對政治人權的要求和期望並不明確強烈。政治人權目前似乎只有很少的一些人重視，而且不惜坐牢也要爭取。但其實這部分人權是其他人權和自由的保障和基礎，沒有這部分人權墊底，其他自由和人權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政府只要運用強權隨時能夠剝奪。中國如果不發生突破性的發展和事件，未來恐怕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處於這樣的人權狀況階段。但是經濟文化人權的發展和鞏固，必然會產生政治人權的需要，目前不懼迫害也要爭取政治人權的很少的人，終將匯聚成浩浩蕩蕩的億萬民眾。這一天不會再是永久的等待，雖然一九九八年底肆無忌憚的人權鎮壓，給人以嚴寒之感，但如此高壓嚴寒卻未能一刻消除異議人士的抗爭，就是人權運動已經鎮壓不住的最好說明。

A Difficult Start - the Situation of Human Rights in China(Summary)

by Liu Qing

* **Ridicule of Human Rights.** In 1978 human rights in China was not only a taboo, but was even depicted in publicity as preposterou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even cast it into a big stick to beat the dissidents. Most of the populace knew nothing of it, and even participants of the Democracy Wall avoided it. In 1979, the Alliance of the Chinese Human Rights which stemmed from the Democracy Wall and which was founded by Ren Wanting, Chen Lu, Zhang Wen and others, was the only organization in China striving for human rights. However the striving for human rights at that time lacked popular understanding and support.

* **Cracking Down on Human Rights.** The year 1982 saw the discourse on alienation of human nature in China. It was not suppressed at the beginning and was being actively discussed in the printing media as well as on the electronic media. However suppressing human rights is nevertheless the cornerstone of autocracy and thus in 1983 the 'Elimination of Spiritual Pollution' Movement was launched alongside a high-handed policy on ideology and theory. It was a massive cleansing on social behaviour. The launching of a 'severe crack down on criminal activities' was a massive persecution on human rights from theory to practice. The direct appeal for human rights by the Democracy Wall and the subsequent detouring demands for the same by theory and by practice were both cracked down and failed.

* **Human Rights were Already the Target and Banner of Social Movements.** Since 1983, what expounded human rights were articles that found their way into campuses and into the society. Their social foundation and province were deeper than before. The protagonists were Fang Lizhi and Liu Binyan. In the student movement in 1986, human rights was one of the targets. However this was only a monologue by the intellectuals without popular support and participation and was eventually cracked down. In the 1989 Pro-democracy Movement, human rights was still a target to be striven for and was widely concerned and accepted. Although it subsided temporarily, however human rights has already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political life in China.

* **The Challenge of Human Rights Mentality in Terror.** After the 1989 Pro-democracy

Movemen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launched a full-scale purge, eradicating pro-human-rights and pro-democracy forces. On the other hand, the extreme-leftist with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apitalized on the occasion to try to revert the country to autocracy as in the Mao era. However it was difficult for history to go back. For the past few years, the human rights mentality already had a certain social foundation, and coupled with great international pressure, foiled the attempt to revert to Mao-style governance.

* From 1989 to 1994 -- the Verge of Change. After June 4th, under internal and international conditions, it was more appropriate to strive for human rights. Internationally, human rights in China won considerable support. Socially, human rights mentality ran high. The strife for human rights was braver, more strategic, more peaceful and sustainable and appeared to be firmer and more stabl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till refused international criticism, insisting on its own way with the pretext of national peculiarity and substituting it with the right to life and the right to development. Howeve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did have certain changes in human rights after June 4th, although superficial and without substantial improvemen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lready found it difficult to take an offensive strategy. Rather it was on the defensive. The change and improvement in the essence of human rights in China has become the general trend of history.

* Is Human Rights Turning Back? Since China had signed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in late 1997, a lot of events convince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at China might gradually take initiative to improve human rights. However by a new wave of persecution and human rights infringement of a not very big scale recently, China has shown that it is turning back for crack down and persecution. At present China is firmly suppressing political rights while the populace are enjoying economic and cultural rights. However the development and consolidation of the economic and cultural rights will inevitably engender the need for political rights. The minority who strive for political rights will cluster with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the populace to keep on striving and struggling for human rights.

王超華：錯誤時機的一個錯誤行動——八九民運中的絕食及其與八十年代中國知識分子的關係

（提要）

1999.3.26

八九年五月十三日開始的大規模絕食請願活動的致命弱點在於，它的起始影響基本上是借助於社會上自四月中以來對學生組織性紀律性的深刻印象，而實踐中它卻並不具備已經可以依賴的良好組織基礎，從而本質上不具備對行動和策略的有效控制。其後所有關於「撤」與「不撤」的爭執，實質上都是關於對行動控制能力的爭執，並進而引發成不同派別對群眾控制權的爭奪。

這種實際上陷於失控危險的行動之所以會成功地發動起來，使剛剛萌芽的學生組織成為激進行為的「人質」，是和中國知識分子在整個八十年代所謂「推進改革」的整體政治心態分不開的。

雖然在八十年代鼓吹改革的程序中屢受挫折，但知識分子作為一個整體而言，在十年改革中基本上是樂觀和自信的。就其實質而言，其自信心和樂觀建立於知識分子與政治統治階層的可能合作上，而合作的基礎是雙方對汲取文革教訓的共識的一面（這種共識在八九以後即不復存在）。此一樂觀和自信的假象掩蓋了知識分子對中共政治權力機器的恐懼和順從。事實上，知識分子在八十年代的各種所謂「大聲疾呼」中，很少直接觸及中共統治中非法的核心，也極少提及公民在反對權力的鬥爭中如何在堅持原則的基礎上爭取自己受憲法保護的權利（魏京生和方勵之是突出的例外）。這種虛假的樂觀和自信傳達給八十年代的大學生時，造成學生中缺乏鞏固自治組織的緊迫感，實踐中無法擺脫共產黨大規模群眾動員式的活動方式，苦於無從將「軍事」上的暫時收縮轉化為「政治」上的成就。這種虛假的樂觀和自信同時也解釋了為什麼大多數活躍的知識分子當時願意「勸說」學生撤離而無法成功——由於在過去十年中，他們除了妥協沒有做好其他韌性抗爭的精神和實踐準備，這時他們就失去了傳達對專政機器「恐懼」感的機會和能力。

因此，筆者認為，五月十三日的絕食是八九民運發展程序中一個決定性的轉捩點。由於對於基於校園的微弱民主組織的徹底破壞，最後的流血衝突在此時已經走上了不可逆轉的道路。這是將來中國的民主運動必須汲取的一個重要教訓。

A wrong act at a wrong conjuncture -The hunger Strike in the 1989 Pro-democracy Movement and its relation with the intellectuals in the 1980's (Summary)

By Wang Chaohua

The fatal weakness of the mass petition by hunger strike starting from 13th May 1989 was that its initial influence basically relied on its deep impression in respect of its organization and discipline on the society since mid-April, while in practice it did not possess a good organizational foundation to be relied upon, and thus in nature it did not possess an effective control on its acts and strategies. And all the subsequent contentions about whether or not to draw back were in fact contentions about the capability to control the acts, which developed into a scramble by various factions for the control over the masses.

The fact that such a dangerous and actually uncontrollable act could have successfully started and changed the budding student organization into hostages for radical acts was inseparable with the overall political mentality of 'propelling the reform' of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s throughout the 1980's.

Although frequently frustrated in their advocacy of the procedure of the reform in the 1980's, the intellectuals, as a whole, were basically optimistic and self-confident in the decade's reform. Such optimism and self-confidence were based on the possibl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intellectuals and the ruling class. And the foundation for their cooperation was their consensus on the lesson learnt from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uch a consensus no long exists after 1989) The simulacrum of such optimism and self-confidence covered up the fear and subservience of the intellectuals towards the Chinese Communists' power apparatus. In fact, in their so-called outcries in the 1980's, the intellectuals seldom directly touched upon the illegalities of the rul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s, and they also rarely mentioned how citizens, in their struggle against authority, could strive for their constitutional rights and interests on the basis of insisting on principles. (Wei Jingsheng and Fang Lizhi were outstanding exceptions) Such artificial optimism and self-confidence, when transmitted to the students in the 1980's, had caused the students lack of a sense of urgency to consolidate their autonomous organization. Thus in practice, they could not rid themselves of the Communist style of mass popular mobilization, and were obsessed being unable to transform the temporary 'military' drawback into a 'political' achievement. Such artificial optimism and self-confidence also explained why most of the active intellectuals were at that time willing to try to persuade the students to draw back but in vain—because for the past decade, apart from compromising themselves, they did not achieve a sustainable spirit for struggle or a preparation for its implementation. They then had lost the chance and ability to transmit the sense of fear towards the dictatorial apparatus.

Therefore, I consider that the hunger strike on the 13th of May was a decisive turning poi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o-democracy movement in 1989. Based on the complete disruption of the feeble pro-democracy campus organization, the eventual bloodshed confrontation had passed a point of no return. This is an important lesson that the future pro-democracy movement in China must learn.

26th March 1999

"Fear, Faith and Freedom: Asia's Struggle for Democracy"

by CHEE Soon Juan

Secretary-General Singapore Democratic Party (SDP)

[Introduction]

Chee Soon Juan. Chee, 36, has a PhD in neuropsychology and was a lecturer of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until he was sacked for joining the Singapore Democratic Party (SDP) of which he is now its Secretary-General. When he disputed his dismissal, he was sued by his department head, who was also a PAP member of parliament, and other university officials for over \$300,000. He sold his house to pay the amounts.

He is the author of several books including 'Dare To Change: An Alternative Vision for Singapore', 'Singapore-My Home Too', and 'To Be Free: Stories From Asia's Struggle Against Oppression'.

Chee was recently imprisoned on two occasions for exercising his right to freedom of speech guaranteed in the Singapore Constitution by conducting public talks without a permit. He was also charged for selling his pro-democracy book To Be Free which bookstores in Singapore are too fearful to sell.

Why is democracy important for China and indeed the whole of Asia? The short answer is that democracy means more transparency and more accountability, more transparency and more accountability means sustainable progress and greater economic, political, social stability not only for any country but for the whole region.

We all agree that the lack of transparency and accountability in Asia, especially in the Southeast Asia, has exacerbated, if not precipitated, the current crisis that is ravaging the region. You've seen how the situation in Indonesia continues to threaten stability in the region. But it was only recently that most people, both in the East and West, believed that Suharto was the only one who could lead Indonesia out of poverty. We were so intent on believing this that we failed to see the undercurrents that the authoritarian regime was creating. Few had anticipated that the lid would pop so suddenly and violently. What happens in Indonesia affects the whole of Asia and what affects Asia affects the rest of the world. Like it or not, we live in a world more

integrated and more interrelated than we care to think.

Democracy may not solve all our problems, but it is significant to note that the most effective managers of the current economic crisis in Asia also have the most open governments, the Asian countries with the least amount of social upheaval are also the most democratic ones, and perhaps, most importantly, it is significant to note that no two democracies have ever gone to war with each other. So if you had to bet on a form of governance that would bring about long-term stability and progress to the region, would it not be on democracy?

But what does all this have to do with countries that are politically stable and economically viable, despite their governments' less democratic practices? Why should anyone want to change anything? To come to that conclusion one must first assume that an authoritarian government is going to carry on in its present state after its strongman dies. Are you seeing genuine overwhelming support for these governments or are you only seeing the manifestation of a society ridden with fear? What makes you so sure that there isn't a significant segment of the population waiting for the right time, under the right conditions to come forward to make themselves heard? How accurate are your calculations that after the strongman dies the center is going to hold? If you don't know the answers, would it not make more sense to gradually nudge the political system into one less dependent on one single individual and more on a democratic form of governance?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n particular, democracies of the Western world, has many interests in this region. It would certainly be myopic of these governments not to see the urgent need to push for the accelerated development of democracy and the respect for human rights in this part of

the world - not only because it's morally the right thing to do but also because it makes good economic sense.

But the fight for democracy must ultimately come from Asians ourselves. History teaches us that as the region continues to develop economically, more and more

countries are beginning to join the ranks of the democratic league. However, our journeys towards democracy have been perilously long. And sometimes, we forget that political change does not come from just movements, trends, forces, and paradigms. They come from real people, making real sacrifices. In my book *To Be Free*, I've written about the struggles of leading democrats in Asia. They are Taiwan's Shih Ming-teh, Burma's Aung San Suu Kyi, Indonesia's Pramodya Ananta Toer, Philippine's Aquino, South Korea's Kim Dae Jung and Singapore's Chia Thye Poh. I've tried to capture their pain, fears, humiliation, dark years in solitude, their broken bones and broken minds. Dissidents from China also stand defiantly and courageously against their oppressors, and their struggle is noy any less bitter, they need all the support they can get from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eirs are tragic stories. But theirs are also stories of inspiration where they've brought greater humanity to their own societies and to the world. In particular, these freedom fighters' struggle for democracy refutes the idea that 'Asian values' limit human rights. Rather, it shows that the fight against political oppression is universal. Their stories must be told and retold. As Asia rebuilds its economy, let us not forget the most fundamental of all fundamental values, and that is to nurture people before profits, environment before investment, and democracy before deals.

Kwangju, in the process of Korean Democratic Movement

by Eugene Soh

Executive Consultant of Kwangju Citizens' Solidarity

In 1998, the entire n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has witnessed the first transition of power through elections as well as world community. It was possible due to the never ceasing struggle of Koreans against their numerous dictatorial regimes Civilian and Military for a half of century.

In the process of achieving what the Koreans have today, one should remember the Kwangju Citizens' Uprising in May 1980. It was the most dramatic and an unique event anyone can imagine.

It has never been seen anywhere in the world in contemporary history of mankind. It was a dramatic event because, a band of students and youth took up arms, barricaded themselves in the Municipal building, challenged the mighty military troops. Overwhelmingly supported by the whole community, they formed the 'Pocket of Resistance' and sent a brave message to the Military.

"You can kill us all. Kill us! And prove yourself to the whole world how barbaric you are. And you carry that burden into the rest of yourself." Of-course, they lost the battle. But they won the war in the end.

It was an unique event because, there were no looting or a single robbery incident in the city of one million inhabitant during those turbulent 7 days.

But the price they had to pay was very steep indeed, more than 200 dead and thousands of people injured by shootings, beatings and stabbing.

And also, thousands of people were arrested and tortured. It is quite clear that the Kwangju Citizens' Uprising was a turning point of the Democratic Movement in Korea.

Now, it's becoming a text case for studying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throughout the world.

Particularly, in the Asian countries who are vulnerable to such a danger.

Kwangju Citizens' Solidarity set the 1st international Youth Camp for Human Rights and Peace in May 1996 in Kwangju, South Korea.

One hundred participants from 22 countries shared experiences that the Kwangju Citizens had and gave them some ideas what they can contribute to building a better

world.

The 2nd international Youth Camp for Human Rights and Peace will be held in Bangkok, Thailand in October 1999. In 1998, the KCS organized the Asian Conference to declare Asian Human Rights Charter in Kwangju. In 1997, the KCS published the memoirs of foreign correspondents who had covered the Kwangju Uprising of May 1980. The title of the book is "Kwangju in the eyes of the World."

The experiences of the students and citizens of Kwangju is an event that should not be repeated. The issue of human rights and peace is a worldwide one. Many countries within the Asian community susceptible to power hungry civilians or military take-overs.

We as the KCS would like to share our past and lessons we have learned from the strength of our students the continuing lessons we have learned and continue to experiences as a democratic nation.

程翔：中國民主化前景樂觀

1999.5.1

主要觀點

- 甲、中國有條件在 2010 年完成民主化的基礎工作
- 乙、中國民主化可望在 2020 年初步實現
- 丙、海外華人社會可以致力的地方

甲：中國有條件在 2010 年完成民主化的基礎工作

一、中國用 30 年時間建立一個極權制度，

所以，非極權化最少也得 30 年

- 1 1949-1977 極權制度建立及達到巔峰
- 2 1978-1988 第一階段非極權化
- 3 1989-1991 極左反撲 (天安門事件後極左回潮)
- 4 1992-2000 第二階段非極權化 (這期間比較順利)
- 5 2001-2010 第三階段非極權化 (這期間能否比較順利？)

二、中國極權制度的特點

共產黨的組織

槍桿子：包括軍警特等專政的機能

筆桿子：壟斷思想資訊的傳遞和交流

人民組織化：糧票、戶籍、單位、就業、生活

資源公有化：構成極權制度的經濟基礎

三、非極權化的過程和前景

極權的特點 第一階段 回潮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1978-88 1989-91 1992-2000 2001-2010

共產黨 - + + - - - -

槍桿子 - + - - - -

筆桿子 - - + + - - - - -

人民控制 - - - - - - - - - - -

公有制 - - - + - - - - - - - - -

注：- 表示弱化 + 表示強化 - 或 + 的數量顯示強弱程度

四、第三階段的非極權化動力

1 國際互聯網絡 (INTERNET)：衝擊意識形態的控制

2 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衝擊整個公有制，從根本消除專制的經濟基礎

3 中國興起一個新的有產階級：衝擊共產黨的階級基礎

五、初步打下民主化的基礎

民主化的客觀條件：

(以下主要是總結台灣的經驗，因為台灣是華人地區民主化

最成功的地方)：

- 社會利益主體的多元化
- 經濟結構的高級化：三次產業的比例有較大的變化
- 決策資源(資訊及信息)的非壟斷化
- 經濟資源的逐步私有化

乙：中國民主化可望在 2020 年初步實現

一、十年時程是根據台灣經驗而推斷的

- 1 台灣在蔣經國後期已完成民主化的基礎工作
- 2 李登輝執政的十年是台灣建立完善民主化的時期

二、民主化初步實現的主要指標

- 1 高級領導人經由直接選舉產生
- 2 有效的多黨制的建立
- 3 權力的產生、交替、制衡等均能有序地進行

三、大陸「初步實現」民主化的指標

- 1 省級領導人直接經由選舉產生
- 2 中共黨內形成有效的制衡(類似 1985 年以前的日本自民黨)
- 3 中共所制定的憲法範圍內的民主都基本落實
(包括全國最高權力回歸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丙：海外華人可以致力的地方

一、責任重大，大陸能否民主化將決定：

- 1 中國的統一問題
- 2 下一個世紀中華民族的命運問題
- 3 世界(特別是東亞地區)的穩定和發展問題

二、可以做什麼？

伍凡：中國民主運動的路線問題

1999.4.16

我自一九八二年底參加中國民運海外組織活動，已長達十七年之久，經歷了多次風波，現將個人對民運組織路線的經驗和感受簡要總結如下：

一、民主運動路線之爭的重要性

每個參加民主運動的成員都抱著個人的理想、目的和企圖心，以不同的方式和參與程度進入各個組織。許多事例證明，每個成員都會對民主運動產生影響，其中關鍵領導人物對運動將產生非常重要和關鍵的作用和影響。每個成員，特別是領導成員的個人素質、品德、操守、能力和企圖心對整個民主運動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但這不是我今天要談的題目。我今天只單純的集中在一個問題上面，即民主運動組織的路線，也就是中國民主運動在爭取中國的民主化的過程中採取的是什麼樣的戰略策略，什麼樣的鬥爭方式和方法。這個路線問題既和民運組織的領導人素質等等有關，更重要的是組織中眾多成員的集體智慧和經驗的總結。執行正確的路線，中國民主運動組織才能壯大和發展，才能和中國社會各階層百姓群眾利益相結合，才能得到中國人民的支持，才能從他們中間吸收人才和資源。否則民運組織將會成為目標狹小的人數減少的異己團體，而不是一個影響力廣大的政治團體。

十七年來中國民運組織在海外活動中充分表現了路線分歧和鬥爭。這些路線鬥爭加上民運組織的個別領導人的品質修養，對海外民運組織造成了很大負面影響。因此，我們應該總結十七年來民運組織的路線鬥爭的經驗教訓，以提高民運組織為中國民主化奮鬥的水平，並改變人們對民運組織的負面看法。

二、中國民運組織的路線之爭的各個方面

1. 如何看待及對待中共

在從事中國民主運動時，首先遇到的問題，是如何看待中國共產黨。中共在過去五十年來做了許多壞事，迫害百姓，我們是要徹底消滅中共，打倒中共，還是要理智的正確的對待中共。我認為應該採用理智的正確對待中共為上策，因為中共不是鐵板一塊，其中有許多派系和利益集團，有不少壞人，但也有很多愛國者和追求改革者。胡耀邦和趙紫陽及他們一些部屬明顯的受百姓歡迎，但李鵬則受人唾棄和厭惡。江澤民、朱鎔基和李鵬三人就不完全一

樣。另外，中共有六千萬黨員，包括家屬至少有二億人口，要消滅這二億人口是不可能的，其中有很多人是中國的精英份子，是中國的財富。因此，要正確對待中共是一個極為重要的政治路線策略。東歐和俄國對待共產黨曾經很激烈，引起極大的反彈。葉爾欣下令解散俄國共產黨被俄國憲法法院拒絕。現在俄共已成了俄國國會內最大的反對派。要爭取中國共產黨在經濟利益、政治壓力和國際環境三者變化的條件下的自身變化，使其變成遵守憲法、放棄一黨獨裁，這是中國民主化過程中的目標之一。這樣的做法是社會成本最小，對中國社會最有利。

一九八九年六月下旬，中國民聯第四次代表大會在洛杉磯召開，這是「六·四」大屠殺後的廿天。會上有代表提案在修改章程中加一條：「打倒中國共產黨」。大會投票表決 85 票比 6 票，提案未通過。可見當時中國民聯的政治路線還是得到多數成員支持的。

2. 海外民主運動如何對待中國

在海外從事民主運動的最終目的之一是要使中國強盛，並能平等對待周圍各國，維護亞太和世界和平。民主運動組織要爭取中國人權，同時要爭取世界和平。只有這樣才能得到各國人民的支持。但是在海外民運中也有人一味的反對中國強大，主張用核武器對付中國，用對待蘇聯的冷戰方法來對付中國。這樣的主張首先不符合國際潮流，要退回到冷戰時代，這不符中國的利益，也不符合美國和西方世界的利益，這條路線成功的可能性很小。

有些人把中共當作中國，分不清兩者的差別。當反對中共的政策時，也反對中國的正當利益。

3. 和平理性和暴力革命

這一條路線分歧在海外民運隊伍中長期存在。有人主張暴力推翻中共暴政、搶銀行、炸橋樑、進行暴力搶佔政府。我認為這是一條激進冒險路線，在中國已沒有實現和存在的可能性。中國百姓有反對中共政權的情緒和要求，但經過「六·四」大屠殺之後，再群起包圍軍隊和政府的可能性已下降了。百姓已深深感到這是一條不易走通的路，現在是寄希望於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寄希望於逐步的法治改革。一九五六年匈牙利人民起義遭蘇聯軍隊鎮壓，大批人民外逃，之後匈牙利工人黨逐步改革，四十多年來再未發生大規模暴動，而匈牙利也終於走上了民主社會道路，加入北約，不久將加入歐盟。可見社會改革和變化，不一定要完全依靠暴力。「六·四」大屠殺肯定是將長期影響中國社會變化的進程。中共和中國百姓都

不再希望「六·四」事件重演，其唯一的出路是雙方都接受逐步的改革。因此，中國民運組織應把重心放在和平理性的參與中國改革。而暴力革命是由各種條件聚合而成的，是可遇不可求的歷史機會，我們沒有能力去創造各種條件製造暴力革命，因此把精力放在和平理性改革上面是上策。中國大陸百姓的生活已逐步富裕改善，沒有多少人願意打破正常生活條件而從事危險的暴力革命。從爭取多數人的支持這個角度來看也應該採用和平理性的路線。

台灣民進黨在一九七九年高雄美麗島事件之後，當時的黨外民主力量就開始把爭取民主的方式轉變為通過選舉參政的方式。廿年過去了，這條路走通了，民進黨已在地方縣市執政超過一半，全島有近 40% 的百姓支持民進黨。由此可見，中國民主運動應該向台灣民進黨學習，走和平理性選舉參政的路子。這條路假以時日一定可以走通的，這是一條漫長的、要有耐心的、有成功希望之路。

南韓金大中參加選舉推動民主運動長達三十餘年，在朴正熙軍人政權垮台之後，競選總統三次，終於當選為南韓總統。這是由民運人士通過選舉執政的例子，值得中國民運組織認真研究學習。

4. 民主運動的公開性和密秘性

這條路線和上面講到的「和平理性和暴力革命」分不開，如果走以組織政黨，選舉參政則一定要用公開活動方式出現，絕大多數的活動要訴諸於選民，爭取選民的支持，把自己和政權統統放在陽光之下，讓選民來監督選擇。這是一條遵守法治，服從法律的方式，也是最安全的方式。如果採用暴力革命則一定要隱蔽自己的目的，採取突然襲擊的方式，採用策動軍隊武裝起義、搶佔電台、機場、軍營、銀行和政府大廈。這是一條最危險的方式。翻看亞洲歷史，只有韓國朴正熙以軍隊策變，打死總統後自任總統，政變成功，但這並不是民主運動的常態。菲律賓人民在美國政府的支援下，用和平起義方式逼迫把馬可斯逐出國門，流放美國。這種條件在中國目前還不存在。因此有人號召中國人民學習菲律賓人民鬥爭方式，成功可能性不會高，倒不如學習台灣民進黨的方式，成功可能性更大些，並且是真正的和平的民主運動，將會引起整個社會的意識形態和觀念的改變。在此，我無意反對民運組織中一些朋友的激烈主張和行動，每個人和每個組織有其定位和策略目標。

5. 民族主義和中國虛無主義

中國現在是由多民族組成，以漢族為主的世界大國。中國百姓絕大多數不願意見到因民

族問題而使中國四分五裂。誰分裂中國會堅決反對誰。民族主義思潮在「六·四」之後正在興起。蘇聯突然瓦解，南斯拉夫近八年的內戰而分裂，這都給中國人民極大的警惕，要防止中國因民族矛盾而分裂。同時，中共政權正在利用民族主義思潮來鞏固獨裁統治。這是一個客觀事實。中國民主運動組織如何面對民族主義的興起，是贊成還是反對？

至今人類社會，民族主義是個巨大的精神力量，許多民族戰爭，經濟糾紛，領土及資源之爭，大都來自各民族利益之爭。因此在爭取中國民主化進程中絕對不能輕視民族主義思潮，否則將一事無成，最後被落得「賣國賊」、「民族叛徒」的罪名。在民族利益和民主化進程發生衝突時，一定要智慧的審時度勢的去處理這個問題，絕不是簡單的用口號或教條來簡單應付。找出既能符合雙方民族利益，又能符合民主自由的政策，並能得到多數百姓的支持是上策。簡單的堅持各自民族的利益，而不顧對方利益，將會把事情弄糟而失敗，既要顧及各民族的利益感情，又要提出更廣泛的一致利益主張說服各方接受是件很難的工作。

共產主義思潮正在沒落，中國需要民族主義，但是中國不能以大漢族主義壓迫其他民族，應以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的方式對待中國各個大小民族。中國不應以民族主義來危害太亞及世界和平。

6. 中國民主運動對台灣、西藏和新疆問題的立場

台灣從未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之下，台灣仍以中華民國屹立在亞洲。北京和台北都承認一個中國，並追求中國統一。這為今後統一中國建立了一個基礎。如何統一，建立一個什麼樣的中國是個大題目。因此現在要台北接受「一國兩制」就等於要台北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這是台北不能接受的。台灣有一部份人要求獨立，這種思潮也反映到海外民運組織中，他們強調以民意為依據，贊成台灣及西藏、新疆，甚至東北三省及山東省都可以獨立。

這種論調已帶來極大的負面作用。做為民運組織的負責人，在對待如何處理台灣、西藏、新疆獨立問題要非常慎重，絕不能為了一時的利益而輕言獨立。我們要面對江東父老，要對歷史負責。中國不能分裂，否則是內戰大亂興起。這是民運組織的嚴重的路線問題。

西藏、新疆等地能否實行「一國兩例」呢？這是個非常具體而實際的問題。香港與大陸之間有二條防線將二地隔開，還可以實行「一國兩制」，西藏和大陸數省有幾千公里的連接，如何實行「一國兩制」？這是非常困難的。

我認為對西藏和新疆等地區，在一個中國基礎下，在民主化的條件下，實行充分的聯邦制可能是個好出路。

7. 對 MFN 和 WTO 的態度

美國給中國最優惠國待遇(MFN)，在民運隊伍中有二派意見。一派認為 MFN 對中國有利，應該接受；另一派認為讓中國享受 MFN 是養肥了中共政權，所以堅決反對，要以經濟制裁來懲罰中共。這裡有個基本問題：中國強盛起來，對中國百姓是否有好處？同時經濟強盛富裕之後，政治改革及民主化是否更有利？

看看台灣和南韓的例子，在經濟起飛之後，政治改革就比較容易了，民間力量的興起，公民社會的出現和國際間經濟文化的密切交往都是成了民主化和政治改革的進程。因此，中國民運組織應該支持中國接受 MFN 和參加 WTO。

中國民運組織應該把眼光放在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國際貿易等等全方位的事務上，不能僅僅要求人權和政治改革。中國要依靠全方位的改進，才能進行徹底的政治改革。

The Question of the Line of the Chinese Democracy Movement (Summary)

By Wu Fan

I. The importance of contention on the lines of pro-democracy movement.

The lines of organization of pro-democracy movement are to be contended on what strategy and what style and method of struggle to be used in the process of striving for democratization of China. This organization is the aggregation of the collective wisdom of numerous members and the wisdom and experience of various classes of the society.

II Various aspects of contention of the lines of Chinese Pro-democracy organizations.

How to regard and treat the Chinese Communists. The Chinese Communists should be treated rationally, because among them there are many patriots and reformers, and many of them are elites of the Chinese people. One of the targets in the process of democratization of China is to strive for the self-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mid the changes in economic benefits, political pressures and international circumstances.

How overseas pro-democracy movements treat China. One of the ultimate aims of overseas pro-democracy movements is to make China strong, in order to maintain peace in the Asian Pacific Region and in the world and to treat neighbouring countries on equal basis.

Peaceful rationale and violent revolution. This divergence in lines among overseas pro-democracy forces has been all along existing. The social reform and changes do not necessarily rely completely on violence. Peaceful and rational reform, and peaceful and rational election are the best alternatives.

The openness and secrecy of pro-democracy movements. In organizing political parties and participating in elections, open activities must be adopted to expose oneself and one's platform for the choice of electors. This is a way to observe the rule of law and to abide by the law, and it is also the safest way.

Nationalism and Chinese Nihilism. In the process of striving for democratization of China, the ideological trend of nationalism must not be overlooked, lest it fail. When the national interest clashes with the process of democratization, the problem should be addressed by wise judgement of the situation. It is undesirable to bully other ethnic minorities with Han chauvinism. The various nations of China should be treated on the basis of democracy, liberty, human rights and rule of law.

The position of the Chinese pro-democracy movement towards Taiwan, Tibet and Xinjiang. In respect of Tibet and Xinjiang and other places, under the basis of one China, under the condition of democracy, the union system may be a good

alternative.

The attitude on MFN and WTO. The Chinese pro-democracy organizations should support China to accept MFN and to join the WTO, because after economic takeoff, the political reform will be easier. China must reply on a full-scale improvement in the political,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aspects and in international trade before she can launch a complete political reform.

張倫：民主化的陷阱

1999.3.14

——從歷史和現實中得到的幾點啟示

1. 道德的民主與民主的道德

——關於中國人的道德化民主觀

2. 大多數人的權威和少數人的自由

——民主的權威與個人的自由權利問題

3. 書本上的民主和實踐中的民主

——轉型與民主化建設中的幾個關鍵

4. 大眾參考與精英的治理

——精英的角色及與大眾的關係

以上幾部分涉及範圍均很廣泛，具體的文章會因篇幅作適當調整增縮，事例、經驗主要參考近代中國的民主化嘗試以及東歐、南亞、拉美民主轉型中的一點經驗教訓。

The Pitfall of Democratization From History and Reality-some revelations

by Zhang Lun
14th March 1999

Democracy of Morality and Morality of Democracy

---- The Moralized concept of Democracy of the Chinese People.

2 The Authority of the Majority and the freedom of the Minority

---- The Authority of Democracy and the Individual's Freedoms and Rights

3 Democracy on the Book and Democracy in Practice

---- The keys of Transforma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4 Reference to the Populace and Governance of the Elite

---- The role of the Elite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the Populace

The above parts all cover a very wide scope. Appropriate additions and deductions are made to adjust the length of the articles. Events and experiences are drawn from lessons learnt from the democratization attempts of modern. China, and democratic transformation of Eastern Europe, South Asia and Latin America.

劉賓雁：中國改革的新境界（發言提綱）

中國大陸的經濟近二十年來有了快速增長，這是舉世公認的事實。但是中國社會越來越不穩定，全國性動亂正在逼進，也是一個有目共睹的事實。這說明一個國家財富的增長並不同於社會的福祉。巴西的人均國民經濟總值高出斯里蘭卡一倍，然而斯里蘭卡人的平均壽命卻比巴西人更長，嬰兒死亡率也更低。

很多人認為中國的問題僅僅是未實行政治制度的改革；只要實行了民主，中國的一切問題便可迎刃而解。十年前說這個話，也許還比較接近現實，現在則離現實更遠了。即使明天早上北京出現一個民主政權，在各級政府普遍腐敗、社會全面失序的狀態下，這個政權的有

效性也非常可疑。不是說不需要民主，而是說僅僅有一個民主還不夠。世界上這樣的國家是太多了，俄羅斯是最新的一個，而且國情與中國最接近。民主不能解決社會問題。

二十年來中國進步知識分子和黨內改革派的一個疏忽，就是把眼光過多的放在經濟上，或者過多地放在上層的政治鬥爭上了。對於社會這個層面，對於中國人口大多數的境況，關心較少。然而二十年來變化最大、各種矛盾最集中、最複雜的所在，恰恰就在這裏。中國前途的吉凶禍福，也將在這裏決定。

一九九七年國內一家報紙提出一個疑問：中國的改革派在哪裏？怎麼不見了他？改革派和保守派當然不會消失，它們的社會成份卻變了。今天在中國起著當年陳雲、胡喬木和鄧力群一流人物的作用的，已不是傳統的所謂「左派」。正是在鄧小平的改革中獲取了最大利益的一些社會集團 $\frac{3}{4}$ $\frac{3}{4}$ 瓜分了國有資產而成為千萬、億萬富翁的官僚資產階級、依賴腐朽的現行制度而生存和為所欲為的官方和民間勢力，以及社會地位大大提高、收入大大增長的一部分知識分子。這些人極力維護現狀，唯恐在進一步變革中自身受到損害。

農民、工人和所有低收入階層的無權狀態絲毫沒有改變。改革確是使中國人有了更多的生存空間和個人自由。但改革首先是使少數人享有了剝奪多數人的自由；是這些人首先並且最大地利用了政治和經濟的「空間」，而多數人則一如既往地連維護自己生存條件的機會都很少。這就使一九七八年以前中國社會關係中黑暗與腐朽的部分加速度地再生產起來。

表現為社會倫理、道德狀態空前淪落的種種現象，事實上是專制制度加黑暗、腐朽的社會關係之反映和結果。中國人雖然沒有公民的權利，又何必承擔公民的義務和責任？一個十二億人口的社會，覺得自己吃了虧、人人覺得自己有理由用任何手段向社會索取而不覺得自己對社會對他人有任何責任，這是一切危機中最可怕的危機。人的問題已不僅僅是一個社會問題，同時是一個政治問題。因為在這種條件下，一個良好的政治制度很難建立，建立了也很難維持。順民演化為暴民（或由暴民統治的順民）的傾向正在加速發展。

而這就成為少數知識分子較易排斥人民群眾介入政治的理由！同時，他們要求人民進一步解除武裝，束手等待「漸變」。孰不知一個社會的正面因素和負面因素是在同時演進的。曾經有人擔憂，香港回歸後廣東省會「香港化」。現在我們見到的不是香港化，而是在澳門尚未回歸時中國大陸已經在一片一片地澳門化了。在中國的中部和西部，中下層政權正走向黑社會勢力手中轉移。中國政治的最逼真的前景是：中國人一方面要繼續接受中共政權的統治，同時又必須接受一個「二政府」。在不少地方，二者已合而為一。

在這種情形下，還企圖建造一個西方自由主義民主制（「憲政民主」），而排除人民群眾的參與，只能是一個夢想。不去創造條件，讓中國人最廣泛地參加到政治變革和社會改造的過程中來，通過長期的實踐來改變人與社會的關係、人與人的關係以及人的主體狀態，一切政治改革方案都只能是幻想。

中國有條件做到這一點。中國人民加上潛藏著巨大的政治能量。問題是必須找到一條路，阻止中國人轉化為破壞力量的那個過程，使中國人的雄厚創造力能夠真正用於中國的變革。

嚴家祺：儒家政治傳統和中國民主前景

一九九九年四月十五日 紐約

講者簡介：嚴家祺：曾任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民主中國陣線首任主席，現為「民聯陣—自民黨」組織成員。主要著作有：《首腦論》、《文革十年史》、《聯邦中國構想》、《民主怎樣才能來到中國》。

民族像一個人那樣，民族的歷史就像一個人對兒童時期、青少年時期的記憶一樣，無法抹去，往往決定這個民族一次又一次選擇。在人生道路的重大關頭，當一個人作自由選擇時，實際上，人的記憶、潛意識正在主宰著他的選擇。民族也是這樣，重大的選擇，雖然不總是，但往往是「不由自主」的。

我對「民族」這種看法，是最近注意科索沃戰爭和研究南斯拉夫歷史得來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南斯拉夫」並不是「國家」的名稱。在歷史上，曾經有過「大斯拉夫主義」運動。在上世紀末和本世紀初，在巴爾幹地區逐漸形成了一種不同於「大斯拉夫主義」（Panslavism）的「南斯拉夫主義」（Yugoslavism）運動。所謂「南斯拉夫」，是指住在南方的一些斯拉夫民族，包括塞爾維亞族、克羅地亞族和斯洛文尼亞族，但不包括俄羅斯、白俄羅斯、波蘭、捷克、保加利亞等斯拉夫人在內。巴爾幹各族長期受奧斯曼帝國、奧匈帝國統治，「南斯拉夫主義」是南斯拉夫諸民族為擺脫外族統治，互相聯合，爭取民族獨立的運動。「南斯拉夫主義」曾在一次大戰前後和鐵托活動的時期有較大影響。許多人把南斯拉夫的解體看作是東歐民主化和南共聯盟解體的結果，實際上，當南斯拉夫諸民族不再受外來

民族壓迫。當它們的聯合失去基礎，或者說，當「南斯拉夫主義」不再成為一種「主義」時，南斯拉夫的解體就難以避免了。在塞爾維亞民族的歷史上，六百多年前的「科索沃戰役」永遠無法從塞爾維亞民族的記憶中抹去。塞爾維亞民族有上百首史詩歌頌塞爾維亞人在科索沃戰爭中的英雄行為。南斯拉夫在九十年年代初的解體強化了塞爾維亞人制止科索沃獨立的決心。

當江澤民用蘇聯、南斯拉夫的解體的「噩夢」，用「高壓下的穩定」拒絕民主道路時，江澤民既沒有弄清蘇聯、南斯拉夫解體的原因，也沒有看到中國民族關係與蘇聯、南斯拉夫的巨大差異。

中華民族是漢、滿、蒙、回、藏、僮、維吾爾諸多民族的總稱，各個民族都有自己的特性和歷史，整個中華民族又有不同於其他民族的特性。對中華民族來說，儒家思想最有影響，這是一種把家庭中的父愛擴大到國家政治生活中的思想。在儒家看來，國家的秩序應當和家庭中的秩序一樣，有慈愛、有服從，皇權應當像父權一樣，關心愛護自己的臣民。如果父親行為不正，家庭秩序就會發生問題，同樣，帝王暴虐也會使帝王喪失「天命」，導致皇權衰落。

今年四月，朱鎔基訪問美國，在華盛頓的演講中把孟子的「民貴君輕」思想和法國盧梭和人權宣言想比，似乎中國二千年前就有「人權」觀念。這是一種誤介。人權是政府權力不能介入的領域，而「民貴君輕」是儒家政治理想的一種表達，既談不上「人權」，也談不上「民主」，這是一種期盼「好皇帝」的思想，用毛澤東的話來說，就是要掌握權力的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

中國是一個有悠久歷史的國家，儒家傳統有助於中國社會的和諧，卻阻止了中國的成長，中國是一個長期在父母關愛中的孩子，閉關自守，不進入國際社會。一個長期受父母關愛的孩子，在青少年時期的某一「成長階段」，往往有一個「叛逆期」。歐洲啟蒙運動和中國的「五四運動」，可以說是歐洲和中國成長道路上的「叛逆期」。

一個不受父母關愛的孩子沒有「叛逆期」，他們往往過早體驗人間的苦難和無情，過早充分運用了他們的「理性」。「叛逆期」是為了擺脫外在的、人為的權威（如父母、帝王、教會）而只相信自己「理性」的時期。人們依靠「理性」可以實現自己的目的，同時「理性」也可以製造罪惡。對任何人來說，在成長道路上作出正確選擇，不僅需要依靠頭腦和理性，而且需要心靈和良知。對許多青少年來說，「叛逆期」促使他從父母的關愛、從「父母替他作決定」的狀態中走了出來。在跨過「叛逆期」後，一個人才能真正用自己的頭腦和心

靈，在人生道路上，面對挫折、困難和機會，作出一個又一個選擇。

啟蒙運動不是知識多的人去教育知識少的人的「運動」，而是啟發整個社會「理性」的運動。啟蒙運動認為，社會文明的唯一希望是理性，是知識的增長和科學的進步。啟蒙時代的許多大思想家，並不相信神的存在，他們只相信人的理性，用理性對中世紀的宗教 ¾ ¾ 一種外在的、人為的權威，對專制政治進行了無情的揭露和批判。在法國大革命高舉自由、平等、博愛的旗幟把路易十六送上斷頭台後，迎來的卻是「反專制派」之間的自相殘殺和新的專制。歐洲許多國家或快或慢跨過了自己的「叛逆期」，不僅依靠頭腦和理性，而且依靠心靈和良知來選擇自己國家的道路，或早或遲走上了民主政治的道路。

王策為推動中國組黨運動回中國而被捕，現在遠在監獄中。他寫過一本《中國重生之路》的書。他在談到「五四」時說，「五四新文化運動」高舉科學與民主的旗幟，卻錯誤地把一切宗教信仰當做迷信來拋棄。在對「外在的、人為的權威」的態度上，新文化運動推出「打倒孔家店」和歐洲啟蒙運動的無神論可作比擬。當歐洲許多國家在跨過「叛逆期」後，用自己的頭腦思考和用自己的心靈作出選擇時，中國卻把一種新的外在的、人為的權威 ¾ ¾ ¾ 一個充滿仇恨的、大鬍子猶太人的學說和他在中國的「傳道人」當作自己的權威。

中國在跨過「五四叛逆期」後，為甚麼沒有學會用自己的頭腦和心靈來作出選擇，而接受馬克思的學說並走上共產主義的道路？現在，中國即將進入 WTO。在中國成為 WTO 的成員國後多年，當中國對外國貨物和勞務進一步開放市場，當外國公司和中國企業直接貿易，當跨國公司在中國長驅直入，當外國銀行、證券公司和保險公司在中國遍設分支機構，當中國的商品貿易和金融業實現廣泛的自由化時，如果中國還是沒有民主，政治權力還像今天一樣介入市場因而使大多數產品缺乏國際競爭力時，人們就會十分容易理解在「五四叛逆期」後，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原因。

儒家的理想政治是「慈父政治」，即「仁政」。無論毛澤東，還是鄧小平，他們都不相信儒家的政治理想，「文化大革命」和「六四大屠殺」，沒有一點儒家政治理想的影子。可以說，正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並取得統治地位，阻礙了中國在跨過「五四叛逆期」後正常成長的道路。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長達四十年的時間內佔有統治地位。如果說十月革命一聲砲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那麼，可以說，「六四大屠殺」的槍聲在中國埋葬了馬克思主義。「六四」後的中國又到了一個可以作自由選擇的時期，是回到「五四」前保持儒家的政治傳統呢，

還是走上人類社會發展的康莊大道 ¾ ¾ 自由民主的道路呢？

作為中國的傳統思想，儒家學說中有許多優秀成份，但儒家的政治理想 ¾ ¾ 「慈父政治」有兩大缺陷，一是「慈父」可能會變成「暴虐的父親」，二是「慈父」不容子女的心靈作出自由選擇。而民主政治是建築在「心靈自由」，建築在承認「人的不完美性」和「權力需要制約」兩大基石之上的。在經過「五四叛逆期」和「六四」災難後，在加入 WTO 進入國際社會後，如果不想重蹈二十世紀痛苦的覆轍，中國就只能選擇走民主政治的道路。

民主政治的三大標誌：言論自由、組黨自由和不要「官方候選人」的「選舉自由」，在不遠的將來一定能在中國大陸實現。

在中國民主化的過程中，當然要妥善解決好民族和地區差異問題。達賴喇嘛提倡的「中庸之道」（與儒家「中庸之道」不盡相同）為我們整個中華民族妥善解決民族關係指明了方向，就是像香港一樣，把「高度自治」和「國家統一」相結合。西藏、新疆、內蒙實行「高度自治」。和平統一後的台灣也實行「高度自治」。展望中國的未來，在「國家結構」上，「邦聯式的聯邦」將是最有可行性的選擇，西藏、新疆、內蒙、香港、澳門、台灣，也許還有廣西和寧夏都將成為統一的、聯邦中國的「特別成員邦」。如果我們把一九一二年的「中華民國」和一九四九年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稱作「第一共和」、「第二共和」的話，一個自由民主的，聯邦制的中國將是「第三共和」的中國。

中國的前途在於建設「第三共和」。

The Political Tradition of Confucianism and the Prospect of Democracy of China(Summary)

By Yan Jiaqi

Confucianism has greatly influenced the Chinese nation. It is an ideology which extends paternal love of the family to the political life of the state. The tradition of Confucianism is conducive to social harmony in China, yet hampering social growth (While the Enlightenment of Europe was considered as the 'rebellious stage' of growth of Europe.) the May 4th Movement of China has the same significance benefit

from not only Many European countries could the 'rebellious stage', relying path on wisdom and rationale , but also on a conscientious choice of for their own countries. This path to ill evertvally lead to democracy. China however after the May 4th rebellious stage, embraced Marxism. Marxism has won the ruling status in China and hampered China's normal growth after the May 4th rebellious stage. There are many good elements in Confucianism. However, the political ideal of Confucianism – 'loving father politics'-- has two main defects. Firstly, the 'loving father' may become a 'despotic father'. Secondly 'the loving father allows no free choice of the mind for his children'. Democracy on the overhand, builds on two great cornerstones: 'freedom of the mind', and the recognition of 'imperfection of human' and 'check and balanco of power'. After the May 4th rebellious stage and the June 4th catastrophe, Democracy is China's only hope to peace and progress.

Looking forward to the future of China with respect to the structure of the state, a 'union of confederation style' will be the most viable alternative. Tibet, Xinjiang, Inner Mogolia, Hong Kong , Macau and Taiwan and maybe even Guangxi and Ningxia , will become 'special union states' of the Union of a united China. If the Republic of China founded in 1921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ounded in 1949 were called 'the First Republic' and 'the Second Republic' respectively, then a liberal, democratic union of China would be 'the Third Republic of China'. The future of China will be build on 'the Third Republic'.

張炳良：幹部體制改革對中國未來民主政治發展的影響

城市大學公共及社會行政學系系主任

一．幹部體制與政權的關係

在當代中國，幹部制度歷來不只是一個人事管理體制改革的問題，而涉及政權的實質。原因在於共產黨上台執政後，以推行社會主義建設為名義，基本上於五十年代逐步把全國全

社會收歸「國」有，而這個「國」乃由共產黨領導和全面支配的國家機器，其具體的體現就是幹部體制。過去的國家幹部涵蓋黨、政、軍、事、企、群六大系統；在取消私營經濟後，實際上全民都成為為「國家」服務、其生活完全依賴國家單位的工具。故此幹部體制既體現了「黨國」(party state) 自上而下的經濟、行政和社會操縱，也同時是人民層層由下而上依賴國家以求生存和發展個體利益的軀殼。在黨指揮政、黨管幹部的組織原則下，共產黨是幹部體制的最終擁有者和主宰者，因此人民共和國成立幾十年來的多場黨內鬥爭和整黨運動，也往往同時透過黨國機構及其人事體制的整頓而表現無遺。鄒讜教授直截了當地把中共建立的管治體系稱為「全能主義」的政治系統 (totalistic political system)，當中包括政權組織、政治文化和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係。¹

幹部體制既是權力和利益依賴關係的總建構，因此其演變自然關乎黨國的地位和前景，也是關心中國民主化的人士所應聚焦的。廣泛而言，民主化包含幾個不同層次和概念上的變革：(一) 管治權力的構成與更替、其社會基礎及社會認受性——民主化主張的是政權應基於全民普及公平機制 (如普及直接選舉) 的授權而產生或更替，產生過程當中應存在公平競爭 (因此應有多黨共存競爭)；(二) 管治權力的監察、規範與制度化——以確保權力不致濫用，並在受到適當制約、制衡和外在參與的條件下有利於產生利民的決策和行使權力的結果；(三) 國家權力 (政權) 和社會 (民間、公民社會) 的分離與互動關係——以確保由社會產生出來，原則上履行社會公意的國家不會轉過來成為壓抑社會、操控民間的統治機器。因此民主化和公民權利 / 人權的保障及自由化是分不開的。就是在不少西方民主國家，政權權力的濫用和官僚架構的權力和控制範圍的任意擴張，也成為其國民擔心成為削弱民主自由的因素，何況在當代中國這個基本上由黨國官僚幹部所壟斷的國度裏？所以，民主化的命題在中國不是簡單的應否及何時實行全民普及選舉，取消一黨專政的問題，還有一個更根本的層次，就是如何把國家權力進行合理規範和制度化。

二、過去幹部體制改革在不同時期的思路與主張

官僚主義、權力過份集中、幹部特權等弊端由來已久。中共領導層也很清楚其嚴重性。從某種角度去看，四九年以來，在不同的時期，中共也曾嘗試去解決官僚問題。建國初期的「三反五反」運動，重點便是針對打擊官僚腐敗、貪污的問題。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撇開黨內高層權力和路線鬥爭的角度，在某方面看亦是針對官僚主義、幹部弄權和脫離群眾。毛派認定黨內官僚已經腐化，變成資產階級，所以需要踢開黨委鬧革命，從而清洗黨內走資派。

直至文革為止，中共都輕易把官僚主義問題簡單地歸結為一個階級鬥爭或思想不夠革命的問題，視之為封建主義殘餘和受「地富反壞右」分子不良影響的結果，故需靠路線鬥爭、群眾運動、思想改造等手段去予以端正，從而低估了它作為黨國專政下必然產生的制度性危機的本質。

七十年代末，鄧小平二次復出主政，曾在政治體制改革上企圖尋求突破，他在八零年八月十八日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講話中開宗明義地指出：「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份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²不過，儘管鄧小平承認了幹部體制的制度性問題，並提出了不少在當時富有創意的改革（包括取消幹部終身制；健全幹部的選舉、招考、任免、考核、彈劾、輪換等制度；著手解決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的問題等），他的改革之最終目的還是為了飽受「三信」危機（信心、信仰、信任）衝擊的中共進行維新，以強化黨國的領導地位和能力，而非去削減黨對國家和社會之控制。「四項堅持」是對所有改革的思維制約。

這樣的一種以黨利益為最終利益的思維，因而注定了中共在八十年代政治體制改革方面的步步為營和反覆倒向，最後在八九年學運危機中為怕「亡黨亡國」而不惜以軍隊武力鎮壓學生與政治異見者。本來八十年代的政改是分兩個層次進行：其一為政府體制改革，集中於改善政府辦事效率與行政效能、幹部人事管理制度改革（含國家公務員制度之建立）、精簡機構等行政性改革；其二為政權體制改革，例如黨政關係、國家與社會的關係、政體民主化等政治性改革。在中國推行政改的過程中，那些針對官僚主義、行政改革、機構臃腫等問題的行政改革，推展時阻力政治較少。但那些針對國家和黨的地位，特別是黨政關係問題的政治改革，推行很難。中共十三大在八七年雖然提出黨政分開，但遲遲未見落實，六四事件後更不再重提，可見凡涉及黨的權力的改革其阻力必然極大。另外，即使是行政改革也未必事事暢通的。建立國家公務員制度，雖然在八十年代中醞釀多年，並經中共十三大正式提出確定，但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經歷廿多稿，遲遲未能出台，至九三年九月才由國務院拍板公布，當中最大原因就是改革觸動幹部體制內的既得利益架構，對不少現幹部造成衝擊威脅，阻力太大。同樣，朱鎔基近年推動國家機構改革，企圖把機構人員從中央至地方皆裁減一半，也遇到莫大阻力，連他也要聲稱為自己準備多一副棺材，以表不惜死戰以求達致改革的決心。

八十年代以來的政改，大抵上可以八九年「六四事件」為分水嶺。八七年中共十三大趙紫陽所作報告所勾劃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為主要理據根據的改革藍圖³，可算是較完整和全面的一套改革方案。在經濟體制改革上，趙氏報告提出「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

業」的總思路，主張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發展多種所有制經濟。在政治體制改革上，報告提出多項創新性主張，包括：

- 實行黨政分開；
- 下放權力，防止權力集中；
- 改革政府工作機構，轉變職能；
- 改革幹部人事制度，建立國家公務員制度；
- 建立社會協商對話制度，理順不同社會利益和矛盾；
- 完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制度（如人大制度、政協、群眾團體、差額選舉等）
- 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

可以說，十三大提出的經改和政改主張，其背後的理念思維是統一的，就是在維護黨的領導角色的同時，把原來權力和職能抓得死死的黨國進行系統分解和權力職能分工，政企分開、黨政分開，承認社會經濟多元成份和社會利益的多元化，不再堅持抽象的全國全民一體化的教條。

趙紫陽及其支持者推行幹部體制改革，當中富有政權改革的味道。改革的提法是科學性的，重點在於管好「人」和「事」。十三大報告強調，「進行幹部人事制度的改革，就是要對『國家幹部』進行合理分解，改變集中統一管理的現狀，建立科學的分類管理體制；改變用黨政幹部的單一模式管理所有人員的現狀，形成各具特色的管理制度；改變缺乏民主法制的現狀，實現幹部人事的依法管理和公開監督。」⁴這樣的科學管理化，其客觀效果將是調整以至削減黨的管控作用。當時構思的國家公務員制度乃分為政務與業務兩類公務員，前者類似外國選任或政治委任的公職人員，而後者則走西方文官系統的道路，受國家公務員法所管理，如此二分明顯地是配合黨政分開的總思路。

正因為十三大時所構思的幹部體制改革乃趙紫陽全面政改的一個組成部分，所以隨著「六四事件」後的政治反撲及趙的落台，其後的幹部改革思維和措施均收窄了幅度。黨政分開在「六四事件」後已截然不談，反而進一步強調傳統的「黨管幹部」的組織原則及各級各機關企業中黨組的領導角色。九三年國務院公布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⁵，放棄了十三大時主張的政務類與業務類二分的模式，改而採納了領導職務與非領導職務的分野，目的就是防止造成幹部隊伍（即公務員）出現黨政分開現象⁶。九零年國家人事部部長趙東宛在一篇黨刊文章中，就清楚申明：「我國的公務員制度明確規定，公務員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公務員在公務活動中應認真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在政治上、思想上與黨中央保持一

九十年代以來，至少在政治修辭和改革提法上，幹部體制改革側重了其行政管理和效率方面。江澤民在九二年中共十四大雖有提及政治體制改革，但把其位置放得很低，且避談黨政分開，只泛論進一步完善人大及政協制度、決策科學化與民主化、加強法制建設，及搞好社會治安以保證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等。⁸反之，在行政管理體制和機構改革方面，江澤民提出比較具體著實的指標，主要有以下各點：⁹

- 按照政企分開和精簡、統一、效能的原則，對現行行政管理體制和黨政機構進行改革；
- 綜合經濟部門的工作重點轉到加強宏觀調控上來；
- 撤併一些專業經濟部門，裁減非常設機構；
- 精減機關人員，嚴格定編定員；
- 加快人事勞動制度改革，實行科學的分類管理體制和有效的激勵機制，並與機構改革、工資制度改革相結合；
- 推行國家公務員制度。

九七年九月中共十五大，江澤民報告中對政改的表述基本上承襲了十四大的思路，仍是強調在共產黨執政的前提下去發展民主和法制，比較突出的是「依法治國」的提法。依法治國既可看成是中共願意接受法律的制約和法治的優先，但亦可解讀為中共放棄傳統的以思想及意識形態路線去統治社會，改以法制作為手段，而其政權壟斷性的地位則不變。十五大報告繼續呼籲推進機構改革，並以此作為涵蓋整個國家機構組織、職能、編制、工作程序、人事管理、激勵機制、辦事效率效能等一系列改革的總議程¹⁰，以應付嚴重的官僚主義，使不致「直接阻礙改革的深入和經濟的發展，影響黨和群眾的關係。」

然則，在中共重申黨的執政壟斷地位、黨管幹部、幹部與公務員皆須堅決執行黨路線並與黨中央保持一致下，是否往後的幹部體制改革在政改和民主化發展上便不可避免地黯然失色，陷於完全行政化、效率化的非政治性狹谷中呢？筆者認為情況並非如此悲觀和直線發展；反之，正正因為由幹部體制所代表的國家機器乃中共統治的權力行使載體和基礎，任何幹部體制改革和異動皆會對中共的權力構成制度性影響，故儘管機構改革和幹部人事改革在現階段以行政管理改革的思維去進行，其對政權的含義還是不應忽視的。

三．幹部體制改革帶來的制度性變化與衝擊

傳統的幹部體制的特徵是：

- 一元化、由上而下、「條條」控制的統一體制；
- 黨管幹部的組織原則；
- 「單位」本位的生活待遇制度（所謂幹部「單位所有制」）；
- 有較強烈的平均主義傾向（在文革期間尤為嚴重，例如七十年代初的「資產階級法權」論爭）；
- 缺乏完整的人事管理法律和法規，國家人事管理機構時受衝擊。

縱觀八十年代以來的幹部體制改革，可以清楚看到有專業化、制度化、法制化和科學管理化的明顯趨勢。

早在八二年中共十二大，就提出了幹部「四化」的目標，即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¹¹，當中的重點在於知識化和專業化，為其後的改革所強調的擇優錄用、因才升遷、業務培訓提供了路線根據。制度化體現於取消幹部領導終身制，健全幹部的選舉、招考、任免、考核、彈劾、輪換、任期、退休離休等制度，並確立各級人員的崗位負責制。法制化體現於對各級幹部的職權職能、政治待遇、生活待遇等制定專門條例，並設專門機構進行監督檢查（例如重設監察部）。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乃迄今最完整全面的規範國家機關幹部的法規，其十八章八十八條款涵蓋義務與權利、職位分類、錄用、考核、獎勵、紀律、職務升降、職務任免、培訓、交流、迴避、工資保險福利、辭職辭退、退休、申訴控告、管理與監督等¹²。科學管理化體現於對幹部體制實行系統分解、職能分解和職務職位的科學分類，實施分類管理，一改以往集中統一管理的流弊。

此外，隨著經濟市場化改革的推展，不少過去由機關或企業單位所承擔的服務（如住房、醫療、教育以至托兒、交通等）均走上商品化道路。幹部傳統享有的非工資性福利待遇紛紛實行現金化，這樣實質上大大削減了幹部對單位的依賴，從而促進人才的能進能出和流動，也同時嚴重衝擊了原有的單位所有制。

所以，儘管幹部體制改革未有正式觸及黨政分開、黨管幹部、四項堅持等政治禁區，因而距離建立一個唯才而用的政治中立的文官制度尚遠，但是隨著幹部體制日益制度化、規範化及在經濟利益上脫離黨的直接支配，則幹部便容易突顯其業務與專業自主性，有機會長遠地出現近似西方國家行政服從於政治、卻與政治分離的格局出來。例如，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開宗明義在第一條確定：「科學管理、保障國家公務員的優化、廉潔、提高行政效能」，

在第三條再強調「堅持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和德才兼備的用人標準；貫徹公開、平等、競爭、擇優的原則」¹³。換句話說，雖然中共仍高舉黨管幹部的原則，但是在依法治國的前提下，不斷的制度和規範化必然會制約黨組織在幹部人事管理和工作程序上的實質影響力。而且，經濟市場化改革的一個重要後果是政治權力與經濟利益的逐步分離，由市場邏輯而非單純的政治決定或行政行為去支配資源的分配，因而抽象的黨領導在人民及幹部的生活領域內的微觀層次之效應也在逐步下降。

誠然，一些歷史經驗也說明，文官體制擇優化（例如透過公開考試招錄）可以產生兩種截然不同的效應。Mueller 的比較研究就發現，英國和普魯斯（Prussia）兩國在十九世紀皆實行文官考試制度，在普魯斯新制度造就了城市中產階級憑考試進入原本由地主貴族所操控之文官系統的途徑，但在英國則相反，原來的貴族子弟藉著對學校制度的壟斷仍可繼續在文官考試制度下支配文官公職¹⁴。中國大陸的幹部體制改革，究竟擇優化的措施會否帶來幹部的社會構成（social formation）的重大調整，還是只停留在既有政治精英階層的再循環上（例如高幹子弟繼續憑藉較佳學歷壟斷中上層公職），仍有待觀察。不過，就算是在現存精英內進行重構，也不能排除像台灣式的既有權力階層內部自我改造和改革去促成國家統治的現代化和自由化的趨勢。當然，台灣在八十年代後期出現急劇的民主化改革，既有國際性大勢的外因，也有本土黨外勢力和民間社運的施壓，不是單靠國民黨內所謂開明力量的自發覺醒。同樣，中國大陸面對的民主化前景，若只靠中共黨內革新，也可能只會出現一個開明卻仍專權的威權主義來。因此，如何約束國家的權力及如何開拓民間社會的多元化和自主化的空間，是中國民主化命題的重要關鍵。國家體系內的改革目前有賴幹部體制改革的進展，而社會空間的發展則視乎經濟市場化改革所產生的新動力了。

註釋：

鄒讜（1994）《二十世紀中國政治——從宏觀歷史與微觀行動角度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頁 206。

鄧小平（1983）「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1980 年 8 月 18 日），收於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鄧小平文選（1975-1982 年）》，北京：人民出版社，頁 293。

趙紫陽（1987）《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1987 年 10 月 25 日），香港：三聯書店。

上引書，頁 37。強調線乃本文作者所附加。

《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1993），載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報》，1993 年 9 月 2 日，第 18 號。

有關建立國家公務員制度背後的種種考慮、爭論和政治衝突與討價，可參考 Lam Tao-Chiu & Hon S. Chan (1995) "The Civil Service System: Policy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in Lo Chi-Kin, Tsui Kai-Yuen & Susan Pepper (eds) China Review 1995,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pp.2.1-2.43; Lam Tao-Chiu & Hon S. Chan (1995) "Reforming China's Cadre Management System: Two Different Ideas of the Civil Service System", May, unpublished paper.

趙東宛 (1990) 「積極推行有中國特色的公務員制度」，《求是》，1990 年第 8 期，頁 40。

見江澤民 (1992) 《加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步伐，奪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更大勝利》(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1992 年 10 月 12 日)，北京：人民出版社，頁 34-36。

上引書，頁 36-38。

江澤民 (1997) 《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紀》(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1997 年 9 月 12 日)，北京：人民出版社，頁 37。

見胡耀邦 (1982) 「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1982 年 9 月 1 日)，收於香港三聯書店(編)《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香港：三聯書店，頁 40-42。

同註 5。

同上。

H.E.Mueller (1984) Bureaucracy, Education and Monopoly: Civil Service Reforms in England and Pruss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雷競璇：中國農村選舉對未來民主政治發展的影響

講者簡介：雷競璇，香港城市大學公共及社會行政系副教授，專門研究政治體制及選舉問題，同時為民間團體「民主大學」成員。

在政治體制上，中國在過去的十年中，對民主化有推進作用的變化不多，農村村民委員會的選舉是較為突出，也是最受到西方關注的一項(1)。本文嘗試總結此一制度的發展，並

探討其對民主化可能提供的貢獻。

在目前的中國，有廣泛民眾參與的直接選舉有兩類，其一是縣級和鄉級的人民代表選舉(2)，其二是村民委員會的選舉。從重要性而言，無疑是縣、鄉的人大代表選舉遠遠高於村委會的選舉，這主要是由於下面三個原因：其一，人大代表選舉屬於政權組織的部分，當選的代表行使政府的各種權力，而村委會只是一種自治組織，只具有法律賦與的有限職能(3)，兩者在性質和權力上不可同日而語；其二，從選舉的實踐時間而言，縣、鄉級的人大代表選舉比村委會選舉早得多，文化大革命前的一段歷史不算，目前的地方人大代表選舉，從一九七九年《選舉法》通過以來，就從未間斷地在鄉級每三年舉行一次，在縣級每五年舉行一次，至於村委會選舉，則是自一九八七年十一月《村委會組織法（試行）》通過以來，才逐步開始按期進行，在推行得最好的地區（如遼寧省、福建省），也不過完成了四或五次換屆選舉；其三，就選民覆蓋面而言，地方人大代表選舉是所有合資格的選民都可以參加，但村委會選舉只涉及農村村民(4)，而實際上目前仍有一定數量的農村還沒有進行選舉(5)。不過，村委會的選舉在重要性方面雖然遠遠不如地方人大代表選舉，但其所受到的關注程度，卻又大大超過地方人大代表選舉，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村委會選舉在制度上有不少創新，選舉的民主性質遠在地方人大代表選舉之上，因而引起中外人士的注意，這一變化和村委會屬自治組織，政府的監督和控制較為寬鬆有關；另一方面是政府對村委會選舉持相當開放的態度，很早就准許外國人前往觀察和研究(6)，但對於地方人大代表選舉，則相當重視保密，令有關的探討，難於進行(7)，於是大家的注意力也只能別無選擇地傾注到村委會選舉方面。

背景與發展

我們首先回顧一下村委會選舉的出現背景和發展，這也不單只由於歷史學的旨趣，更重要的是通過此回顧弄清楚有關的原因和設想，俾使和民主化的目標作對照。

自一九七八年開始，「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農村出現，農村的經濟體制改革迅速展開；農民在獲得生產自主性後，積極性提高，令到農產品大幅度增加，農村經濟迅速好轉。農戶取代原來的生產隊，成為農村的基本經濟核算單位，農民也逐漸成為國家稅務的直接繳納者，隨之而來的，是農民的財產權得到承認，人身自由也開始得到保障，過往農民完全被生產隊支配的情況出現根本性的轉變。但與此同時發生的，是實行了二十年的人民公社體制開始瓦解，土地承包給農民，農民自行決定如何經營後，生產大隊、生產隊這兩級最基層的組織失去原有功能，陷入癱瘓狀態。於是，在不少農村出現一種無序的混亂情況，集體財產由於缺乏管理而迅速流失，社會治安惡化，公共事務、公益事業無人過問，國家下達的徵糧

徵稅任務無法執行，計劃生育、教育工作等陷於停頓，於是一部分農村開始自謀應變之道，在一九八零年底，在廣西的一些農村開始出現村民委員會形式的自治組織，之後類似的組織在各地逐漸成立，這對於恢復農村秩序，執行國家任務明顯有所幫助，於是，在一九八二年底，全國人大通過新的憲法時，總結了有關的經驗，在憲法第 111 條將農村的村民委員會和城市的居民委員會規定為最基層的群眾性自治組織。不過，直到此一時候，政府對於如何重建農村組織，還沒有明確的規劃。

一九八三年十月，人民公社體制正式結束，鄉、鎮政府在原來人民公社的基礎上重新建立，但這個時期的重建工作往往換湯不換藥，公社改名為鄉、鎮，生產大隊改名為村民委員會，生產隊改名為村民小組，農村的混亂狀態在公社體制原有的架構下繼續，沒有顯著的好轉。

從一九八四年開始，中國政府著手農村村民自治的立法工作，同時帶動了對農村政策的全面檢討，在如何面對村委會，是否將之運用以重建農村組織的問題上，爭論極大，對村委會予以肯定的一派，著重指出村委會有助重建農村社會秩序，協助完成國家任務的作用；對村委會予以否定的一派，則主要是地方上的黨政幹部，他們擔心村委會成為黨政機關的制衡力量(8)。最後，由於分歧很大，全國人大無法完成立法，改為委託人大常委會代為立法，終於在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以「試行法」的方式通過《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在全國人大的立法史上，這是很獨特的例子(9)。

中央立法完成後，各省、市也分別制定有關的實施條例，而村委會的組建工作，包括村委會成員的選舉，則由各地方的民政部門負責執行。村委會的組織形式，是由年滿十八歲的農民直接選舉產生三至七名、任期為三年的主任、副主任和委員，並且推行財務公開、村務公開的制度，村委會接受村民大會或者村民代表會議的監督，並通過「村規民約」，以指導農民的生活和行為。據統計，到了一九九七年，全國共建立了約七十四萬個村委會，覆蓋了農村人口的約 90%(10)，對於恢復農村的社會秩序，執行國家的徵糧徵稅、計劃生育等工作，村委會發揮了顯著的作用。

在試行法推行十年後，全國人大常委會在一九九八年十一月通過了修改後的《村委會組織法》，新法無疑總結了過往的經驗，內容比前豐富詳盡，對於村委會的直接選舉程序、村民代表會議事制度、村務公開的方式等都作了更為細緻的規定，還特別增加了條款，明確指示了中國共產黨農村基層委員會對村委會的領導關係 (11)。

從以上的回顧可以看到，雖然村委會的出現源於農民應付農村混亂狀況的自發努力，但在後來的發展中，卻明顯有如下兩個值得注意的趨勢。

其一是在政府的有意引導下，村委會負擔了顯著的行政功能，接近於成為最基層的政權組織，執行由上級指派的徵糧徵稅、計劃生育等工作。目前的一個有趣現象，是發展得比較好的村委會，往往是因為得到有關黨政組織的重視和協助，而黨政組織之所以對之予以重視，是由於看到村委會在完成各種指派任務方面有積極作用(12)。換言之，對政黨系統來說，村委會發揮的主要是工具作用。這和村委會的民主性質無疑有內在矛盾。

其二是政府對村委會的監督和管制，有愈趨嚴密的傾向。一九九八年通過的《村委會組織法》，就令到村委會的組織和活動更為規範化，各省市也訂立詳細的實施規則，令到村民自治既要服從上級領導，又要受制於種種條文。自治並不是在政府放手不理之下展開，而是在政府密切監督之下進行。

成績與作用

對於村民自治推行至今的成績，一般都明確予以肯定，村民自治所追求的「四個民主」（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廣泛地獲得認同。村民自治的推行，包括村委會選舉的推行，各地的差異極大，實在不容易作出概括(13)，但如果將之作為中國民主化過程的一個可能組成部分而言，則村民自治起碼有如下三個積極的作用。

其一是在選舉制度上有所創新，很有可能帶來重大的突破。在創新方面，村委會選舉的多項措施現在已經是非常著名，包括（一）公開提名候選人，擺脫了一直以來主持選舉工作的機構操縱提名的情況，其中以遼寧省梨樹縣的「海選」最受稱頌；（二）以「預選」方式決定正式候選人；（三）允許和安排候選人進行競選活動；（四）較完善的秘密投票方法，包括設立秘密劃票間。對於選舉制度發達的社會（如香港）來說，上述各項措施並無特別之處，但在缺乏選舉傳統，尤其是對文化教育水平都相對落後的農村來說，這些措施卻是極大的創新，需要克服很多不利條件（包括黨政幹部的抵觸情緒）才能建立起來。現在，農村選舉普遍都因其民主性質而受到稱讚，中國政府在對外的宣傳上，也往往援引農村選舉作為中國民主有所發展的佐證。從政治體制而言，村委會選舉還有一層重大的意義，此即作為地方人大代表選舉的對照和參考，因為相比較起來，人大代表選舉明顯落後，在選舉的公開性、競爭的公平性和選民的可選擇範圍等方面，都遠遠不如村委會選舉，這就自然對人大代表選舉形成一種壓力，令之難於抗拒變革。去年十二月四川省步雲鄉的直選鄉長的嘗試，很可能

就是這種以村委會選舉為參考，謀求突破的先聲(14)。

其二是黨政機構的管治方式，逐漸出現變化。村委會的成員經由選舉產生，在執行工作上就不可能繼續過往黨政幹部高高在上，不受民眾約束的方法，財政公開、村務公開的制度雖然在各地實施的情況很不一致，但都普遍得到擁護，而且有關的規定也逐漸趨向明確。這對於制止農村幹部的貪污舞弊、揮霍浪費是有很大作用的。現在已經有學者注意到，村委會行政方式的演變，逐漸影響到上級的黨政組織，其中以鄉鎮政府在管治方法的變化較為明顯。因為一方面鄉鎮政府的各種稅金要通過村委會來收取，很多項目的工作也要村委會協助完成，村委會因此就多少具備了代表農民和鄉鎮政府討價還價的力量，鄉鎮政府和村委會之間，不再是上下級的指揮和服從關係，而是需要建立一種較為平等的協作方式。另一方面，在村委會進行財務公開、村務公開的情況下，鄉鎮政府也難於抗拒這種要求，現在一些鄉鎮已經開始推行政務公開制度，並且訂立了具體的章程和規定，有關的學者將之稱為「治道」(governance) 的變遷(15)。

其三是重視個人利益，並要求得到有效保障的一種公民權利意識，開始在農民中孕育和發展，而且已經到了不可逆轉的程度。隨著經濟改革，農民對自己的勞動和所得獲得了支配權，過往個人全由集體支配的局面慢慢結束，對於個人的財產和自由，自然要考慮如何得到有效保障，村委會的建立和選舉的推行，令到農村看到透過這種渠道，可以表達自己的利益要求，謀求較佳的保障，或者至少可以一定程度地制約幹部的專橫，對於長期以來在政府權力和政策之前都非常被動的農民來說，這種變化無疑是巨大的，這等於對個人自由和公共權力之間的界線，重就進行劃分，是以有學者稱之為一種新社會契約 (a new social contract) 的出現(16)。三年一次的村委會選舉，以及期間的財務和村務公開措施，周而復始地促使農民關注本身的利益和留心社會環境的變化，令之逐漸演變為一個積極的，敢於爭取的公民，這就為民主化所必須的參與意識，培養了巨大的力量。村委會選舉已經成為農村生活中的一項重大事務，這個深刻而廣泛的民主實踐極有利於在未來將之提升到更高的層次。

偏差與不足

以上三項，可說是村民自治和村委會選舉既直接地推動著政治體制的民主化，又間接地為未來更高程度的民主化準備了有利的社會條件。但同時也要看到，當中也有很大的局限，因此不應對村民自治寄以不切實際的期望。這些局限也可總結為以下三個方面。

其一，實行自治的農村至今仍未算普遍，在中國的龐大農村社會中。進行選舉的為數仍

然不多，即使在已經推行村民自治的農村，推行的程度亦非常參差。在一九九五年，民政部確定了 82,266 個村為「村民自治示範村」，但這只佔全部村委會總數的約 10%，而且其衡量標準還比較側重經濟增長，而不是全部集中在農村內部的自治管理(17)。另一位學者估計，在九十年代初，具有較強的自治功能的農村，只佔全國總數的約 25%(18)；另外又有學者估計，「行政化的村」，即村委會不過是鄉鎮政府的下屬機構，並無村民自治之實的農村，佔全國村莊的 60%以上，其中村級組織處於癱瘓、半癱瘓狀態的「失控村」，約為 10%(19)。所以，以中國農村之大，人口之多，目前接受過自治薰陶，行使過選舉權利的農民，仍然屬於少數。

其二，村民自治，包括村委會的選舉，極易被黨政機關操控和架空，變得虛有其表。目前的有趣現象，是在條件較差的農村（主要是經濟和文化教育落後），即使依照上頭政策成立了村委會，而且在人事和體制上和黨政組織有所分離，也往往由於各種條件不足而無力擺脫黨政機關的支配；在條件較佳的農村，則黨政組織在人事和體制上和村委會往往「融為一體」，具有實際意義的自治無法發揮，最通常的做法，是農村的黨支部成員和村委會成員交叉任職，將非常有中國特色的「一套人馬，兩個招牌」的黨政結構，貫徹到最基層的農村社會，又或者由黨支部書記擔任村委會換屆選舉工作領導小組組長，通過推薦候選人等方法，對村委會選舉進行引導和控制。一九九八年十一月通過的新《村委會組織法》，專門增加了條文，突出農村黨組織對村委會的「領導核心作用」，這就等於從中央政策的層次肯定了這種久已存在，在地方普遍推行的方法。在這樣子的控制下，村委會要開展真正的自治工作，相當困難，有學者將目前村委會的困境歸納為三個主要矛盾，其一為鄉政管理與村民自治的矛盾，即村委會易於淪為鄉鎮政府的派出或下屬機構，以完成鄉鎮政府下達的任務為首要工作；其二為鄉村內黨組織與村民自治組織的矛盾，即村委會易於淪為黨支部的副牌，最終的決定權在黨組織；其三為農村社區內政務與村務的矛盾，即村委會的工作，多大程度應集中在完成國家政策和上級政府要求方面（包括計劃生育、徵兵、收繳稅款、環境規劃、公安司法、民政事務等），多大程度應集中在涉及本村村民利益，由村民大會等組織議決的事務上(20)。歸根究底，就是自治能否落實的問題，而自治能否落實，就是能否減少或避免黨政組織操控的問題。中國政治的一大特色，是政策的目標相當不錯，相應的方法亦已完成，但推行起來卻很不一樣，各地更千差萬別，村民自治的理論與實踐，也無法逃過此一規律。

其三，即使在村民自治落實得比較好的地方，我們也不能不看到，由於本身規模的限制，將村委會的經驗再向較高層次推廣，是有困難的。中國各地農村在面積和人口方面差異極大，但較普遍的情況，是村委會下轄一千至三千人左右，18 歲以上的村民在數百至二千之間，由於農村生活較單調，生產活動的周期性較明顯和一致，對於進行選舉投票或者召開村民大

會等具有直接民主性質的活動來說，較為容易，村民在感覺新鮮，或者慣性服從的原因下，一般也積極參與，例如村委會選舉，常見的方式就是在農閒季節，召開大會，進行候選人諮詢答辯和投票，而且往往舉行多場大會。在推薦候選人程序中著名的「海選」方式，就是一個相當繁複，包括幾上幾下的程序，只有在農村的小規模基礎上才行得通。如果在選民數目龐大、分散，成份複雜的城市，很多現有村委會選舉的辦法都無法行使。因此，即使有上文提到的制度創新性，我們不得不看到，村委會選舉其實是在原理和精神的確立（公平、公開競爭、有真正的選擇性），以及培養選民的意識和習慣方面，作用較大，可供直接引用和推廣的方法和措施不多。

結論

以上從中國民主化的角度，嘗試對推行十多年的村委會自治和選舉作出總結，既探討其成績和貢獻，也指出其局限與偏差。可以看到，在過去的十年，由於中國政府集中全力進行經濟改革，政治體制的改革相對處於一種停滯局面，民主化的進展不大，村民自治和村委會選舉相對而言有較突出的發展，也引起中外人士的關注。但通過村民自治和村委會選舉來推動更高層次的改革，可能性不大，農村自治和選舉的經驗，大概只能提供有限度的制度參考，以及為下一階段可能出現的民主化準備一定的社會條件。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化，仍然是一個艱鉅而又不易取得共識的問題。簡單地說，中國的民主化既需要一種由上而下，有全面規劃、有明確領導的推動力量，而就目前情況而言，這樣子的力量仍未有出現的跡象，同時也需要由下而上，沒有甚麼一致計劃，分散而各自按照有關條件而發展的社會準備工作，包括在基層形成與民主化相適應的公民權利意識，以及推動有關的社會實踐等。村民自治和村委會選舉在這種由下而上的民主化準備工作方面，無疑是有重大貢獻的。長期以來認為中國不具備民主化條件的一個主要論據，是中國農民人口龐大，農民在文化教育方面落後，不具備行使公民權利，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的條件，村民自治和村委會選舉正是攻破這種觀點的有力武器。至於中國的民主化在甚麼時候和在甚麼環節開始有所突破，令到停滯不前的政治體制改革重新啟動，則恐怕不是目前可以清楚地看得到和說得準的事。共產黨的兩句老話：「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非常適用於這個問題。

註釋

其餘的有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加強，法制的發展（尤其是立法量增加和立法制度漸趨鞏固）等。

此兩級的人大代表採用直接選舉的方法，之上的各級（地級、省級及全國人大）則採用間接選舉的方式，由下一級的人大代表選舉上一級的人大代表。

憲法第一一一條的規定如下：「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設人民調解、治安保衛、公共衛生等委員會，辦理本居住地區的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調解民間糾紛，協助維護社會治安，並且向人民政府反映群眾的意見、要求和提出建議。」

本來，在城市應該成立與村委會平行的居民委員會，但由於城市居民的生活主要依賴本身工作單位的安排，居委會的作用不大，故此一直無甚發展。(見徐勇，頁 51。)

這方面的具體數據未見，但目前村委會組織只覆蓋農村人口的約 90%，即仍有一成的農村人口仍未有組織村委會，在村委會已建立的地方，選舉也不一定按期進行，各地差異極大，詳情見下文討論。

中國政府在 1994 年和 1997 年分別允許過兩個美國政治團體前來參觀村委會選舉，這兩個團體後來將觀察結果撰寫為報告書：International Republic Institut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lection Observation Report, May 15-31 1994, 1995 出版, The Carter Center, The Carter Center Delegation to Observe Village Elections in China, March 4-16 1997, 無出版日期。其他以個人身份來華觀察、研究農村選舉的外國學者為數甚多。

此情況最近稍有變動。在 1996 年底，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進行一項縣級人大代表選舉研究，在全國六個縣級人大作出實地調查，筆者也是研究課題組成員之一。另美國的卡達中心 (Carter Center) 1998 年底獲准前往中國四川省觀察鄉鎮人大代表選舉，見香港《信報》1999 年 1 月 6 日報導。

參見 Kelliher 文章。

有關的立法過程與爭論參見白益華、王然：〈法的神經〉及白益華：〈村委會組織法的形成及其基本精神〉。

村委會的數目，有一定的波動，現據歷年的《中國農村統計年鑑》資料，整理如下：

年份

村委會數目

1985

940,617

1988

740,375

1989

746,432

1990

743,278

1991

804,153
1992
806,032
1993
802,352
1994
802,052
1995
740,150
1996
740,128
1997
739,447

至於村委會組織覆蓋農村人口約 90%，則是筆者根據上述年鑑有關材料所作的推算。但需注意，各地村委會的活躍程度差異很大。

《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第三條。

有關這方面的分析，見 O' Brien 文章。

可參見徐勇書中包括的一些個案。

有關報導見《南方周末》1999 年 1 月 15 日及香港《明報》1999 年 2 月 11 日至 13 日。

參見白鋼文章。

此為 Minxin Pei 的觀點。

徐勇，頁 141-2。

此為張厚安的估計，見徐勇，頁 139。

徐勇，頁 144-7。

徐勇，第七章。

主要參考書目

法律：

《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試行）》（1987 年 11 月 24 日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及有關說明、審議報告，《全國人大常委會公報》1987 年第三號（5 月 15 日出版）、及第六號（12 月 20 日出版）。

《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1998年11月4日第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及有關說明、審議報告，《全國人大常委會公報》1998年第五號（11月15日出版）。

書籍、論文：

國家統計局農村社會經濟調查總隊編：《中國農村統計年鑑》，中國統計出版社，歷年。

張厚安、白益華：《中國農村基層建制的歷史演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

Tyrene White, "Reforming the Countryside," *Current History*, Vol.91, No.566, September 1992, pp.273-277.

Kevin J. O' Brien, "Implementing Political Reform in China's Villages",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32, July 1994, pp. 33-59.

Susan V. Lawrence, "Village Representative Assemblies: Democracy, Chinese Style",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32, July 1994, pp. 61-68.

Jean C. Oi, "Economic Development, Stability and Democratic Village Self-governance" in *China Review 1996*, edited by Maurice Brosseau, Suzanne Pepper and Tsang Shu-ki,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125-144.

徐勇：《中國農村村民自治》，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

Daniel Kelliher, "The Chinese Debate over Village Self-government", *The China Journal*, No.37, January 1997, pp. 63-86.

白益華、王然：〈法的神經〉，載白益華、楊開煌、石之瑜編：《中國大陸基層的民主改革 3/4 3/4 制度篇：村民自治的實踐》，台北：桂冠圖書公司，1998年；頁175至207。

白益華：〈村委會組織法的形成及其基本精神〉，載白益華等上引書，頁209至224。

白鋼：《村民自治與治道變遷》（未發表論文），1998年12月交予本文作者。

Sylvia Chan, "Village Self-government and Civil Society" in *China Review 1998*, edited by Joseph Y. S. Cheng,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235-258.

Minxin Pei, "Is China Democratizing" *Foreign Affairs*, Vol. 77, No. 1, January / February 1998, pp.68-82.

The Influence of the Rural Elections on the Future Democracy Development of

China(Summary)

By Lui Keng-shuen

For the past decade in China, what has got the function of propelling democratization is the relatively outstanding election of the Rural Villagers Committee.

At present there are two types of direct elections in China with widespread popular participation, namely the election of the county level and the village level people's congress, and the election of the Villagers Committee, the former being more important and the latter arresting more concern. This is because the nature of democracy of the election of the Village Committee far exceeds that of the election of the local people's congress.

Since 1978, 'household contracted responsibilities system' was launched in the rural areas. As the economy was recovering, the people's commune system began to disintegrate. A situation of chaos appeared in many rural areas and some of the peasants began coping the situation with their own ways. In late 1980 autonomous organizations in the forms of Villagers Committee appeared in the rural areas. Thereafter similar organizations emerged in various places.

In 1983, the people's commune system formally came to its demise. However the chaos situation did not improve.

In 1987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passed the tentative 'Villagers Committee Organization Law'.

In 1998 the amended 'Villages Committee Organization Law' was passed, the content was more complete and detailed than before, with more detailed stipulation on the procedure of direct election of the Village Committee, and the system of villagers representative conference. It also clearly stipulated the leading relation of the rural basic leve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ith the Villages Committee.

There are two trends of development of the Villagers Committee : One of them is under Government's intentional guidance , the Village Committee takes up prominent function of administration. The other is that there is a trend that the Government is

tightening the supervision and regulation of the Villagers Committee.

The success of the villagers' autonomy since its implementation is generally affirmed. The 'four democrats' it was pursuing, namely democratic election, democratic policy, democratic management and democratic supervision, are also widely recognised.

The villagers' autonomy has three positive functions: Firstly, it has innovation in the election system which is very likely to bring about major breakthrough. Secondly, changes gradually appear in the way of management of the party and Government organisations. Thirdly, personal interests are recognised and there are demands to effectively safeguard them. Such mentality of civic rights began conceiving and developing among the peasants, and the trend is irreversible.

The villagers' autonomy has its limitations: Firstly, autonomous villages are not prevalent. Secondly, the villagers' autonomy, including the villagers' committees, are extremely easy to be manipulated and marginalized by party and government organisations and is thus only symbolic. Thirdly, even in rural areas where villagers' autonomy is better implemented, it is difficult to push the practice of villagers' committee to a higher level.

The democratization of China needs a fully-planned propelling force with clear leadership from above as well as sporadic individual and social preparation from below.

陸德泉：經濟改革對民主的影響

講者簡介：陸德泉，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碩士、美國芝加哥大學社會學博士。著有《破論：刺破家國回歸夢》，一九九八年由香港人文科學出版社出版。

經改與世貿的專制危機：經濟民主的迫切要求

朱鎔基在人大和訪美期間對經改與世貿的講話竟然贏得海內外人士的掌聲和認同，甚至民運人士也沒有提出甚麼異議，彷彿朱老總所造的一切正代表著中國人民的共同利益和願望。如果這些掌聲竟然和朱老總的專制的家長見地和胸懷一般見識，民主運動還有前途嗎？

也許有些朋友會以五五開來評價朱鎔基，假設以「民主」及「市場」二大標準為尺；朱鎔基雖在「民主」路上未得一分，卻在「市場」路上取得滿意成績。事實如此嗎？在缺乏民主的決策和監督中，中國的經改方向和進入世貿缺乏共識。經改的方向只是少數科技官僚、富庶地區諸侯、新興企業家和現實的自由經濟主義知識分子所把持，將經濟及社會代價強迫工人及農民承受。在專制的基礎上推進的經改和進入世貿，正在傳統計劃經濟下的專制轉向不受制約的公司化和私有制的專制，和世貿「自由競爭」的專制。這些嶄新的專制機制與政治專制相結合，比傳統計劃經濟下的專制有過之而無不及。

經改的專制危機

所謂勞動制度改革，就是敵視就業的減員增效改革模式，是不斷推卸責任給地方政府、企業和工人的退休、失業、醫療、住房等制度的改革。所謂下放企業權力，只是將權力轉移給沒有公眾制約的企業經理，或單純將權力轉移給賤買國有資產的私營企業主。在沒有公眾監督的國企經理和私營企業主手中，各種企業和勞動制度改革就成為了國家賜予他們的尚方寶劍，隨意中飽私囊，侵吞企業利潤和國有資產；隨意向企業職工開刀，造成嚴重的下崗和失業問題；甚至企業幹部以權謀私，向下崗職工苛索錢財，從而協助復崗。

在中央政府推卸責任和地方政府在缺乏公眾監督下，朱鎔基吹噓的社會安全網更是千瘡百孔。中央政府只為了減輕財政責任，而不理會地方政府的財政困難；大量虧損企業無力繳付保險基金，不少地方政府的社會保險基金已面臨支付危機。有些地方政府在缺乏公眾監督下，甚至挪用社會保險基金，作非法借貸。各地的社會保險基金成為了隨時都會爆發的炸彈。

進入世貿的專制危機

中國在專制和新聞審查下，進入世界貿易組織的談判根本就是黑箱作業，剝奪所有受經濟開放衝擊公民的表達和影響決策的機會。從朱鎔基訪美到與克林頓簽署中美聯合聲明，現正進行的世貿談判，雖然香港及外電不斷報導朱鎔基作出了多大讓步，《人民日報》不是隻

字不提，便是簡略報導罷了。為了加快進入世貿，中國不惜放棄發展中國家立場，逐步開放各個經濟領域。為了換取推遲現代經濟部門開放市場的時間，中國不惜犧牲大量傳統經濟部門的農民和工人。

十億農民是中國政府首先出賣的對象。朱鎔基率先在農業上與美國達成協議，首先開放小麥和柑橘市場，逐步撤銷其他農產品的入口限制和降低關稅。中央政府無視大多數小農的生存和經營環境，就以國內的柑橘市場為例，李鵬在安置三峽移民時，已承諾以「高產值」的柑橘果園和換取農民的受淹農地。可是，在三峽移民尚未進入高峰時，國內的柑橘市場已經因生產過剩而崩潰了。現今，朱鎔基再開放柑橘市場，試問中國的小農如何能與財雄勢大的跨國農業企業競爭！

中國為了積極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為了符合其會員資格，為了提高在國際的競爭能力，只會不斷削減對國有企業的補貼、降低勞工收入和標準。國有企業的下崗和城鎮失業問題只會愈趨劇烈。

「自由競爭」的專制世界不公平貿易專制與國內專制的勾結

世界貿易組織鼓吹的「自由貿易」原則，遠高於「公平貿易」的原則。在最近歐盟和美國在世界貿易組織爆發的香蕉戰，反映了世界貿易組織為了維護「自由貿易」，不惜犧牲「公平貿易」。雖然歐盟在關注第三世界團體壓力下，訂立貿易優惠措施，維護加勒比海香蕉小農生計，免為跨國或本國香蕉大企業吞併。但美國政府給了維護美國香蕉大企業的利益，投訴歐盟設立不公平貿易措施。結果是，美國投訴成立，可向歐盟產品實施懲罰性關稅。

其實在全球農業自由化中，跨國農業企業為了確立在「自由競爭」中的優勢，不斷侵害勞工權益。在國際自由勞聯的報導中，跨國香蕉企業不斷以轉移生產來對莊園所在國施加壓力，迫使洪都拉斯、哥斯達尼加、巴拿馬等國採取敵視和侵害工會權益的活動。

現今中國政府不單沒有質疑這種「自由競爭」，相反卻不斷歌頌這些「自由競爭」的經濟效益，試圖以這些侵害勞工和小農權益的全球化競爭來逼迫勞工和小農從死中求變。

展望：經濟民主的迫切要求

在傳統計劃經濟下的專制轉向不受制約的公司化和私有制的專制，和世貿「自由競爭」

的專制。這些嶄新的專制機制與政治專制相結合，對於中國民主化帶來甚麼新的挑戰呢？

政治民主的隱憂

政治民主的目標，已經很多人說了，不打算多說。要強調的是反映多元利益的多元民間政治組織，避免重蹈俄羅斯被科技官僚、私營企業家和經濟自由主義派知識分子壟斷的悲劇。真正的民主制度必須是容納不同的工人和農民利益團體參與決策。中國的民主道路不單止遙遠，更值得擔心的是，在中國對全球化趨之若鶩下，中國所陷入的經濟危機將使中國的政治民主化亦不能為自己選擇發展的道路。金大中上台的南韓和蘇哈圖下台的印尼仍然要聽命於世界銀行、國際幣基金會監督的教訓不容忽視。固然，中央政府汲取的教訓便是避免外債，增加內債，轉移風險到由「順服」的中國老百姓承受。

公司化和私有化外的選擇

集團化和私有化只是繼續剝奪國有職工過去數十年辛勞的成果，以理性化、規模經濟和明確產權的意識形態來將資產和利潤轉移到新興企業家和私營企業主的手中。在加劇的國內和國際競爭中，集團化和私有化只會激化對在職職工的控制，淘汰沒有生產力的職工。雖然全總高舉維權和集體合同來「維護」職工的合法權益，但是，在經改中，職工的合法權益愈來愈少，工會的官方地位又不能真正站在工人利益說話。

究竟在國營、集團化和私有化外還有沒有選擇的餘地？真正的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能否發揮職工當家作主的權力？

對跨國企業、世界貿易組織、世界銀行、國際幣基金會的民主監督

全球化進一步讓跨國企業以自由出入、尋求更有「競爭力」的生產地來逃避當地政府的監管。世界貿易組織、世界銀行、國際幣基金會等又以「維護自由貿易」、「重建金融秩序」，來罔顧當地人民的意願，解除「貿易保障」和「經濟調整」。當其他各國人民尚可透過不同社運團體對這些跨國機構進行批評，中國的人民卻完全在中央政府統一口徑的控制下，不能說一聲不。

在專制的基礎上推進的經改和進入世貿，將傳統計劃經濟下的專制轉向不受制約的公司化和私有制的專制，和世貿「自由競爭」的專制。這些新的危機正挑戰政治民主的狹隘理念，

提出追求更廣泛經濟生活民主化的迫切要求。

陳一諮：二十世紀的世界與中國

1998年3月30日

二十世紀人類取得了有史以來的巨大進步，也遭受了有史以來的巨大災難。即將走入二十一世紀的人類，只有認真總結成功的經驗並汲取失敗的教訓，才可能少走彎路而開闢更加光明的未來。

在人類文明還未積累到足夠程度的時代，人類歷史呈現的是「弱肉強食」和「殺富濟貧」式的循環。自歐洲出現文藝復興強調人本主義、宗教改革實行天人對話、啟蒙運動倡導天賦人權、工業革命解放佃奴以後，人類的發展才邁入了現代化的進程。

二十世紀人類究竟取得了哪些進步？又遭受了什麼災難？中國又如何呢？這就是本文要討論的主題。

一、人類的巨大進步

二十世紀人類取得了有史以來的巨大進步，主要表現在：一是制度環境的改善，二是科學技術的發展。

正像人都有弱點和原罪一樣，人類至今尚未找到沒有缺陷的個體與群體的生存方式。但二十世紀人類通過改善制度環境，大大改變了人與社會的關係。人類在「人權、自由、民主、法治」的旗幟下，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歷史性進步，特別是聯合國兩個人權公約成為大多數國家承認的普適性原則。

制度環境的改善主要表現在，人類經歷幾千年的努力，終於建立了比較符合人性的現代經濟制度、法律制度、政治制度。她為每一個人提供了平等的權力，創造了平等的機會，使人的聰明才智得到了更大的發揮。在三分之一以上實現了現代化的國家，她們的進步並不是人性有了改變，或是靠說教與強制，而是靠制度環境的改善。正像發展學說所指出的，在決定發展的「五因素」（即勞動、資源、資金、技術和組織）中「組織」是關鍵性的，這裏所

說的「組織」正是指一種現代化的組織結構，也即是改善了的制度環境。近五十年來，香港、台灣的長足進步和大陸的落後就是明證。

二十世紀科學技術的發展也是空前的。越來越多的人生活在比以前更合理的制度環境下，創造發明層出不窮，物質財富大量湧現，「征服自然」已非夢想，人和自然的關係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善，相當多的人享受到了現代物質文明的成果。而這些成果又以日新月異的速度在全世界範圍內擴散、發展。

科學技術的發展在二十世紀可謂一日千里。從相對論、量子論的提出到原子彈爆炸、衛星上天、人類登月；從化學鍵、基因理論的提出到盤尼西林、去氧核糖核酸（DNA）發現，複製動物，試管嬰兒問世；從動力、噴氣交通工具到無線電、收音機、電視；從電腦、電晶體到家用電腦、網絡革命；等等，現代科技幾乎滲透到人類生產、生活的各個領域，無時無刻都在影響著人類的行為和思維。

二、人類的巨大災難

與此同時，二十世紀人類遭受了有史以來的巨大災難，主要表現在：一是法西斯主義的橫行，二是共產主義的試驗。

無獨有偶，這兩者都是以國家社會主義的名義出現，又都是企圖以暴力手段改造人類和世界，卻給人類和世界帶來了空前的災難，使上億人、十幾億人，或因戰爭、迫害和飢餓而死於非命，或受盡恐怖的折磨和奴役。

不管希特勒怎麼打著實現「高貴日耳曼」社會的旗號，還是東條英機如何鼓吹大和民族帶領建立「大東亞共榮圈」的企圖，由於都是赤裸裸地進行武裝侵略，屠殺猶太人、中國人和其他不順從的民族，這種極端民族主義構成的法西斯行徑容易被人識破，激起公憤，故而其雖對人類和世界的破壞嚴重，造成五千萬以上的非正常死亡，但持續時間卻只有十幾年。

共產主義試驗就不同了。資本主義的早期，一批理想道德主義者出於對社會公平的關懷，提出的社會主義思想是有進步意義的。本來人類對現實不滿而產生烏托邦理想是有積極價值的，但當將這種理想變成一種「烏托邦工程」去強行實施，災難便隨之而來了。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論即已將社會主義思想推向了極端，而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的共產主義試驗更給蘇聯和中國的人民和社會帶來無窮的災禍和苦難。

問題在於這種試驗不斷貼上「公平」、「正義」、「為人民」、「為人類」的道德標籤，極易在落後國家、特別是窮人中找到市場。但當試驗行不通，人們產生懷疑時，稍有獨立思想和不同意見的人，就會被視為「異己」、「反黨」和「敵人」，遭受一輪又一輪的清洗、迫害和屠殺。據可靠的統計，蘇聯在二十年代進行「共產公社」試驗時即餓死一千多萬人，而三十年代初期的強行集體化又餓死近兩千萬人，其他非正常死亡的人口也在兩千萬人以上；而中國在「大躍進」失敗後餓死的人口達到四千三百萬，僅四九年至七九年間非正常死亡的人口就高達八千萬人以上。一位柬埔寨華僑告訴我，金邊原有人口兩百萬，波爾布特佔領後，連殺帶趕只剩下五萬人。實際上，共產主義帶給人類的災難遠較法西斯主義慘烈、嚴重，欺騙性、持續性也更長。

人類社會的發展是一個自然成長和制度演進的過程。二十世紀取得進步並實現了現代化的國家，沒有一個是靠全面割斷歷史、否定傳統完成飛躍的，她們幾乎全部都是在不斷改善制度環境的過程中取得了成功。而蘇中兩國的共產主義革命，卻是用「烏托邦工程」構造一種違反人性、頭腳倒立的政治、經濟、社會制度，這種制度的最大危害在於它從根本上摧毀了進行試驗國家幾千年來所積累的社會、文化、經濟、政治關係，乃至於基礎細胞。這也是蘇東解體以後遲遲難於走上現代化軌道的根本原因。共產主義試驗造成的惡性後果將在下個世紀仍不斷給人類帶來麻煩和難題。

三、苦難重重的中國

《老殘遊記》裏，黃龍子說：世上的事情大多都是被那些有本領的人搞壞的。這句話對那些總想「拔苗助長」、「改造中國」的人來說，可謂警鐘。不是嗎？請看自鴉片戰爭以後的近代史，各界代表、特別是知識界，充滿了浮躁的趕超心態，一次比一次「左」傾，一次比一次激烈，卻很少系統研究成功國家的基本經驗以為借鏡。比如，許多激進知識分子從理想出發，在大喊自由民主的同時，卻排斥私有產權，不懂得私有產權制度與自由民主制度的關係，就是一例。

可惜的是，孫中山先生創立的第一個亞洲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在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已有長足的發展，但這個本世紀中華民族唯一可望成功的現代化進程，卻被日本軍國主義的入侵所打斷。四九年以後，中國雖然獨立了，但毛澤東一連串的共產主義試驗，不僅使中華民族受到了有史未見的摧殘，而且使中國出現了全面的倒退。

正像俄國學者所分析的那樣：馬克思主義是對工業革命的反動，而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則代表了前工業社會和後農業社會的農民思想。他們推行的共產主義烏托邦都具有農業社

會主義的特點，他們反對的正是現代社會的基礎：反對建立在私有產權、經濟自由基礎上的市場經濟，實行國有制、計劃經濟；反對建立在人權保障、法律秩序基礎上的憲政民主，實行階級鬥爭、一黨專政；反對建立在公民社會、開放社會基礎上的多元文化，將馬克思主義、領導人的「主意」訂為國教。所有進行這種試驗的國家，無不出現以粗野取代文明、以落後批判先進、以無知當作有知、以謊言冒充真理的全面倒退的局面。

而在中國的共產主義試驗，其落後、無知、野蠻，甚至殘酷都遠遠超過蘇東各國。毛澤東既照搬了斯大林模式，又延續了戰時共產主義體制，還繼承了東方專制主義傳統。他推行全盤公有化、計劃經濟，發動不斷的階級鬥爭，實行一黨專政的領袖獨裁，還建立起一種古今未見的「等級身份制」和「等級產權制」，將所有的組織和個人分成三、六、九等進行統治，並發展出具有「全能」和「依附」特點的「單位所有制」，建立起無所不包的宗法式人身依附關係。人們受到的愚弄和迫害，較之「通向奴役之路」和「動物公園」的描述不知嚴重多少倍。

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說到底是一個回到常識和主流的過程。而中共的改革帶有「將功折罪」的性質，因為它前三十年的執政使中華民族遭到了從未有過的劫難。而八九年民眾「反腐敗，反特權，爭民主，爭自由」的正義要求被血腥鎮壓以後，問題和矛盾積累得更深了，中共若不能深化改革，甚至自身改組，恐怕天下大亂的日子就很難避免了。

中國一旦「天下大亂」，受苦的還是老百姓。要避免這種前景，唯一的出路就是一步步推動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須知近代出現的民主運動不同於歷史上的革命，就在於她是一個爭取人人擁有平等權利和機會的運動，而不是一個改朝換代、一部分人打倒另一部分人的運動。雖然中國距離一個現代化國家還路途遙遠，但不甘貧窮、追求富裕、反對專制、嚮往自由，是人類、也是每一個中國人的天性。經濟市場化和政治民主化是任何國家匯入世界潮流所不可迴避的。雖然它的實現要有一個自然成長的過程，但它也是一個人人努力爭取實現的過程。各國雖然國情有異，但至今還沒有哪一個國家能反其道而行之並取得成功，逆流而動的政黨、領袖遲早會被歷史淘汰。

二十世紀對中國人來說，是一個歷盡苦難的世紀。當我們紀念「五四」和「八九」的時候，繼承先賢、先烈遺志的最好辦法，就是認清潮流，堅持不懈，用水滴石穿的精神，促進中國全面建設性的進步，促進中國制度變革的和平轉型，促進中國出現一個現代化的未來，使我們的子孫在新世紀不再遭受我們親歷過的苦難。

China and the World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by Yizi Chen

Center for Modern China

The human world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has experienced unprecedented disasters as well as unprecedented progress. Standing at the threshold of the 21st century, it is imperative that we take a serious look at both the keys to success and the lessons of failures in order to avoid unnecessary detours on our road to a brighter future.

Before civilization reached its most mature stage, human history oftentimes followed the "rule of the jungle" while also witnessed numerous examples of "Robinhood ." The human development did not enter the modern era until Europe began to experience the Renaissance which emphasized humanism, the religious reformation which recognized individuals' direct access to God, the Enlightenment which ushered in the concepts of natural rights,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which eliminated serfdom. What kinds of progress and what kinds of disasters have been bestowed upon the human world during the 20th century ? How has China fared ?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ddress these questions.

I. The Remarkable Human Progress

The historic progress of the 20th century is evident primarily in two areas: the improvement of system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human beings have their innate weaknesses and carry with them the original sin , the humankind has not yet discovered a flawless life style either individually or collectively. Nevertheless, the improvement of systems has given rise to dramatic change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society. Under the banner of "natural rights, freedom, democracy and the rule of law," the human society has achieved unprecedented progress. Most notably if the fact the two 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agreements have been accepted by most countries as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After trials and errors for several thousand years, a modern economic, legal and

political system based on human nature have finally appeared on the horizon, thus providing individuals with equal rights and equal opportunities, and enabling human intelligence and capability to reach greater potentials. In the over one-thirds of the countries which have achieved modernization, the progress did not result from the change of human nature, nor can it be attributed to preaching or the use of force; rather, it is the product of systematic improvement. As the development theory indicates, among the five elements (labor, resource, capital, technology and organization) that determine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is the key. Here "organization" refers to a modern type of structure; i.e., the improved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various systems. During the past fifty years, the impressive progress of Hong Kong and Taiwan can serve as good examples, in contrast to the backwardness of mainland China.

During the 20th centu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ve also undergone miraculous development. More and more people are living within a more rational environment. With endless new inventions and creations and an even increasing amount of material wealth, "to conquer nature" has long ceased to be a dream.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nature has improved tremendously, a significant number of people are enjoying the fruits of modern material civilization; these fruits are in fact being spread globally at lightening speed. From the theory of relativity and the discovery of atoms to the explosion of nuclear bombs, from the satellites orbiting heavenly bodies to Apollo's landing on the moon; from the theory of genes to the discovery of penicillin and DNA, from the birth of tube babies to the cloning of animals, from the steam engine and locomotives to radio waves; from the radio, television to home computers and the consequential Internet revolution,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ve permeated into every corner of human existence, and are exerting a continuous impact on human thoughts and actions.

II. The Colossal Disasters

On the other hand, however, the 20th century has also witnessed colossal disasters, reflected in the aggression of fascism and the experiment of communism.

Interestingly, both fascism and communism appeared in the name of nationalism;

both attempted to change people and the world through the use of force, and both have brought hereto unheard disasters in history. As a result, millions of people have either become victims of wars, persecution and hunger or slaves of fear.

Regardless of how Hitler upheld the banner of the "noble Aryans" race or how Tojo chanted the slogan of establishing a "Greater East Asia Co-Prosperity Sphere," as both conducted naked racial and military aggression against the Jews, the Chinese and any other "insubordinate" peoples, their fascist actions rooted in virulent nationalism were easy to recognize and trigger public outrage. As a result, even though both generated horrendous destruction the human world and led to the deaths of 50 million people, they could only last for more than a decade. Communism, on the other hand, was different. During the early stages of capitalism, a group of idealists and moralists, concerned with issues of social justice, put forward ideas of socialism. That kind of utopianism, which resulted from the harsh realities of capitalism, was in fact a rather positive development. However, once the social ideals were forcefully transformed into a kind of "utopian project," disasters began to strike. Marx's communism had already pushed the theories of socialism to the extreme, the experiments conducted by Lenin, Stalin and Mao Zedong brought endless sufferings to the peoples in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and China. The problem is that all these experiments were conducted in the name of "egalitarianism," "justice" under the pretext of "for the people" or "for the humankind." Consequently, these slogans were easily accepted in economically underdeveloped societies, particularly by the under-privileged sector of the population. When the endeavors generated doubts and inquiries, those who held their own independent and different views were regarded as "adversaries," and "anti-Party enemies" and were subjected to endless persecution, purge or even execution. According to reliable statistics, during the Soviet experiment with the so-called "communist communes" in the 1920s, over 10 million people died of starvation. During the 1930s programs of forced collectivization led to the deaths of nearly another 20 million; those who died of unnatural causes amounted to another 20 million. In China, when the Great Leap Forward Movement failed, starvation claimed the lives of 43 million Chinese. From 1949 to 1979, as many as over 80 million people lost their lives due to unnatural circumstances. An overseas Chinese in Cambodia told me that originally there were 2 million people in the Cambodian capital; however,

policies of ruthless killing and expulsion by the Pol Pot government left the place with only 50,000 residents. As a matter of fact, as communism lasted longer than fascism, its destruction was far more serious, far more deceptive and far more tragic.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is a process of natural growth and systematic evolution. None of the countries that have achieved progress and modernization in the 20th century did so through fragmentation of their societies and history or the denial of their tradition. Almost invariably their success was achieved through continuing improvement of their systems and environments. However,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s in both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and China, in implementing their "utopian projects," violated human nature and turned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system upside down. The most virulent danger of this system lies in the fact that it destroyed the social, cultur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relations in their respective countries that had evolved for thousands of years. This is the root causes for the tardiness and difficulty that have confronted Russia who has been struggling to embark on its road to modernization after the demise of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The vicious results of the communist experiments will be felt even during the next century, for they will continue to generate various problems for the world.

III. A Misery- Laden China

In Lao Chan's Travel Notes, Huang Longzi said that it is those "capable people" who are primarily responsible for many things in the world that have gone wrong. This remark should serve as a "warning bell " for those who are trying to "reform China" for it has been proven true throughout Chinese history. For the most part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after the Opium War, representatives from all walks of life, particularly those from the intellectual arenas, were often restless and eager in playing "catching up" in an ever increasingly "leftist "and radical pursuit of modernization; however, few have systematically studied the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of the countries that have succeeded in this endeavor. A telling example is the fact that many radical intellectuals, driven by their idealistic expectations, have chanted the slogan of "freedom" and "democracy" while at the same time objecting to private ownership. They obviously failed to understan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practice of private

ownership and the system of democracy.

The Republic of China , the first democratic republic in Asia established by Dr.Sun Yat-sen, had already made tremendous strides toward modernization during the 1920s and 1930s, but its process , the only one that could have succeeded, was unfortunately halted by Japanese military aggression. After 1949, it is true that China gained its independence, but Mao Zedong' series of communist emperiments have not only brought forth unseen destruction to the country, but also forced it into an all- around retreat.

As analyzed by Russian scholars, Marxism was a reaction to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whereas Lenin, Stalin and Mao represented the peasant mentality of the post-agricultural and pre-industrial societies. The communist utopia that they tried to implement shared some commonalties that had characterized agrarian socialism , and what they opposed was the very foundation of a modern society. They fought against a market economy built upon private ownership and free enterprise and instead implemented state ownership and planned economy. They opposed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based on the human rights and a legal system and instead instigated class struggle and insisted on a one-party dictatorship. They objected to cultural pluralism built upon an open and citizen-centered society and instead imposed Marxism and the leaders' "thoughts" on their peoples as the national ideology. All the countries where communism was practiced experienced whole-sale regression in that barbarism replaced civilization; backwardness attacked progress; ignorance feigned knowledge and falsehoods usurped truth.

Worse yet, in China backwardness, ignorance, barbarism and cruelty surpassed those in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and other East European countries. Mao Zedong not only copied Stalinism but also prolonged the system of wartime communism while at the same time inheriting the tradition of Oriental despotism. He implemented all-encompassing state ownership , planned economy, one-party rule and personal dictatorship while instigating endless class struggle. He established a unique status hierarchy that highly stratified rights of production, while divided all organizations and individuals into several different categories for more effective control. The "work

unit" system , for instance, created a crippling system of dependence and enslavement. The deception and persecution suffered by many Chinese are unimaginable and incomprehensible.

Reforms in all socialist countries are, after all, efforts at returning to common sense and mainstream. The reforms in China are, in a way, efforts at "atoning previous crimes with good deeds, "for the thirty-year rule by the Communist Party caused unspeakable sufferings to China as a nation. The problems were deepened after 1989, when the public demonstration against official corruption and special privileges and the public demands for democracy and freedom were ruthlessly cracked down. Failing to further the reforms and self-reconstruct on the part of the Chinese leadership, even greater chaos will probably be looming in the not so distant future.

Once chaos befalls China, the ordinary people are the still the ones to suffer. To prevent such a scenario from happening, the only way out is to push for economic and political reforms. One has to realize that the contemporary democratic movement is different from the revolutions in history in that it is a movement aimed at gaining individual equal rights and opportunity rather than a movement that was marked by the replacement of one dynasty by the other or the overthrow of one group of people by the other. Although China has a long way to go before it can achieve true modernization, it is the innate human nature and that of every Chinese to want to forsake poverty while seeking wealth, and to oppose autocracy while aspiring for freedom. A market economy and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 are the dual necessities for any country that wants to join the modernized global community. It is true that the realization of such goals takes time; it is true that every nation has its own set of realities, but so far no country that has gone against such a trend has succeeded. Those parties and leaders that attempt to stem the trend will eventually be discarded by history itself.

For the Chinese, the 20th century is one full of difficulties and sufferings. On the occasion commemorating the A May Fourth Movement and the 1989 pro-democracy movement, the best way to remember the pioneers and their spirits is to recognize the historical trend and press on with our efforts at promoting comprehensive and

constructive reforms in order to achieve a peaceful transition into a modern society, thus enabling our future generations to avoid the hardships that we have experienced.

楊建利：秩序 - 秩序瓦解 - 新秩序 - 中國的政治變革與憲政民主的確立

黨國秩序

以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共領導集團，自從從鄧小平手中接過大權後，一直試圖在「穩定、發展、改革」三者中建立起信服人心的必然聯繫和平衡，並把此當作駕馭十三億中國人邁向二十一世紀的治國大略。

從字面上，人們很難對這三者提出甚麼責難，事實上，在任何「歷史尚未終結」的國家，它們可以成為不易挑剔的政治口號。然而，這三者之間並不是在任何情況下都必然存在著良性的因果鏈條。其中的互動關係的性質，要看其背後的政治、經濟制度和社會現狀而定；換句話講，一切端賴穩定、發展和改革三者各自動力是甚麼，又在甚麼樣的動力系統裏運行。

改革之所以必要是因為舊的「全權式公有制」走進了死胡同。簡單地講，舊的公有制的建立是中共靠槍桿子剝奪私有財產完成的，雖然殘酷恐怖，但是，因為每個人的財產都要充公，其操作卻是簡單的。二十年前開始的經濟改革，從某個方面來講，是舊體系建立過程的逆過程。換句話說就是，經濟改革的一個重要方面是要把中共統治大陸三十年所積留的名義上屬於每一個公民的公有生產資料分到私人手中。與建立舊體系不同，分，並不存在整齊劃一的方法，分的過程永遠比搶的過程複雜，分永遠涉及到合理不合理的問題。實際上，解決這個問題並不困難，只要在經濟改革的過程中逐步引進對主導這一過程的中共政權進行監督和制約的言論和民意機制，就可以使改革的過程大致公平合理。然而，中共並沒有這樣做，二十年後的今天仍然沒有這樣做。改革整個過程基本上是中共一黨專政的權力操作的，而這個權力又是沒有制約的。所有的癥結都出在這裏。

操導經濟改革過程而又不受制約的權力為權力的擁有者帶來了無窮的利益，同時，將改

革的代價和風險一股腦地推向一般老百姓——那些與權力無關的人們。所以，中共當局不斷地受到兩個方面的挑戰，一個是以要求言論、結社自由等基本人權為中心的挑戰，另一個是要求社會公正懲治腐敗為核心的挑戰。有時，這兩種挑戰自然合流渾然一體，直接衝向中共的權力體系。政治改革和民主化的要求雖然曾經得到過中共黨內一些開明分子的同情和呼應，但是，中共統治集團作為整體對其進行殘酷地圍剿和堅決地抵制。「穩定壓倒一切」，這是鄧小平的鐵則，這一鐵則被江澤民完全繼承下來。

穩定的意思就是維持秩序。然而，如果一味地拒絕民意的自然調節的話，秩序的維持只能靠權力的壓迫和控制。權力要主導改革，權力要促進發展，權力要操持分配，權力要維持秩序，而權力不受民意的任何監督和制約，自然的結果就是權力的全面腐敗。權力的唯一來源就是中共一黨專政，唯一制約權力的就是權力，這更加增強了權力的絕對重要性，同時也自然地增強了權力的腐敗傾向。腐敗的權力造成了嚴重的官民對立，使各階層利益衝突不斷尖銳，越來越多的以保護自身利益為宗旨的抗議示威直接衝擊著中共所要維持的秩序，本來應該負責維持秩序的權力越來越成為破壞秩序的根源。然而，中共當局仍然使用權力壓制民意一次又一次的抗爭。於是，中共的權力在一種惡性循環中不斷惡質化：權力維持秩序 - 權力膨脹 - 權力腐敗 - 權力越來越成為秩序的消極因素 - 秩序受到威脅 - 權力維持秩序。這個惡性循環運轉的越久，中共作為整體對政治改革就越沒有信心。因為政治改革意味著現在權力的擁有者失去或部分失去權力，或者權力受到限制。官僚們在這個惡性循環中打轉越久，不僅得到的利益越大惡跡越多，而且預期政治改革後所可能受的懲罰也就越嚴重。越拖越沒有信心，越拖越沒有改革的前途，越拖同時救黨又救國的可能就越小。從改革開放開始算，中共拖了整整二十年了，積重難返，這就是為甚麼江澤民沒有開始舉世期盼的政治改革，相反的，按照慣性繼續在惡性循環中苟安，咬牙切齒「要把動亂因素消除在萌芽狀態」。如果說改革的早期中共鎮壓民眾對秩序的衝擊是由於勢強而不容挑戰，那麼如今卻是因為脆弱而不得不鎮壓了。這就是中共所要維持的黨國秩序。

秩序的瓦解

中共現體制下的權力在上述的惡性循環中處處製造著官民矛盾、官官矛盾。在這個體制之下，無論得（貪）多得（貪）少，人人都能發出怨言，人人也都有資格發出怨言，因為這是一個機會不平等，分配缺乏公正標準的社會。雖然分配嚴重不公，但是，高經濟增長率使得絕大多數人的所得在改革前期仍可以年年增長，普遍存在的不滿情緒並沒有激化，要求言論自由和擴大參政機會的民主運動也因此沒有形成民眾廣泛參與的，足以迫使中共變革政治制度的聯盟。中共當局的政治高壓和暴力威脅仍然可以維持著黨國秩序。

相對於改革前期，中國的經濟自去年進入了低增長期，這意味著不公正的分配將導致大量民眾的所得停止不前或降低，因為，當整個大餅增加緩慢或不再增大的時候，一個人的所得的增加是以某個他人的所得的減少作為代價的。換句話講，整個社會成為零和社會。官僚的貪污腐敗更直接地成為矛盾激化的惡源。國營企業的失業工人和農村的剩餘勞動力使中國的失業率成為兩位數。金融系統的長期混亂和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使外資持續外撤，進而使得以投資為主要牽引的經濟增長欲振乏力。政府以增加基本建設為主的增加內需的措施為權錢交易提供更多的機會。這時，各階層的利益衝突，尤其是一般民眾與權力階層的利益衝突將會激化，各種抗議活動越來越多，有時人數多至幾萬人。這些抗議雖然與八九年的民主運動相比，在國際上沒有製造那麼大的轟動，但是它們卻是和民眾的具體經濟利益僅僅地結合在一起的，它們對現秩序的衝擊更為根本。民主運動以組建反對黨為近期目標，風起雲湧撲而不滅，直接地衝擊著中國的政治制度。上述的惡性循環鏈條隨時可能崩斷。

一般來講，專制秩序只有在三種條件下才可能瓦解。一個是，專制政府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國際國內的環境對統治集團都比較寬適，同時，領導階層具有民主化的長期國家目標，統治集團由於自信而主動開始政治制度的變革。如臺灣的國民黨政府。再一種就是，現體制不僅無法化解吸收各種社會矛盾而且越來越成為其根源，面臨國內國際的強大壓力，專制政府被迫放棄對老秩序的維持，同時也不具備獨力主導建立新秩序的信譽和能力。如一九八九年的東歐和一九九八年的印尼。最後一種就是，現體制不僅無法吸收和化解各種社會矛盾而且越來越成為其根源，專制政府堅持政治高壓不斷地使用國家機器將暴力表面化，民眾最終被迫用組織的暴力推翻專制政府。如中國的清王朝。第一種條件中國並不具備，因為領導階層對政治變革的前途毫不自信，而且，更重要的是領導階層並沒有展現出他們有民主化的長期國家目標，甚至還不如八十年代，那時人們尚可分辨出領導集團的改革派和保守派。第三種情況是幾乎所有的人都願意看到的。第二種情況是可能性最大的也是我們可能指望的最好結果。

即使是第二種情況（不是第三種情況）發生，現秩序的瓦解也是以混亂作為其表徵的。像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一樣，人們對「亂」還是持樂觀的態度的，因為「亂」開始的方向具有正義性，基本上是民眾向以往魚肉百姓的官僚進行報復。但是，不需很久，「亂」就失去正義的方向，一般百姓也會被殃及，這是「亂」的性質所決定的。這時，百姓就會渴望秩序，於他們看來，任何秩序都比無秩序好。這就是文革中毛澤東可以輕易讓早些時候被打倒的共產黨官僚恢復職位建立了更殘酷的專制秩序的民意基礎。因此，現秩序瓦解後是中國民主化的最關鍵時期，也是檢驗國內國際的民主力量現在的努力是否成功的時期。各種殃及百

姓的暴力，經濟的混亂，民族之間的激烈衝突和民族獨立要求的表面化，等等，都可能成為恢復專制秩序的溫床。如何才能避免專制秩序的復辟，是中國走向憲政民主秩序應該是民主力量思考的主要課題。

限於篇幅，本文不對秩序瓦解後的局勢、各階層的利益取向、走向憲政民主秩序的條件等做分析，希望有機會專論。以下，僅對中國在那個時期可能的憲政民主類型的選擇做簡單論述，由此也可以確立民主力量的努力目標。

憲政民主的可能選擇

與走向憲政民主的道路的複雜性相比，憲政民主的類型要簡單的多。中國的選擇大致有三種可能。

其一，以中國現行的憲法為起點開始建立憲政秩序。雖然中國現行的憲法的前言和條文有諸多與憲政民主精神相違背的內容，但是，憲法中的大部分條款只要能落實中國就走向逐步完善憲政民主的道路。這當然要從取消前言中的四個堅持和公平選舉各級人民代表開始。

其二，以一九四六年國民黨政府主導通過的《中華民國憲法》為起點建立（恢復）憲政民主秩序。迄今為止，《中華民國憲法》是中國歷行憲法中最具憲政精神的，當時的各個政治力量都參與了它的制定，它的具體條文基本上符合了憲政規範。

其三，各種力量一起召開制憲會議，從頭開始創造憲政傳統。

中共當局越早越主動開始放棄現行專制秩序，在變革中的主導力量越強，第一種選擇的可能性就越大。當人們面臨具體憲政民主類型的選擇時，需要尋找

TOM SCHELLING 教授所講的焦點（FOCAL POINT），這常常自然地把人們引向本國的傳統中去獲取資源。阿根廷回復到一八五三年的憲法作為建立新的憲政民主的起點，東歐的大部分國家則是回到共產黨統治前的政體作為起點。因此，《中華民國憲法》和政體有可能作為中國政治選擇的資源，更何況臺灣的成功提供現實的例證，會增強民眾對民主前景的信心。當然，臺灣對中國大陸民主化投入力量的大小也是重要的變數。如果是第三種情況發生，中國歷行的憲法和世界民主國家的憲政經驗都會成為參考，選擇聯邦制的可能性為最大。未雨綢繆總是勝過臨陣磨槍，作者任職的「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組織學者經過反復討論

所起草的聯邦制憲法在這方面做了嘗試，為未來可能的制憲會議提供了一個藍本。

魏京生：中國走向民主社會的道路

自古以來，中國人就像其他優秀的民族一樣，在探索最適合個人生存的社會制度。至少一百多年以來，越來越多的中國人認識到：民主是目前已知最合理的政治制度。並且有成千上萬的仁人志士為了民主的目標獻出了畢生的精力以至於生命。

但是過去的一百多年，我們中國人一直在走彎路。使我們走彎路的原因很多，有難以避免的原因，也有偶然的原因。既有統治者的責任，也有革命者的責任，當然還包括「匹夫有責」所說的每一個老百姓的責任。

例如清朝末年的洋務運動導致了光緒年間的改革變法運動。這場運動的失敗，使中國喪失了一次走向民主化的機會；同時喪失了加入先進國家行列的機會。這是中國第一次試圖用和平演變的方式改變二千多年來治襲的專制政治制度，並且非常清楚地認定：只有變法，才能圖存。也就是政治變革是其他一切變革的重要條件，或說先決條件。這種思想，後來的許多「科學救國」，「教育救國」的思想所遠遠不能相比較的遠見卓識。造成它失敗的原因很多，但最主要的原因，是統治集團的不明智和民眾的漠視。其實直到辛亥革命的時候，民眾仍然在漠視自己的命運和前途。所以統治集團仍然堅定不移地「堅持 5 項基本原則」。而大家最終接受了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理論，放棄了對和平演變的希望。從那時到現在的歷史，是中國迅速走向落後的歷史。從清朝末年的富裕但不強大的狀態，落後成為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

經過了兩次大的革命之後，人們看到的現實是，名為民主的專制主義制度使人們陷入了更深的災難。不但失去了經濟、文化上相對進步的機會，而且失去了原來就不多的自由。這些自由是中國人兩千多年來早已習慣了的。所以新的專制制度幾乎從一開始就遭受到人們普遍的反抗。在開始的三十年裏，這些反抗伴隨著統治集團的內鬥，難解難分，此起彼伏，從未間斷過。雖然有時非常劇烈如文革，但它的基本方式，是用修補專制主義制度的方式解決問題。有時也確實是「醫得眼前瘡」，解決了一些迫在眉睫的問題。不過由於這種方式不想從制度上根本解決問題，所以它必然的後果就是「剝卻心頭肉」。不但解決不了根本問題，而且後患無窮。補天派理論經過前三十年的磨練，在鄧小平時代得到了統治集團的青睞，從

理論進入實踐，進入了它的巔峰期。在短短十年中帶來了巨大的變化，也造成了巨大的問題，最終去到了 89 年的民主運動大爆發。

在補天派理論進入鼎盛期的同時，在年輕一代的中國人頭腦中已經開始出現了變天派理論。它甚麼時候在誰的頭腦中產生，實際上是一個不可考證的問題。我們只能說它是在 78-79 年的民主牆時代亮相，並為一般民眾所了解。從那時開始，一種不同於改革的新概念——民主，就進入了一般民眾的頭腦。不僅成為一種思潮，而且成為一個運動，它甚至迫使改革派（補天派）給自己披上民主的外衣。這些年輕的中國人在思想上整整繞了一大圈，才發現了一個被他們的前輩忽視了的真理——沒有民主，就沒有中國的現代化。這個結論不僅僅是理論推導的結果，而且是我們中國人一百多年來實踐的總結。中國人一百多年來試驗過各種各樣的專制體制，它們給社會和給個人自由帶來的後果大同小異。在這種情況下，人們自然而然會要求嘗試新的方式，特別是已經被別人的實踐證明是可行的方式。

在改革經濟保留專制體制的補天派實踐尚未充份暴露其荒謬性和衰朽一面之前，人們不會普遍接受變天派的革命理論。但這個過程只用了十年的時間，就爆發了偉大的 89 民主運動。這場廣泛的民眾運動雖然沒有否定補天派的改革要求，但卻響亮地提出了自己的變天派要求：用民主體制取代共產黨的體制。當時廣場上的小伙子們已計劃好進軍中南海；這種想法也得到了街頭的百萬遊行群眾的認同。這些現象說明了這場運動實質是要民主，而不滿足於改革；是要變天，而不是要補天。從那時到現在，要變天要民主的目標已經從深入許多中國人心中，發展到深入絕大多數中國人心中。現在的中國所面對的難題早已不是改革或民主的問題；而是如何走向民主的問題。

路不外有三條。

最簡單是靠外國佔領強加給你一個民主制度。例如日本、德國、香港等等。這種情況只在特定的時間環境中才可能有，而且會使大部份人民反感，給社會心理和民主體系都留下後患。這不是最好的方式，而且也不是人們可以選擇的方式。

最好的是和平演變的方式。如台灣、南非、蘇聯、東歐各國等等。雖然時間長、困難大，不可預測的因素很多，但它最可靠。因為人們按照預先設定的目標一步步努力，最終的結果比較可靠。但這種和平演變需要三個最基本的條件：？堅強的反對派力量，成為群眾民主運動的核心。它可以起到團結和指揮民主派群眾力量的作用。？統治集團內的開明派勢力。可以與民主派力量相呼應，使敵對的勢力逐漸接近於可以達成妥協的狀態。避免激烈的對抗升

級為暴力對抗。？國際社會的強大壓力。沒有這種壓力，前兩個條件會大大減弱，不能產生結果。現在中國人面臨的形勢很難，一方面是：反對派力量很弱；黨內開明派也不強；國際社會給共產黨的幫助比壓力大得多。另一方面是：經濟和社會危機急劇加重，越來越多的人準備為生存不惜一戰，而且他們對和平演變所抱的期望值越來越低。

最可靠和最少損失的和平演變的方式如果不能成功；國內的各種矛盾包括饑餓人群的增長，會最終導致暴力革命或者軍事割據狀況。我們希望這些狀況晚些出現或最好不出現。但歷史有它自己的規律，不能按我們的願望發展。我們的責任是盡量利用各種條件使事情向好的方向發展，但我們不可能按自己的設計去製造歷史。我們必須為各種可能發生的狀況而預先做好準備工作。
